889740 K49

革命史資料



鄭州大學 圖書館藏

11

史 資 料 出 版 社

革命史資料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北京

《革命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何长工
副主任：孙　毅　杨放之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刘　苏
刘立青　刘景范　刘瑞龙
连　贯　侯　政　黄鼎臣
温济泽　魏传统　蹇先任

革命史资料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国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11/16　字数：146,000
1983年5月第一版·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200册　　定价：0.76元
统一书号：11224·110

目　录

封面题字…… 肖　克

我所经历的东北财经建设…… 李逸民（1）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

和平解放北平…… 崔月犁（20）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争形势——争取傅作义

将军起义的准备工作——第一次试探——

第一次出城——再次出城——谈判过程中

的三个主要人物

通向和谈之路…… 仓孝和　刘时平（35）

早期的普宁革命运动…… 方　方（48）

漳浦事件…… 卢　胜（68）

向陈毅同志的一次汇报…… 温仰春（77）

黑茶山上觅忠魂

——“四八”烈士遇难纪实…… 周怀瑾（85）

在莫斯科

——和陈郁同志的一段经历…… 何一民（90）

记改造郭宝珊部队…… 张秀山（96）

七天七夜…… 张震东(100)
回忆青岛停战谈判…… 王　彬(113)
解放一江山岛…… 李志明(127)

传　　记

王佐传略…… 吴直雄　郭德宏(132)

关于张闻天同志的资料

广昌战役后的一场争论…… 伍修权(144)
张闻天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交往…… 吴黎平(147)
解救傅连暲…… 陈真仁(152)
佐证几则 ……张培森(156)

关于黄显声将军的资料

我所记忆的黄显声将军…… 王化一(161)
黄显声将军被囚禁的前前后后…… 王凤起(171)
黄显声将军在敌特集中营的斗争…… 黄彤光(201)

我所经历的东北财经建设

李　逸　民

本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原总参政治部顾问李逸民同志的遗稿。李逸民同志一九二五年入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南昌起义的积极参加者，是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近年来，他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幸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因病去世。

我们发表这篇回忆录，以表示对李逸民同志的深切怀念。

——编者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结束了绥化地委的土改工作，回到哈尔滨，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要我到东北军区搞联络部工作。我考虑了一番，觉得东北的煤矿很多，其他工业也不少，而且全国胜利以后的主要工作是经济建设，便决定乘时学一点经济建设工作。我找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同志，他分配我到牡丹江省担任省委建设厅厅长。这是我参加经济建设的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我都在东北，在陈云、李富春同志领导下，学习了不少经济建设的学问。

牡丹江省委建设厅

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没有什么干部，工作也没开展起来。建设厅设有三个科一个办公室，我到建设厅以后，办公室干部已经有了，负责的是一个抗联干部。三个科却没有科长。我组织了一个班子，由方岗同志担任工业科长，黄佑民同志任农业科长。我的爱人周磊同志担任纺织科长。

建设厅的工作是困难的。

所谓工业科，名义上管一大批工厂，许多已经在战争中炸烂，没有炸烂的工厂，机器也大部分被苏联搬走了。例如小丰满水电站四台发电机搬走两台，连油坊厂的榨油机，面粉厂的碾面机，火柴厂的机器统统拆走。他们拆机器时，也没有按图纸编号，乱拆一气，拿回去又装不上，成了一堆废铁，而给我们造成了无穷的困难。

没有工厂，工业科搞什么呢？我和方岗同志商量，决定想办法挖煤和搞木材。我俩亲自去看了风山煤矿。这个矿很小，年产量不到二十万吨，这时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工人也散了，失了业，生活很艰难。听说我们要恢复煤矿生产，都很高兴。很快我们就找了五六百人，因为他们大多是老工人，所以矿也很快恢复了，但一年也只产不到十万吨煤。

林口有一个很大的木材场，日寇占领东北时，在那里砍了很多木材，堆成山似的，没有运出来。我们组织了一批工人，拖回来了一些，不久，火柴厂也恢复了生产。工业科的工作总算有了一些面目。

纺织科的重点是恢复纺纱一厂和亚麻纺厂，这两个厂的机器

也被炸烂了，纺织女工也都散了。我们找人把一些机器修理了一下，还基本能用。没有工人怎么办呢？这时牡丹江省正好有一批妓女，解放后失了业，我们借此安排了她们的工作。我还专门对她们讲了一次话，指出解放了，应该人人参加建设，要她们改行当工人。这些受尽了旧社会蹂躏的妇女，积极性很快地调动了起来，工作非常努力认真，不少人后来成了模范工人。

搞农业科比较容易，因为东北土地有的是。但也有困难，没有拖拉机，也没有马，后来找了民主人士孙仲远，他曾在重庆遭国民党逮捕，后经周恩来同志营救出来，到了东北解放区。我和他商量，让他到密山搞个农场，他欣然同意了。

密山位于兴凯湖边，有五六百平方里的熟荒，日本鬼子曾在那里搞过农田基本建设，水泥的水利工程配了套。我们搞了三四百顷的土地，孙仲远同志从当地找了五六百农业工人。我又跑到哈尔滨找了六七台破拖拉机，找人修理好了给了农场。

孙仲远同志的事业性很强，一头扎到农场里，对拖拉机保护得很好，另外还养了十几头奶牛，农业生产搞得非常出色。

在建设中也有搞失败了的，例如密山有一个大炼油厂，日本人在的时候每月能炼几百吨大豆油，这时机器也被破坏了，还有小部分机器能用，就是没有干部来管。

我到哈尔滨搞拖拉机时，碰到一个延安枣园认识的木匠，他是肥皂厂钉木箱子的。到东北后，他当过工作队长，因犯了错误，受了处分，这时闲着没事，我把他要来了，让他到哈尔滨找一批工人来修机器，结果没几天，他就花了五千多万元（东北币）。一调查，是他在哈尔滨大吃大喝花掉了。结果又给了他处分。这个榨油厂始终没有搞起来。

总之，当时建设厅的问题很多，关键是缺干部，连个会计也找不到。后来才找到一个会计叫陈水明，是日本煤油公司写发票的。他工作非常认真，账目也清清楚楚。经过一段工作，建设厅工作慢慢有了起色。

东北财经委员会的组建

我在牡丹江省委建设厅搞了一段，牡丹江省和嫩江省合并，建设厅撤销，我带了二十几个建设厅的干部到了哈尔滨，住在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一九四七年八月，东北人民政府为了统一搞好财经工作，成立了东北财经委员会，由陈云同志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担任副主任，叶季壮同志任秘书长。有一天，陈云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要成立财经委员会，让我和牡丹江建设厅来的干部全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由我任副秘书长兼人事处长。并让我赶快把财经委员会的班子拼起来。

拼个班子在当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各方面的事业都在发展，部队也在扩大，许多文职干部也去搞武的了。

我找了一批干部，首先成立了秘书处，处长余化珍，他原是基督教徒，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东北解放时，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个同志生活很朴素，工作也很艰苦。不久，姚臻同志来接我的人事处长；贾石同志任财经处长；闵一凡同志任煤炭处长。

这时发现铁路没有归口管的处，我向陈云同志建议成立铁路处，调叶林同志任处长，叶林是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担任东北铁路分局副局长，对铁路管理是很有经验的，他来了以后，全部

铁路很快恢复了。

工业处处长陈康白，他是比利时留学生，学化学的，事业心强，工作劲头也很大。这个处主要管钢铁、机械。

另外还设立了农业处、基本建设处和城市建设处，后两个处没有人，由我自己兼任。

我虽兼基建处处长，但是那时候连基本建设这个名词如何解释也搞不清，幸有陈云、李富春同志的及时指导，才没有出乱子。当时基建处有六百亿元（相当人民币六百万）的资金。我从来没有管过这么大的家产，更不知道如何花这笔钱。各省来的报告很多，学校要盖校舍，工厂、煤矿要搞基本建设，我都舍不得批，抠得很紧，结果下面意见很多，说我是“富农管家，把光洋放在枕头底下睡大觉”。我听了也就一笑了之，反正不给你乱批钱。

下面的意见也反映到李富春同志那里，他找我谈了话。我一进门，他就开玩笑说：“李逸民，我早想找你这个‘富农’谈一谈。”我也开玩笑说：“我出身地主，干脆说我地主算了。”他说：“我把下面一些意见告诉你，连王鹤寿、唐克同志都有意见了，你是怎么搞的，六百亿元钱花完了没有，为什么抠得那么紧？”我说：“还有三百亿元没花！”李说：“那么多报告，你就批嘛！”我不服气地说：“那浪费了怎么办？”李说：“有我和陈云同志负责，你批了还要拿给局党委讨论。”我说“好吧！”

这下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凡来报告我就批，结果搞得中学校的经费批多了。有一天，李富春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说：“你没抓住中心，现在要把钱主要花在工农业上，教育可以卡紧一些。”我说：“现在问题最多的是学校，没有宿舍和教室，学生入不了学。”李富春同志笑了笑说：“学校要恢复一部分，但主要要恢复

生产。”并且讲了一大番道理。以后我又把学校的经费扣下来一部分。

这说明我当时根本没有经验，经过这件事，学习到了不少东西。财经委员会搞得最好的是煤炭处和铁路处。工业处虽说管机械和钢铁，但北满根本没有炼钢材料，所以主要抓机械工业，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的机械工业都先后恢复了，最突出的是哈尔滨。

财委的机关建设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财委有七八百干部，宿舍、办公室都成了问题。开始我们在南岗大白楼办公，后来这个楼给了东北局，让我们搬到哈尔滨市委的房子里去。这是一座三层大楼，可容纳一二千人。

我找市委书记一接头，他满口答应给第三层楼，我回来向陈云同志汇报，陈笑着说：“好啊！让我们这些老头子爬三层楼，他们小伙子倒在一二层。”我又找市委书记，他不同意换，说一二楼办公家俱很多，搬起来不方便。我只好又找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行，我们爬它几天，我和富春同志可以在家里办公，让叶老（季壮）去爬，弄两三个人扶着他上下。”这个办法真奏效，有一天，我们正扶着叶老上楼，被市委书记看到了，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我说：“李副秘书长，非常对不起，不能再让老头天天爬三层楼了，我打算同你们换一换，一二层楼归财经委员会，我们市委上三楼。”一个星期，我们就搬完了。

恢复生产

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各处的工作很快抓了起来，北满许多工厂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恢复了生产；交通也恢复了，特别是

铁路，火车运行正常，客车都装上了暖气。农业的形势更喜人，由于平分了土地，农民有了自己的牲口和农具，生产积极性很高，农产品非常丰富，所以四野进关时都带着面粉。

由于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商业也兴旺起来，商店纷纷营业，商品各种各样，特别是农副产品的供应很充足。机关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以我们财经委员会为例，机关食堂天天有豆腐，小孩都喝上了豆浆和牛奶。

当时比较困难的是穿衣问题，苏联支援了一部分，关内弄来一部分，总算解决了问题，老百姓基本上都穿上了衣服。

生产一恢复，财经金融也有了盈余，干部的津贴费也有了增加，供给范围也扩大了。

文娱活动也开展起来了，每星期六还组织舞会，有几个电影片为《夏伯阳》等，经常轮流着放，还组织了文工团、宣传队、话剧队，星期天还能上太阳岛玩一玩。人们喜气洋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歌声连天，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当时的工作还是很紧张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是扩大部队，准备解放全中国，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围绕这个中心。

四野的后勤供应和装备是很充足的。日本关东军垮了以后，留下很大一部分装备，被苏联搬走一些，但也留下了不少。军用仓库很多，一百几十万的四野部队都发了皮大衣、皮帽子，指战员的情绪很高。

这时大家已经看清了全国将要解放的形势，议论纷纷，都在作着全国胜利后的打算，有的准备将来回老家去工作，没有结婚

的也不结婚了，打算全国解放后到家乡去结婚，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氛……。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沈阳解放了，陈云同志指示，东北人民政府要搬到沈阳去，所以财经委员会也要随东北人民政府搬到沈阳，需要派人到沈阳找办公地点。于是我和闵一凡、叶林三人奉命去沈阳选办公地点，组织财经委员会机关。

搬迁沈阳

到达沈阳以后，正逢张学白同志去沈阳接收中国银行，给了我们一幢小洋楼，让我们三个人住了下来。据说这是中国银行行长的住宅，楼下五六间，楼上有两三间，地毯、沙发俱全，非常阔气，我们这些土包子是第一次享到了这种待遇。这位行长是个佛教徒，在卧室里还放着一座瓷观音。瓷观音下放着一个木盒，我以为什么宝贝，打开一看，全是春宫照片。观音象下放着这些玩意，对这位佛教徒真是莫大的讽刺。

沈阳刚解放，街里很乱，如和平街马路西边，都是原来日本高级官员和高级职员的宿舍，我们去看了一下，空着的还不少，但这时四野的许多干部家属来到了沈阳，占了不少房子，没有占领的房子，老百姓都去搬东西，好的家俱差不多都搬走了。沈阳中心区到处是卖破烂的摊子，什么都有，衣服、袍子、军用品、塑料纺织品、日本军用毯子、大衣、皮鞋等。社会秩序也很乱，晚上还有打枪的，大街上还有花枝招展的妓女。马路上到处是垃圾堆，电话常坏，电灯忽明忽暗，虽然我们有公安局，但我们管理经验还没有，社会秩序一时恢复不起来。

我们三人的任务是找财经委员会的办公房子，那时沈阳只有

两座大楼，一座是日本三菱公司的，一座是铁路局的房子，都是七层建筑。前者已经被四野的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号走，准备作为司令部用房，不能动了。后者准备作为东北局的办公房，但是用不完，我们就占用了四至六层，宿舍就占用了银行的。

占好房子以后，我们就给陈云、李富春同志发电报，一周后，财委就搬来了。但是，由于财委增加了干部，达到千把人，东北人民政府也扩大了各部门，一幢大楼办公很拥挤，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我又想法另找办公处。

一天，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姓黄的司机，他有一辆破吉普，原来他是给国民党的励志社开车的，我向他征用汽车，他同意了。我听他说是励志社的，问他励志社原来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就开车带我去看。先到了太原街公园对面的励志社俱乐部，进去一看房子很大，有台球室，有室内游泳池，设备很完整，我就号上了，准备作为财委的俱乐部。接着又看了对门的洋楼，有数百间，正好可以办公，我也号上了。办公的房子算解决了。后来，又基本解决了宿舍问题。

财委搬了家，李富春同志很满意，说比原来那座七层楼还要好。

接着，我们又给每个办公室配上保险柜，给富春、陈云、叶季壮同志找到了合适的住所，财委安顿下来了。

沈阳解放后，市面很快地恢复起来，垃圾很快清理干净了，特务被抓的抓，跑的跑，乱打枪的现象没有了，妓女也不见了。

鞍山钢铁厂的恢复

解放战争在迅猛地推进，为制造武器，需要大量的钢铁，恢

复鞍钢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财经委员会搬到沈阳以后，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恢复鞍钢生产。

一九四九年一月，财经委员会机关稍一安置，我和叶季壮、陈康白、闵一凡四个人就到了鞍山钢铁厂。临行前，李富春同志曾有指示，要我们想法在一个月出钢。

由于战争的破坏，鞍钢乱得很。为了解放鞍钢，这里曾打过两仗，我在延安时的一个同事董其文同志，就在其中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工厂破坏得很厉害，四十多个分厂，原有好几万人，这时只剩下二千多人，生活非常苦，连饭都吃不上，但这些工人很积极，听说我们到了，打着旗帜出来欢迎，还开了个欢迎大会。

为了恢复生产，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到各个工厂参观了一下，到处破破烂烂，自来水厂的水管被炸烂了，满地的水都已结成冰；发电厂的高压线也都炸得东一截西一截，到处扔的是破电线；厂内三百多公里铁路歪歪斜斜，车皮没有了，车头已被炸烂；炼焦炉也被炸毁了，看来，要恢复生产是困难重重的。

晚上，我们找了一批工人开了个座谈会，问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很快把鞍钢恢复起来，他们说："要恢复生产，非得把总工程师找出来不可。"我问他们总工程师还在不在，他们说："他走不了，他是东北人，伪满时期的留学生，现在也没饭吃。"我让老工人带着去找一找他，老工人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由一个老工人带领，我们找到了总工程师的家，房子破破烂烂，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我们进去时，正听到他的妻子在大声吵："你象乌龟一样缩在家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找找共产党？说不定还能搞点吃的。"我们一进去，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叫他爱人别吵了，他爱人边走还边骂："你还死要面

子，饭都吃不上了……”。

“你是这里的总工程师吧？”我问他。

“是的！”他毕恭毕敬地回答。

“你在这里搞了多长时间了？”

“算来有十多年了。”

“那你对这里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啰？”

“是的！”他又回答。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鞍钢要很快恢复，我们想请你出来工作，好吗？”

他当时似乎有点害怕，表示不愿意出来工作。他爱人在隔壁屋子里听到了，又出来指着他大骂：“你还不去，准备把我们都饿死吗？”而且越骂越凶，弄得这位总工程师无可奈何，说：“好好好，你别吵了，我今晚就去。”他爱人一听又高兴了，赶忙说：“你快去吧，给弄几十斤小米回来！”他说：“行！你别吵了，当着客人多不好意思。”

看来他们家的确太困难了，我赶紧对他爱人说：“嫂嫂，你别急，我们今晚马上给你送粮食来，人也送回来，请你放心好了。”

“我放心得很，我们苦已经吃够了，还怕什么呢？”他爱人说。

我们和总工程师一起从他家出来，当晚就在招待所谈了谈，逐渐地解除了他的思想顾虑。他终于同意出来工作了。对于出钢，他说：“要一个月内出钢不容易，但可以争取办到”。

“那就看你的了，”我高兴地说。

“我一个人有困难，”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工厂原有一批技术人员，都分散了，请你们给我三天时间，我可以把他们

找拢来，就不知道你们用不用他们。”

我马上说：“用，只要找来，我们一律欢迎，保证录用。”

总工程师高兴地告辞了，我们给了他一袋白面，五百斤小米，叫司机把粮食和他一起送到家。他爱人一看，高兴得不得了，唠唠叨叨地说：“瞧瞧，怎么样？没有我骂还真不行。你看共产党多好，还没工作就给白面、小米，伪满时期我们吃什么？整天橡子面，你以后要好好给共产党干。”总工程师也兴奋地说：“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三天后，总工程师果然带着四五十位技术人员来了，我们全部录用了，并首先给他们解决了一批粮食，这批人也很高兴。

讨论恢复生产的具体方案时，我问他应该先恢复什么，他胸有成竹地说：“动力是主要的，没有电就开不了工，因此应该先恢复发电厂。”于是首先恢复发电厂，幸好发电机还没有坏，经过修整一下，很快就发电了。接着恢复了自来水厂、炼焦厂，恢复了一个高炉和四个炼钢平炉（一共有八个）。工厂的老工人都来上班了。我们又到选矿厂看了一下，矿石很多，我第一次看到选矿机器，一个很大的圆球，矿石就在里面粉碎，检查一下，还有四台机器能用。

整个鞍钢各分厂都部分恢复了，生产条件已经成熟，第一炉钢炼出来了。在出钢前夕，我们给李富春、陈云同志发了电报。这件事整个东北局都轰动了，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沈阳市政府和四野都派了代表，由高岗带队来到鞍山，说要举行开炉典礼，火车刚到，工人敲锣打鼓去欢迎，非常热闹。

火红的钢水从炼钢炉里出来了，干部、工人都欢呼起来，全厂在沸腾。典礼上，高岗还讲了话，鼓励了工人一番。

典礼以后，我找总工程师谈了下步工作，要他一心一意地工作，尽快把鞍钢全部恢复起来。他说：“别的问题都好解决，主要是交通恢复比较困难，没有车皮，矿石来不了，炼钢就炼不成，有了钢铁也无法运输。”我说：“这好办，由我负责。”马上打电话给叶林同志，叶很快调来车皮。不到三个月，鞍钢八个平炉全部出钢了。

出钢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由于调度问题，各部门吵得不可开交，发电厂说自来水不足，钢厂说矿石供应不上，选矿厂又说电力不够，电厂却说发电量够了。

开始我们以为是计划不平衡，我去听了一天的汇报，但究竟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懂，也没法作结论。

为了这件事，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翻来复去也捉摸不出一个道道来。第二天一早，我就回沈阳向李富春同志汇报。李富春同志听完后说：“鞍钢先让他们吵一阵，苏联专家快来了，他们会帮助解决的。”并让我先别回鞍山，留下作接待苏联专家的工作。

少奇同志来检查接待专家工作

负责接待苏联专家，富春同志让我给他们找一所房子，每人一个办公室，而且要配备地毯、沙发。他们都带着家属，还要给他们准备家属宿舍，总顾问还要单独一所房子。并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将四百个苏联专家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准备好。

我不懂俄文，李富春同志让从苏联学习回来的陆静怡同志帮助我筹备。

陆静怡同志根据她在苏联学习时看到的苏联人的习惯和摆

设，开了一张长长的单子，包括写字台、地毯、沙发、保险柜，墙上还要挂个镜子，另外还要铅笔、墨水、笔等办公用具。别的好说，地毯、沙发、保险柜比较困难，单地毯、沙发就要八万套，时间又紧，我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财委秘书处的孙科长，这个同志还很有办法，不到一星期，东西都备齐了，就是保险柜要修理。他找了一批工人，也很快修理好了。

苏联专家要吃西餐，沈阳缺少这方面的厨师，又打电报到哈尔滨，找来二三十人。办公室就放在东北人民政府大楼，东北人民政府搬到离沈阳二十多里的东北大学办公。

准备工作基本完了，接到通知说刘少奇同志要来检查准备工作情况，但也没说什么时候来，我们只好日夜等着。一天半夜，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值班室说少奇同志到了，要找我和陆静怡同志谈话。我坐着汽车去了。

少奇同志那时五十岁左右，很精神。他问了我们的准备情况，我把清单给他看了，他仔细地看了一遍，提了些意见，接着他要我们带他到办公室看看家俱的布置情况。他看了以后，说写字台、地毯的摆设，镜子挂的位置都不符合苏联人的习惯，我们都用笔记本详细地记了下来。最后他说："我准备在这里住三天，明天你们就按我的要求布置好，我还来看。"

第二天，我们几个人忙了一天一晚，总算按照少奇同志的要求布置好了，他果然又去参观了一番，这次他满意了。以后他就进关了。

鞍钢不吵了

苏联专家来了，我们热烈地欢迎了一番。

来的专家中有三个是炼钢专家。当天我就向他们谈起鞍钢争执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明天就出发到钢厂去，你和陈康白同志一块去。"

到了钢厂，马上就找各厂的厂长汇报，又吵了大半天。苏联专家宣布休会，说明天再开会。

会下，苏联专家告诉我，"明天你搞个调度室，找五六个青年，能填表就行，再装五六部电话。"当晚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调度室搞好了。

第二天，三个专家来了，就在调度室开会，教那几个青年怎么调度，要他们一个钟头就给各厂打个电话，问一下数字记下来，矿石不够找矿山，矿砂不够找选矿厂，电不足就打电话给发电厂……。他们说："苏联已经不用电话，只要看一下红绿灯就行了，你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只好用电话。"

接着，又把各厂厂长找来开会，告诉他们要掌握生产情况，一个小时汇报一次，调度室给配合。

这么一来，果然不吵了，各厂配合得很好，而且开展了竞赛，当时轧钢机不够，苏联专家又给调来一台，鞍钢的生产终于全面恢复了。

我对苏联专家的印象

四百个苏联专家对恢复东北的工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建设方面有经验，但也很主观、很武断。

帮助我搞基建处的专家叫什么科夫，很热情，他一来就给我上了一课，弄了一张基建表，一项一项读了四五个钟头，还有投资分配表，劳动生产率表，劳动力分配表，利润表等等。经过他

这一课，我这个基建处长才第一次有了基建概念。

这位苏联专家对资金的分配很主观，认为不需要下面打什么报告，就由基建处直接决定。他说："计划通过了就是法令。"当时我对他讲："我们干部水平和苏联不一样，都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搞计划的经验很少，容易搞错。"他根本不听这一套，还批评我婆婆妈妈。他说："你是基建处长，如果整天由下面打报告，就不用这个处长了。处长就是向财经委员会负责，换句话，就是向我负责，就按我的话办。"我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吧，就你们说了算。"

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也不一样，办公室里的暖气一度也不能少，必须保待二十度。他们如要出差，头一天就告诉我们，让给准备啤酒、香肠、水果，在火车上吃一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还要摆一盘水果，而且天天要换，招待员很恼火，后来就不天天换了，他们吃了一个就给添上一个，时间一长，他们发觉了，就说："你们摆的水果是敬菩萨的。水果每天应摆新鲜的，隔夜就不要摆了。"这方面，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要象老爷一样恭敬他们。

这批苏联专家在东北搞了一年，大部分要替换回国，但是许多人不愿意走，要我们向周总理打电报，要求再搞一期，因为一些任务没完成，怕新手来了不熟悉。后来还是大部分都换了。这批苏联同志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工作态度，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现在搞四化，什么都拖拖拉拉，怎么能完成任务呢？

四野进关前后的一些见闻

长春解放后，东北全境都解放了，接着的工作是准备一百二

十万部队进关。苏联的援助物资也来了，有轻武器、有汽油。那时关内部队的粮食供应较紧张，曾要求东北给予一点粮食援助，但林彪一点也不给，他说："东北自己也不够吃。"其实，那时东北的粮食还是很丰富的，高岗和林彪一样，下了命令，东北的火车、汽车不准进关，给我的印象很坏。东北是解放区，生产首先恢复，本来应该支援关内，为什么不给呢？军队的服装也有的是，都放在仓库里，就是不给，汽油、武器也不让动。可见林彪一伙当时就闹独立性，有搞独立王国的野心。林彪垮台后，毛泽东同志曾说：四个野战军，四野是最不听话的。指的就是林彪。

为了准备一百二十万部队进关，东北各部门，特别是东北军区的后勤部门工作是很繁重的，当时后勤部长是钟赤兵，政委陈沂，后勤工作搞得非常好，连运骡马的火车都准备好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野部队浩浩荡荡进关，最神气的数炮兵，几千门大炮好不威风，后来在攻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炮兵司令朱瑞同志，在打锦州时牺牲了。

后来，林彪一直臭表功，说三大战役，他打了两个半。我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时，他曾让八一厂搞三大战役的电影，并再三强调要搞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对淮海战役就不怎么强调，实际上是为了突出他个人。我后来因为没按他的意旨好好搞，他极不满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重点是文化部。

迎接民主人士到东北参观

东北解放以后，有一批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来东北参观，这些

人都是爱国者，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他们看到了全国将要解放，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东北的建设也很关心。

第一批来的，记得有郭沫若、许广平等同志，他们住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招待所。我们给他们做了新的服装，还给发了生活费。

这批同志进关后，天津、上海都逐渐解放，又来了一批，有胡厥文等十余位同志，他们到整个东北参观了一番，到过沈阳、旅大、鞍山等地。胡厥文同志很有远见，看了旅大后，就说旅大将来是一个很大的造船港，因为地点好，东北有钢材，兴安岭有木材。

不久，陈嘉庚先生也来参观，他那时已经八十多岁，精神很好，参观了沈阳许多破烂工厂，到处走。陈是一个爱国华侨，在南洋搞橡胶很有经验，所以对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橡胶厂特别感兴趣。我们带他去参观时，这个厂刚刚恢复生产大车轮胎。厂长向他吹，说生产的轮胎超过了美国的福特公司。陈听了没有开口，仔细地看了生产过程，然后很严肃地说："你生产的还不如我在南洋生产的轮胎，我已经搞了三十年，质量还没超过美国，现在我们还是不要吹牛为好。"弄得我们那位厂长很不好意思。陈嘉庚先生大概看出了这一点，又鼓励说："刚解放，能恢复生产就不错。"

陈嘉庚先生参观完东北以后，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他说："东北的中心应该抓木材、煤炭、钢铁，还有水泥工业也应发展。因为关内缺少这些物资。"

我们很同意他的意见，我当时想，陈先生真不简单，八十多岁了，还时时考虑国家的前途，事业心还那么强。从来的这几批

民主人士中，他们的爱国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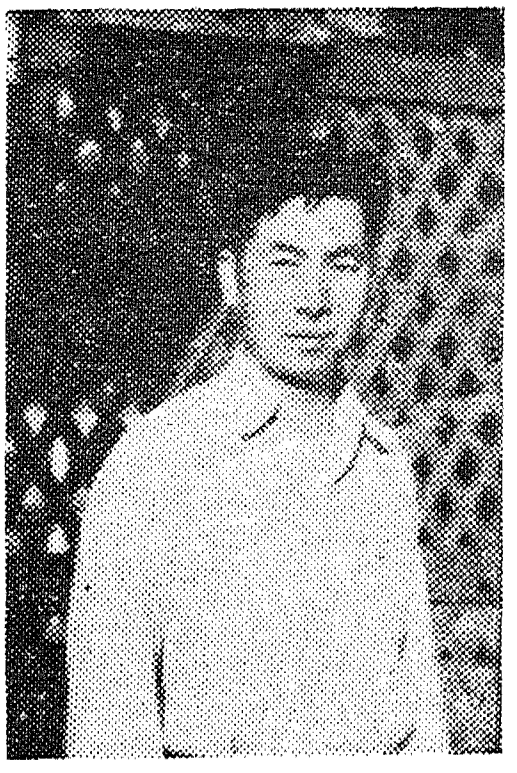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一百二十万四野部队已浩浩荡荡进关，北平、上海、天津已解放。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在上海未解放时已去了那里，抓金融恢复和整顿财经。李富春同志也于四九年后调北京任政务院计委主任，叶季壮同志调外贸部任部长，邵洲余同志调任中国人民银行秘书长。这时东北财经委员会改为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由朱理治同志任主任，我任秘书长，雍文涛同志任副秘书长。

不久，周总理在北京给林枫同志打电报，调我来北京，准备在总理身边搞财经工作，由于我自觉不能胜任，遂到公安部队工作，从此，我结束了地方生活。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崔　月　犁

北平和平解放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句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正是三大法宝的威力，使我们开创了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一九四八年时的崔月犁

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许多同志十分关心，希望回忆一下，由于事隔年久，具体情节显得淡漠，我的回忆只能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希望其他有关同志予以补充。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争形势

一九四八年冬，蒋介石国民党必败已成定局。在蒋管区，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军心涣散。那时的北平，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们，纷纷抢购黄金和

美钞，争先恐后乘机南逃。中下层的官员则怀着恐慌、观望、等待的心情，思谋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传颂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党，在晋察冀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从一九四二年个别党员陆续进城，到一九四八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三千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约五千人。其中“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约占三分之二。

一九四八年十　月下旬，为了迎接解放北平，南系学委（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和天津）和北系学委（指原来在平、津的地下党组织）合并成为统一的学委。学委除了联着大、中学生，领导着学生运动，并通过进步学生，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建立了三处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电台。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并组织纠察队，搜罗枪支武装自己，做好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首先把立足点放在武装夺取上，但也尽力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我们这数千知识分子队伍，联系着各阶层广大群众。群众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

当时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我们党分析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

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

事实正如我们党所估计，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

我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辽沈战役胜利后，敌我两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我人民解放军相继开辟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场。华北战场的胜利，对平津周围战略要地的分割包围，使傅作义感到震惊，开始考虑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保安一战，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又在二十四日攻克了张家口，断绝了他西逃绥远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实力割据一方的梦想，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军一举拿下天津，兵临城下，炮轰机场，彻底切断了他的陆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最后下决心起义。

一小撮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谈，阻挠傅作义将军起义。他们跟踪、逮捕，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捕入狱。刘仁同志不断来电要我们“提高警惕”，“绝对秘密”，“严格组织纪律”。尤其是从秘密的变为半公开的直接出面以后，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住处和身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彻底地清理，把难得的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加以处理，连精心收藏的小小的电话号码纸片也烧掉了，这虽然增加了联系工作的困难，

但因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所以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被捕，也绝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身边搜出任何证据以致牵连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听到解放军轰鸣的炮声，那时就急盼着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准备工作

早在一九四八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关系谈心、谈形势，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有的条件成熟后则发展为共产党员。一年来，我们学委先后联系的能和傅作义“说上话”的人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促使傅作义将军起义。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城工部领导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一九四八年春，刘仁同志让北平地下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同志，与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结义兄弟，在傅作义任军长时，他是副军长。在王甦同志的鼓励下，曾延毅来北平找过傅作义，但他表示傅作义对他不信任，难以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建议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当时是傅作义的

中将总参议，傅作义对这位老师相当尊重。曾延毅与刘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两家关系很深，经常来往，曾与刘是无话不谈。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和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又是同学，刘杭生在曾常宁的影响下，参加了“民青”。那时，我与王甦同志每星期联系一次。开始我是从王甦同志那里了解到刘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况，后来我与刘厚同见面却是通过民盟杜任之同志介绍的。

杜任之同志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从太原来的共产党员，也是民盟成员，与傅作义是同乡，有过交往。由于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险，来北京后便住在他弟弟（杜敬之，傅作义的军医）的家里。当时，民盟中的地下党员关世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的情况。一九四八年秋，我和关世雄同志一起到锦什坊街油篓胡同六号去看过他，他说他是共产党员，因有被捕危险，由太原来北平找地下党。他问我，自己是回解放区还是留北平。根据党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脚的都留在北平工作。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杜任之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锦州解放以后，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平津的解放不过是时间问题。北平的群众，一方面希望解放军赶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担心战火会造成很大伤亡和破坏，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杜任之同志以自己与傅作义有同乡之谊，积极促进傅作义接受和谈。他通过他弟弟与刘厚同见了面，刘厚同与傅作义商谈后，说傅作义有意进行和谈，但希望有个民主党派参加，以便协调双方意见。因此找了当时民盟在华北的负责人张东荪做为第三方的代表。但是由于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开会，谈判问题暂时搁下了。

在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的领导下，有李炳泉同志做他堂兄李

腾九（傅作义总部的联络处长）的工作。王汉斌同志又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由天津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以便做傅作义的工作。

以上可以说是争取傅作义将军的准备工作。

第一次试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刘仁同志把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同志叫回解放区泊镇，指示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我们学委研究，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正式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同志是傅作义的大女儿，共产党员，由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领导。当时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为了便于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将她调来北平。佘涤清同志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的父亲，向他转达我们党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傅作义问他女儿：

"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问佘涤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

第一次出城

学委考虑傅作义总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又派李炳泉同志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李炳泉同志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九四〇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当时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后升为采访部主任。原来由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领导，有一段时间由佘涤清同志领导。

李腾九是傅作义“剿总”总部的联络处长。李炳泉同志和他开始是以亲属关系，漫谈形势，引导到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是出路，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让李腾九找傅作义去谈。

李腾九与傅作义谈了几次，傅作义都没有理他。十二月初我军以神速动作分割包围了华北的战略要地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这时傅作义才感到和谈的迫切需要，找李腾九与共产党联系。学委决定李炳泉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出面。

约在十二月下旬，傅作义决定派他的亲信、《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谈判，我地下学委则派李炳泉同志与崔载之一起出城。当时傅作义提出，要我们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我方人员与李腾九联系。我们则指定当时《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同志与李腾九联系。我们要求不仅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而且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在内，都要放下武器。傅作义说：“我的军队可以，其它我控制不了。”后不幸佘涤清同志和刘时平同志被“军统”逮捕。

再次出城

新保安、张家口被攻克后，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被歼灭，一九四九年元月初旬，平津前线吃紧，傅作义感到情况紧急，决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我约好在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家与他们见面。我和周北峰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他想先和我谈谈，但因为出去的路线、时间、暗号都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络好了，不能耽搁，我让他们马上就动身。周北峰说："我们这方面路过的军队关卡好说，到解放军那边怎么办？"我让他们带上一面白旗，准备过火线时用，并告诉了他们要走的路线和联络暗号。很快周北峰就和张东荪一起出发了。

后来城工部来电，要我们注意周北峰回来后傅作义的态度。我们了解到傅还是犹豫不定。不久攻打天津的战斗就开始了，军委来电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有变化。果然，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与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后下决心起义。

谈判过程中的三个主要人物

原来地下学委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多方面进行的。一九四八年秋，我已与刘厚同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联系，那时我担任学委秘书长，分工上层统战工作。李炳泉同志出城之后，即由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这时同志们原来联系的人都交给我联系，以便于全面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和进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谈判阶段，主要是通过三个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

女儿傅冬菊同志。

我们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因为他和我们有较长时间的接触，他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和谈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对傅作义了解较深，同时深得傅作义的信任。通过刘厚同，我们对傅作义做了长达一年的工作。

我与刘厚同经常见面的地点在伪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的办公室。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同志有工作来往。

刘厚同老先生看样子将近七十岁，是个读过旧诗书有才学的人。说话声音宏亮，头脑清楚，很健谈，很开朗，讲古论今，谈笑风生，一谈就是半天。吴煜恒院长语言温和，待人诚恳，为我们在那里见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见面还设宴招待了我们两个。

我们是在谈判，也同时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我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交朋友。老先生还送给我一张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刘厚同与我约定每星期见两次面，他说："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就认为你被'军统'特务逮捕了，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因为"军统"特务活动特别猖狂。刘老先生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真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当时，我告诉他，我姓李，是同仁医院的医生，其实，那时我已离开同仁医院了）。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没有找到李大夫，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地下党员孙振洲同志，也是同仁医院的大夫，被敌人逮捕了）。

我与刘老先生直接接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努力。从刘老先生所谈情况，清楚地知道傅作义一直

是动摇的，一方面不想跟蒋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总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事隔年久，很难记起每次都谈些什么内容，大体记得有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开始时，我们知道蒋介石还不断拉傅作义并委以重任，我们主要谈的是跟蒋介石走没有出路，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当我们了解到美帝想收买傅作义，支持傅作义在华北“独立”时，我们谈的是傅将军应珍惜自己的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美帝国主义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军队，也避免不了可耻的失败下场。针对傅作义还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绥，我们谈的是察绥已经很难回去了。听到“陕北广播电台”公布战犯名单里有傅作义，接着就接到中央的来电，意思是“傅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这时我们主要谈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会忘记，以解除傅作义的顾虑，让他下决心接受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如不打仗，不仅少死人，少破坏，而且保全了文化古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对人民立了一大功。

在对傅作义进行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老先生是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地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

据刘老先生所谈，他曾劝傅作义发和平通电停止内战。傅作义将军当时主要顾虑的是：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谅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

怕被人看做叛逆。刘老先生把傅将军左右为难的处境向我们反映，也对傅作义的错误思想做了不少分析说服工作。例如他分析所谓“叛逆”的问题，对傅作义讲起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故事，他说：

“汤与武王是桀、纣的臣，后人不但不称汤与武王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忠应当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的发展，顺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会提壶送酒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刘厚同在北平奔走和平八十五日，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们称他为“和平老人”，可谓当之无愧。傅作义决定起义之后，刘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了天津。

邓宝珊当时是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我和邓宝珊见面是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四方脸，语音沉重，一见面他就说：

“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我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宣传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兴。这次我们谈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邓宝珊先生对蒋介石必败认识是明确的，谈的比较投机。我对他说：

“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

他表示要极力劝说傅先生。当我问到榆林地区的情况时，他说：

“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个地方的问题好办。”

我说：“那好吧，等以后再商议吧！”

这是第一次会面。

再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是在我解放军围攻北平，包围圈愈来愈缩小，城内不断听到隆隆的炮声，有些炮弹已经打到城里来了的时候。地点还是在王捷三院长家里。看样子邓宝珊的情绪比较紧张，交谈的时间较短，他说：

“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

我说：“我可以向领导反映，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当时天津临近解放，刘仁同志转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投降。不过还是让我们作两手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投降，即武装解放北平。我按中央军委的意思与邓宝珊进行了交谈，让他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这次我没有骑自行车。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弯子胡同，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离得很近，谈完话临出门时，邓先生说：

“‘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路吧！”

他用汽车把我带到景山东街，我就下车了，这离我家更远了。按地下党的规矩，我们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

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这个人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这次一见面就带着微笑说：

“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

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

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事后知道，在我军已包围北平的情况下，是傅作义专程派飞机将邓接到北平，来商谈北平问题的）。接着，他提出要与我们军队领导进一步商谈。我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系，经领导同意，我与王甦同志研究派了一位合适的交通员陪着他们出城，带他们到我们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去。我们地下党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事后听说邓宝珊将军曾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谈起义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不过后来就不需要通过地下党来联系了。

傅冬菊同志是党的好情报员，也是傅作义将军的好女儿。在我们党公开与傅作义谈判的过程中，傅冬菊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解放后，有一次刘仁同志谈起这事，他说：

“聂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还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聂司

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象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和傅作义谈判过程中，傅冬菊真是一个好情报员。由于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准确及时，中央在组织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得非常紧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已毫无问题的情况下，掌握了用和平谈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动权。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我国的文化古都，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进一步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威力，促使敌军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解放前夕的北平，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我们的心里却都是兴奋的，同志们都清楚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据城工部的指示，为了统一行动，北平地下党的“学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等迅速联合了起来，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数千个革命的，年轻的，有战斗力的，有着美好理想的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联系着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扎根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敌之党政大小头目邮寄、散发通令，告诫其各安职守，不准破坏，等候接收；并且瓦解敌军，争取起义，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军官被争取过来，包括一些高级军官也已准备起义，例如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副军长黄翔已暗中保证起义，王甦同志联系的崇文门、西直门守敌已保证在我军攻城时开城接应。可以想见，我人民解放大军攻城时遇到的将是瓦解了的敌军和充分准备好了的配合力量。傅作义将军经过很多斗争，率领六十万军队起义了，此举为人民立

了一大功。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北平的解放方式，“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

通向和谈之路

仓孝和　刘时平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平津战役作出了利用敌人错觉，出奇制胜，兵临城下，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使敌人陷入了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中。华北城工部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积极配合了斗争，终于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北平方式”和平解放了北平，光荣地载入史册。

在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的学委和平委、工委、铁委及时组织了迎接北平解放的联合指挥部，作了里应外合，“立足于打”的两手准备。

当时南方局平津学委职青支部的成员，大多是随北大、清华、燕京等校毕业的学生或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复员回到北平，在新闻、教育界工作的同志。由于他们原来所在的党组织由南方局领导，所以被称为南系，后来合并在华北城工部学委的统一领导下工作。现仅从我们参加和了解的北平和谈的一个侧面，就自己记忆所及，作为历史的见证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的回忆也有局限，因为作为基层支部的党员，对于当时上级领导和其他方面的工作部署并不了解，我们的记录可能有很大的片面性，难免挂下漏万，供他日修史者补正。

打入敌人心脏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副书记仓孝和同志刚刚从中原解放区来到北平，冯文彬同志（当时叫林维敦）和他谈到今后的形势，提出："要尽量打入敌人的心脏。"

到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北平敌人的心脏当然只能是"华北剿总"。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职青支部成立后，支委会在研究全面工作时，便注意到当时《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同志的工作，并做了认真的研究。职青支部书记李炳泉同志和刘时平同志是西南联大同学，又是新闻界的老相识。由于绥远同乡的关系，刘和"华北剿总"傅作义周围的幕僚颇有接触，不但可以提供重要情报，在必要时还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因此，支委会决定要注意发挥刘时平同志的作用。并考虑到他的工作条件，必须对他采取必要的保护，仅由李炳泉同志以老同学的身份和他保持联系。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支委会经常根据刘时平同志提供的和其他方面的材料，研究傅作义的动态。

另外，李炳泉同志的堂兄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关系密切，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多年来是傅的高级幕僚，从一九四六年来在北平任傅部驻平办事处处长。炳泉同志及他的哥哥李炳璜同志和李腾九保持着联系，经常谈谈形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即傅冬菊)和周毅之从天津调来北平，关系转到职青支部。领导职青支部的南方局平津学委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同志要职青支部副书记仓孝和同志告诉与周毅之联系的同志："就让周毅之保持灰色样子，他不能太红"。因为周毅之同志在

必要时将可以发挥别人发挥不了的作用。

在北平被围，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时，傅冬同志通过周毅之同志，每天把傅作义的动态向王汉斌和崔月犁同志汇报，经过电台发往解放区。

解放战争的战局变化很快。支委会建立前不久，人民解放军在睢杞战役中歼敌九万人，已是空前的大捷了。济南战役中又有十一万守敌全部被歼。因此，围绕战局的发展，研究形势的变化，便是支委会经常的议题。

济南战役中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剿总”有个“爆破专家”杜长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到济南炸毁飞机场，杜正在犹豫不决，恰好遇刘时平同志(刘和杜长城是绥远同乡)，杜就征询刘的意见。刘问他:“你怎么去?”杜说:”坐飞机去。”刘说:“那你炸了飞机场，怎么回来?”一句话使杜开了窍，说:“他妈的,我没有想到炸了飞机场我当俘虏，老子不去了!”当时，刘时平同志就这么轻松地劝说了杜长城没有去济南，从而保全了济南飞机场。

一九四八年十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亲临北平部署一切。蒋曾到碧云寺谒孙中山的衣冠冢和纪念堂，蒋在纪念堂的小屋里曾面壁呆坐数小时之久，可见其当时绝望的心情。支委会分析，傅当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拿到“华北王”(当时社会上称傅为“华北王”)尚方宝剑的表面欣喜之情，掩盖不了末日来临之前的种种忧虑。不容讳言，我们在北平这么几年，傅可以说是我们的直接的“头号敌人”，可是，我们支委会分析了傅的心情之后，也看出了傅可能转变的契机。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对傅作义的震动更大。蒋介石来北平的

时候，部署傅向石家庄偷袭，企图进犯我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傅派蒋的嫡系九十四军和骑四师、骑十二旅并配爆破部队向我解放区进攻。

如果单纯从战术上、军事上，从局部的情况来看，这确是一个有可能侥幸获得成功的“奇袭”。因为当时我华北野战军为配合东北野战军进关共同解放平津，集中在察哈尔南部蔚县一带。从北平直到石家庄，我解放区内只有地方部队和民兵，出我不意，是可能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的。但是，我们从多方得到了这个情报，其中之一是由刘时平同志提供的。在这次进犯之前，刘时平利用与鄂友三是绥远同乡的关系，曾和李炳泉、李孟北同志以《平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到涿州采访，并作了报道。他还搜集了一些情报，通过联络员由华北局城工部电台发往解放区。

我解放区军民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部署和领导之下，从各方面做好了反击的准备。敌骑一入解放区，我军民首先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政治攻势。河北平原人烟密集，敌人进攻之时，我们让开了大路，沿路村镇居民避居两侧，两侧的村庄则用大喇叭向敌人展开喊话宣传，向敌人指出全国解放战场的大好形势，东北全境已经解放了，歼敌四十七万，而他们现在进行的是不义战争，破坏了解放区人民的和平生活，现在只有放下武器，回到人民的怀抱，等等。敌人一进村庄，见到的是满墙五颜六色的壁报和标语，报导着各个战线的战况，特别是东北全境解放，锦州范汉杰被俘、长春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辽西大捷、廖耀湘被俘等等，这些消息，对被蒙在鼓里的国民党官兵真是晴天霹雳。鄂友三的骑兵本以为可以长驱直入，但在这种强大的宣传攻势和

政治攻势下，士气低落，心惊胆寒，一天不过前进几十里。晚上住下来，又遭到我民兵的四处狙击。于是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原来打算指日可待的事被拖得遥遥无期。这支队伍慢慢腾腾地爬行，一路还没有遇到正面的抵抗，但到达正定附近的一个夜晚，却遇到我地方部队拉开一条战线的还击，本来想给我党中央以意外打击的这些人，突然又想起了共产党所擅长的“口袋战术”，现在是否碰到口袋底了呢？恰好，我华北野战军的几个纵队迅速南下的消息又纷纷而至，他们自认为口袋的口子就要封上了。于是，这支部队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终于败北而归了，回来的速度比去时要快好几倍。“优势”的敌人竟然不战而北，在北平，特别是在傅的周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惊慌失措的鄂友三归来后，赶快到前门外一家旅馆，找在那里开业的盲人“骨相家”算命，这位“骨相家”似乎知道他的来意，摸了摸他脑后的骨头，大喝一声，故做危言：“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干的是杀人的勾当，满身都是鲜血！赶紧洗手不干，不然，不要多久，定然大祸临头！”在战场受到挫折的鄂友三，听了犹如当头一棒，精神上又受到极大震动，于是，这个号称“鄂阎王”的少将骑兵旅长，就垂头丧气地回归老家大青山去了。

支委会分析，如果说傅在蒋介石刚刚委之以华北全权的时候，内心多少还有点“喜悦”，而现在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有可能清醒一点地审时度势了！

通向和谈之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旬平津战役开始之前，学委书记佘涤清同志回泊镇（河北沧县）向城工部汇报工作时，刘仁同志根据党

中央的指示，估计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大势所迫，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傅作义可能谈和。当然傅也可能南撤或西逃。刘仁同志让佘当天赶回北平，转告地下党同志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力争和平解放北平。

其实，对傅的工作早就开始了。一九四八年春，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的亲信与亲属直接向傅做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正是炳泉、炳璜弟兄向李腾九频频进行工作的时候。不过此时，炳泉同志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向李腾九透露。李腾九当时是傅部的少将联络处长，在他生前，曾回忆说："当北平合围之势已成，我堂弟李炳泉向我说起义解放之意义，动员我相机向傅进言。在危城中，值傅独立思量，异常苦闷之时，我问傅：'今后的大计如何？'傅反问：'你说如何？'我进一步说：'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就得讲和。'傅问：'如何和法？'我即将炳泉和炳璜所谈经过告傅，与傅谈时是机密的。"

淮海战役期间，支委会得知，傅处于更大的苦闷之中。当我军开始歼灭被围了近二十日的黄维兵团时，傅的苦闷达于极点。根据傅周围的人透露出来的情况，支委会认为向傅提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支委会向上级汇报：请党考虑派代表见傅作义，向他提出派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当时，南方局平津学委书记黎智同志恰在北平。他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须向上级请示。经过一天的研究和考虑，同意李炳泉同志在必要时可先见傅作义。"文革"后黎智同志向仓孝和同志谈起这件事说："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担子真是重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又

问起这些事，我早忘了它了。”

经过平津学委同志研讨后，炳泉同志才把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告诉李腾九。于是，经过李腾九向傅传话，李炳泉同志在取得上级的同意后，于十二月中旬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和傅作义将军见面了，傅将军决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代表，跟炳泉同志一同出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

道路已经铺开了，但并不那么平坦。

炳泉同志会见傅将军后不久，王汉斌同志通知仓孝和同志，把李炳泉、刘时平、周毅之三位同志从职青支部调出，职青支部书记由仓孝和同志担任。这样，李炳泉、刘时平、周毅之三同志便在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佘涤清同志、崔月犁同志的统一领导下，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进行着不懈的工作。职青支部的同志们则在党的领导下为迎接并配合北平的解放在各个岗位继续战斗。

黎智同志听取了职青支部的汇报后，立即离开北平，经天津到泊镇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汇报了这件事。这次汇报非常及时。当炳泉同志和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平津前委请刘仁同志证明炳泉同志的身份时，刘仁同志已从泊镇到达良乡，赶至平津前线司令部，证明了炳泉同志身份，避免了延误。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李炳泉同志把仓孝和约到他家，详细地和他谈了他会见傅作义将军以后的全部过程。炳泉同志说：“这件事是我们这个支部的一件大事，我们两人共同负责这个支部，所以你需要了解全部情况。”由于炳泉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只能根据仓孝和同志的记忆来写了，这实在是万分遗憾的事。

炳泉同志和崔载之第一次出城时，遇到了阻碍，只好返回。第二次炳泉同志和崔步行出西直门，他们两人一直走到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才遇到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这些部队忙于自己的任务，根本不过问他们二人是谁，两人多次要求部队把他们送到司令部，均以“我们有任务”而遭到拒绝。最后，他们说有要事，请求把他们当做俘虏送到司令部，总算达到了目的。

炳泉同志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证明之后，中共平津前线委员会即将傅作义将军派了代表商谈北平和平解放的事电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以后这项工作一直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在开始的时候，谈判并不是那么顺利，原因是很难找到一个能为傅作义将军接受的方案。最初曾建议象曾泽生那样通电起义，但傅将军不能接受这一点。炳泉同志估计：傅将军作为一个旧军人，尽管由于不是嫡系而备受歧视，但和蒋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加之封建道德观念较重，起义就意味着对蒋的背叛，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接着，建议象郑洞国那样放下武器——投诚，这在傅将军也是难以接受的，“投诚”就意味着战败，傅将军一向有“常胜将军”之称，虽然当时已经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局面，而且在谈的过程中，十二月二十二日傅的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已在新保安就歼，接着于二十四日我军攻克了张家口，傅幻想西退回老家绥远的迷梦已经破灭。但毕竟尚未最后一决雌雄，这样提法，从傅将军的感情来说也接受不了，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炳泉同志出城之前，李腾九又向李炳泉转告傅作义的意见，对崔载之出城，尚有顾虑，城内需要地下党有人与李腾九联

系，一方面可以互通消息；另方面也可打消傅的顾虑。经组织决定由刘时平同志与李腾九在城内保持联系。刘常到李腾九住在西城护国寺对过的家里转告党的意见，经李腾九向傅转达后，仍在“起义”与“投诚”之间争执不下。有一次，李腾九转告傅的意见，希望负责谈判的地下党同志和电台，搬到西郊傅的总部，以保安全。当即遭到我党的拒绝。从此，学委决定暂不去找李腾九联系。

十二月下旬，傅同意由周北峰和民盟的代表、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出城谈判。

学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崔月犁同志在张东荪和周北峰临行前和他们见面，并代表地下党表示欢迎他们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当他们到了蓟县，除见到我军平津前委的领导同志外，还由李炳泉同志热情地招待了他们。最后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并在纪要的附记中说明所谈各项务要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

约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炳泉同志曾冒着生命的危险，越过前线，回北平一次，又和傅将军会了面。

经过多方的工作，反复的磋商，总算提出了一个傅将军认为可以接受的方案，即接受“和平改编”。炳泉同志说，提出这么一个方案是费尽了心机的。这样，傅将军在当时可以认为他是为了保存文化古都北平，为了北平市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接受了“改编”，既非“战败”，亦不意味着对蒋的“背叛”。这个方案尊重和照顾了傅将军当时的感情，也便于北平问题的解决，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傅将军当时的处境还很微妙。当时在北平周围还有两个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嫡系兵团，处理不好，可能会增加困难；而国民党军统特务意识到傅将军有

进行和谈的可能，也正伸出触角，到处搜索，企图抓到傅将军的把柄。傅将军的抉择是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将作为光辉的爱国主义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用周北峰的话说："时间过的很快，十四日已经到了，看来傅还没有下最后决心。"于是傅作义用飞机从陕北榆林接来邓宝珊将军，来北平和周北峰第三次出城谈判。是时，聂荣臻司令员当即正告周北峰："周先生，我们前次说的很清楚，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果然，在十六日清晨，李炳泉同志告诉周北峰："天津已经解放了。"这样傅幻想由海路南逃的迷梦也从此破灭。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复协商，傅将军终于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由傅作义将军通过中央社向全国公布。从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学委书记佘涤清同志被捕

和谈之中，当李炳泉同志出城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佘涤清同志和他单线领导的刘时平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西城辟才胡同五十四号徐楹的住宅被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

原因是就在李炳泉同志出城后不久，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曾从南京来北平部署在平的军统特务破坏和谈。据传南京的军统特务接到一份机密情报说：上海《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秘密来平参与和谈，住在北平东城灯市口《大公报》驻平办事处的记者徐盈和彭子冈家里。因而军统特务搜查了徐盈和彭子冈所在的住处，并由特务"蹲坑"捕捉储安平，结果扑了一个空，既没有捉到储安

平，也没有搜查出任何和谈的片纸只字。但是，军统特务并不甘心，又到北平警察局遍查户口簿，据说查出了全北平市的户口中有三家徐盈，虽然“盈”字音同字不同，但特务如获至宝，分散隐藏在这三户徐盈家“蹲坑”。

据余涤清同志回忆，大约在十二月二十七、八日，当崔载之回城后，李炳泉继续留在城外联系时，彭真同志来电报指示为避免意外损失，让在城内的联系人暂时躲一躲，于是学委决定由崔月犁同志介绍刘时平同志到辟才胡同五十四号徐楹家（现名徐柱石）隐蔽（徐是崔月犁爱人徐书麟同志的叔父）。是晚，因故刘仍住在李炳泉家里。三十日下午，刘时平得到通知，让他在翌日上午九时到徐楹家与余涤清同志接头。十二月三十一日晨，刘时平冒着大雪坐车到西单，然后步行绕到徐楹家，一进门，就被两个穿便衣的“蹲坑”特务逮捕，然后用一辆黑色小汽车拉到东华门大街稽查处关押。下午余涤清同志也被捕了。在稽查处关押约一周左右，经过数次提审，并用余涤清同志身份证上穿西装的照片让刘认，刘坚不认识，并让徐楹对证。敌特当时追的主要问题就是让余、刘承认是地下党的代表，因余、刘都不承认相识，当然谈不到代表问题了。但敌特很阴险，曾让一个叛变自首的特务审讯，但也一无所得。这个叛徒“一二九”时期在北大参加过学生运动，当时他的绰号叫“杂牌队长”。

一周后，守卫在稽查处牢房的四名士兵，全副武装，手端冲锋枪，把余涤清和刘时平同志押上一辆敞蓬大卡车，勒令他俩不许说话，并说：“你们老实点，我们也不捆绑你们，如果要跑，就开枪打死你们”。其实是押送到国防部保密局的“炮局”监狱。但在“炮局”关押期间，因战局急转直下，再没审讯。当时“炮局”

监狱的人挤满了牢房，其中有平委的领导赵凡同志和师大体育系主任徐英超教授，还有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工人、店员和学生，有的牢房里在一铺炕头上挤着二十来个人，都是和衣而睡，每天三餐，只给一个冷窝窝头，一碗凉水，每当“放风”或在夜深人静密集的枪炮声传来时，人们的欢乐情绪如过年时听到爆竹声响一样，激动地等待着天明。有的同志甚至压不住自己的内心激动，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向往着北平的早日解放。结果在一月二十三日早晨，“炮局”监狱的牢房门打开了，连日来的枪炮声渐次平静了下来，人们都走出牢门，在“放风”的院落里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听说和谈已签字，今天要放人了。突然佘涤清同志发现赵凡同志已经走了！刘时平同志随着佘涤清同志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天是一月二十三日，即和谈签字的第二天。翌日得到通知出城。据王汉斌同志回忆是刘仁同志对出狱同志的关心，怕城内不安全，所以让交通到西直门接回解放区。当时北平市委的领导机关已经到达青龙桥。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举行入城式时，佘涤清和刘时平等同志先后随军回到北平城，并于二月四日在国会街参加了公开地下党的胜利会师。

尾　声

以上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北平和平解放的某些侧面。当然，有很多的同志，包括很多党外人士和傅方人士，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和贡献。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傅冬同志。傅冬同志在和谈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虽然傅冬同志也是南方局的党员，但由于工作关系，傅冬同志并没有编入职青支部，因此，这篇回忆录中未能包括她的工作，但我

们愿意在这里向傅冬同志表达我们对她的钦佩和敬意。

作为我们的上级王汉斌同志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很多的工作，虽然作为基层的党员，我们对这些情况了解得不多，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另外，崔月犁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为北平和平解放所做的斗争，请详见崔月犁同志写得回忆录，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最后，再一次表示我们对于在十年动乱中被夺去生命的李炳泉同志的深切怀念。炳泉同志为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光荣任务，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炳泉同志尚在人间，这个回忆录会写得出色的多，对于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们把这篇短文做为对死者的纪念！死者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但愿我们后死者在不多余年里，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

早期的普宁革命运动

方　方

方方同志，原名方思琼，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生前曾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闽粤边区党委书记，南方工委书记，香港分局书记，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等职，曾当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下面发表的是方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七月写的一篇回忆录。

——编者

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家乡同志把修志也作为跃进计划之一，来函要我写一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普宁革命史。作为一个普宁人的我，责任很难推诿，而且，这也是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因此便答应下来。

由于时间过去几十年，手头没有材料，本人又非长期在普宁工作，因此只能凭个人的经历、所知、记忆写下来。遗漏以及可能会有一些差错（时间、人物）是在所难免的，且因工作繁忙，

未能多加修饰，故本稿只能作为素材，藉供未来缮写完善历史的同志作为参考。

潮汕整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密切联系的，因此不可能光为普宁而写普宁，这点也必须声明一下。

一

近百年来，普宁的农民革命运动，是没有间断的，尤其是在清末洪杨革命运动失败以后，善宁有一个杀人魔王方耀，代表着惠、潮、梅地主阶级利益，到处镇压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血染透了他的红顶。听说只要讲一声“方大人来了”，小孩也不敢啼哭。因此，农民反抗地主的运动，集中地表现在反抗姓方的地主身上，这完全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南北军阀盗窃革命果实，争权夺利，不断爆发军阀混战，到处派丁拉伕，横征暴敛，炮火所及，庐里成灰；又勾结帝国主义，尤其是屈服于二十一条丧权卖国条约。因此，普宁的原始的农民革命，在四十年前，就具备了新的内容，和反帝、反封建密切地结合着。当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普宁的革命运动更自然而然地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二

一九一九年所爆发的“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潮梅和全国一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抵制日本货的斗争，成立了岭东

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为后来广东有名的共产党员杨石魂同志等。各县也有各县的学生会，普宁学生会为方思琼、伍治之等人所主持，参加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汕头总商会示威，并捣毁了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汕头警察局局长李少如的警察局，烧毁了大批日本货。

这个运动，是得到汕头市工人配合的，又得到各地农民的支持，但因运动骨干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基础又薄弱，不久便烟消云散。但是，这次运动起了启蒙作用，在以后几年中，陆续不断地在各县产生了许多为民主革命奋斗的团体。在潮安，成立了工界联合会，领导人为谢汉一等同志(后谢加入共产党，一九三〇年被捕牺牲)；成立了农会，领导人为张卧云。普宁的伍燮珍等也组织了农会。除工会较有阶级色彩外，农会主要是研究水利、土壤、改良种籽的改良主义。

普宁的一些乡村里，较开明的士绅、上层分子，为抵抗普宁方姓土豪劣绅，则成立了“普宁旅汕同乡会”，搞民选县长，胜利地选了张五云为普宁县长，对排除方姓土劣包揽县政是一个打击，但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是一致的。

另有一部份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如杨石魂、方临川、方思琼、伍治之等，则组织了“洪阳集益社”，做一些反对封建、灌输科学的改良主义的宣传工作，后来地主方十三（廷珍），想利用这个青年组织，派了他的爪牙来加入把持，结果使这个组织无形解体。

这个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可以说是青年们在摸索革命的过程。

三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共产主义在中国人民中展开了宣传。普宁留穗读书部分学生，如杨石魂、方临川、方达史、方家悟等，开始接触了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将这种进步思想带回家乡，因此，青年受影响的范围就扩大了。这时普宁青年开始接触真理，但思想仍很模糊，也没有什么行动。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年暑期，杨石魂至普宁邀方思琼、伍治之、黄中坚、罗绩、张清江、谢培芳等到穗应考入学，同时吸收以上诸人加入新学生社（共产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开始与彭湃、林甦、阮啸仙等人接触。学习时期并参加农军训练，部分同志还参加平商团之叛，武装起来保护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工作。是年冬此批人回潮汕后，即展开加入各县原有的旧农会、工会组织，进行阶级斗争宣传，准备夺取这些旧民主主义组织的领导权，改变其性质，并纷纷成立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小组——新学生社支部。普宁新学生社支部是一九二四年冬成立的，选出方思琼为书记。同时又组织许多读书小组，其中有一小组在福建上杭中学。阅读的文件为《中国青年》，《响导》、《阶级斗争》、《共产主义ABC》等书刊。

潮梅当时统治者是陈炯明军阀底下的洪兆麟。

这是普宁青年学生在敌人统治下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胜利，党广东区委派彭湃、杨石魂等同志来潮梅组织地委，廖其清等同志组织团地

委，又派陈魁亚、陈颂等来普宁组织农民协会，普宁新学生社支部负责组织普宁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并吸收方思琼、彭奕等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成立普宁第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的支部，方思琼被选为书记。当时全县没有党的组织，团支部受党委托兼管党的工作。

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杨（希闵）刘（震寰）之叛，潮梅又沦陷在洪兆麟手中，时间虽很短促，但农民协会、学生、青农的组织，已遍于各区较小的乡村及各个主要学校，开始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作斗争，如取消田信鸡，歉收失收租额的减免等。

潮梅沦入洪逆手中时间，约四、五个月，党指定方维精（后叛变组织三K党）、方思琼、张炳奎（后叛变当土匪）等搞地下工作，联合国民党的林守梅、周潜的弟弟在潮阳峡山以周潜的民军作掩护，组织农民赤卫军，参加的有赖其泉、黄纲常、赖绵奎、黄凌赏、周八舍及许多潮安、潮阳、普宁的工人、农民，约百人左右，组织一个独立营，以方维精为营长，方思琼负责政治、文化工作，任团的支部书记。这是潮汕工农在我党领导下第一次拿起武装对敌斗争。

赤卫军经过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约一个多月，知道刘杨之叛已平，第二次东征军已胜利攻下惠州城，向潮梅推进。党决定武装应即开始行动，使洪兆麟后方不稳，策应国民革命军的行动。

在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赤卫军在方维精率领下，由潮阳峡山镇经铜钵盂向赤寮移动，午夜行军至灵山，决定夜袭潮阳关埠镇洪兆麟饶将谢文炳师部的留守处。准备夺取他的军火、弹药，给盘踞汕头敌人一个威胁。

袭击并没有成功，因为敌人在据点中不敢出来，我们又只有步枪及自制的土炸弹，摧毁不了敌人的工事，又爬不上敌人的屋顶，结果只给敌人一些杀伤。我们突击组赖其泉、赖绵奎、黄纲常等同志（都是潮安大寨的工人）也受轻伤，怕天亮了敌人会来增援，不得不在拂晓以前撤退，转入山地。

估计到敌人可能进山来追击，我们的弹药又很少，也没有战斗经验，因此党决定将长枪队暂时分散埋伏，短枪队移到潮安火车路旁结合农民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其余的同志回各县去做宣传工作，散发传单，动摇敌人的后方。

是后，军事行动虽没有取得胜利，但政治影响很大，上海的《申报》也报导了潮汕工农的英勇起义，尤其配合着国民革命军在老隆、五华的胜利。洪兆麟不得不节节撤退，最后单身出走。我们呢，开始学会打枪，打土炸弹，以及一些军事常识。

秋末冬初，第二次东征胜利收复潮梅。当时蒋介石还在伪装革命欺骗工农，大谈其依靠工农，以俄为师。经过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介绍，他接见了我们受伤人员，发给医疗费。

此时，党委决定放手大搞工、农、学生运动，普宁的农民协会工作，也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陈魁亚、陈颂此时也已入党，建立了党的支部，魁亚为支部书记。

普宁的农民运动一经开展，接着就掀起了减租、减息大运动。为着表示不与方姓地主来往，在八乡的乌犁塔下新建墟集，叫“自由市”，县农民协会也设在这里。农民武装起来，地主为着最后挣扎，也武装了民团、族丁，准备下乡保护收租，遂爆发一九二五年冬天的普宁农民围攻县城的壮举。这一个回合，我们完全取得了减租、抗租的胜利。它说明了普宁的地主是“老虎”，要

从“老虎”口里取回被吞下的肉，非揍它一顿是不行的。从以后事件的发展来说，不仅是揍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把它打死的问题。

地主对第一次失败并不甘心，相反，它正更积极地在调整力量，扩大武装，准备和我们再作更大的战斗。

首先，他们拉拢旅汕同乡会的地主阶级，从阶级的共同利益去打动他们。他们缓和了城内方、李两姓的对立；吸引五十三乡的赖墨樵，埠塘、桥柱的陈益斋，鲤湖的林志见，下社的“柴进士”，流沙的张凌云、庄大泉、罗文高，以及其他许多地主豪绅，暂时缓和他们的内部矛盾，结成一条战线。

其次，他们利用小官僚方秋帆，在国民党县党部中展开和我们的斗争。

再次，是扩大武装。

最后，驱使一些被欺骗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组织新国民社，组织假工会，以组织对组织和我们对立。

因为这样，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战线也越分明，促进了我们农民的阶级大团结。农民运动初期许多小地主、富农渐渐和我们分化，农民协会领导权和领导成分，也渐渐改变在中农、贫农手中或以他们为主了。

一九二六年春，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接着又有五月蒋介石的整理国民党党务方案，蒋介石反人民的真面目开始暴露，豪绅地主额手称庆。在揭阳，新国民社利用土匪绑杨石魂的票；在潮阳，捉拿张炳奎下牢；在潮安、澄海、汕头，分裂工会、农会、青年组织，搞武装的“体育队”和我们对抗。

搞工农运动的党团员，都纷纷的退出国民党（为划清政治界线退出国民党是对的，怕刺激蒋介石而退出国民党尤其退出军

队，是错误的）。

为着镇压地主这种嚣张，党在普宁组织了十万人以上的农民武装庆祝减租、抗租大胜利，并欢迎彭湃同志，检阅自己的力量，准备再接再厉的战斗。

党并调了黄埔第四期毕业生数十名，到潮梅各县训练农民赤卫军，成立基干队。普宁此时农民武装组织，又系统的提高了一大步。

随着群众组织的扩大，斗争的发展，党和团的组织也发展了，因此地委决定在普宁成立“部委”，大的区成立特支。“部委”的书记为陈魁亚（方思琼已在一九二六年春调潮安大寨、庵埠、潮州市搞工人运动）。

秋收后，地主因收不到租，又想组织武装出来抢租，因此又爆发了全县农民武装第二次围攻普宁城。这次斗争更激烈，更有秩序，更持久，一直到二七年春才解围，保证了农民秋收的胜利。

这一年敌我斗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双方都在调聚力量，准备力量，做一次决定谁胜谁败的较量。以方氏为主的地主阶级，它的策略是：作防御性的让步，以刺激城乡各处豪绅地主的警惕，并适当地对他们作一些让步，取得团结一致对付农民，避免成为城乡对立，孤军作战；同时，利用蒋介石的逐渐反动，取得合法地位，组织社团，武装流氓、烂崽、土匪，及被欺骗的失业贫民。我们的策略是积小胜准备大胜，步步进攻，步步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培养骨干，使民主革命进行得彻底些。可是，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斗争也受到很多限制，对下面领导的斗争，上级经常批评“过火”。

四

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敌人开始在上海屠杀工农及共产党员，接着，广东在“四一五”也干起来了。

如果党的领导正确，在广东，我们不仅有遍于全省的工农组织、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还有国民革命军中的青年革命分子，坚决和敌人作战，胜利是应该属于我们的。可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事先就下令不准抵抗，不准撤退，结果形成了悲痛的“四一五”事件。

潮汕各县，尤其是普宁，已有广大武装组织，干部和群众对蒋逆叛变极为愤慨，虽然在投降主义的命令下不敢出击，但都集结了一些干部和武装，给来进攻的敌人一些打击。如潮安自卫军，杀了下七都反动堡垒的孙文主义学会七个豪绅地主反动分子，并消灭汕头警备司令部派到宏安乡作反动宣传的十三名反革命分子。潮阳、揭阳，在关埠、炮台沿江截击载运敌人去残杀农会会员的榕江轮船。普宁，则在各地退来的干部协助下，发动了城郊区，下社区的广大农民武装，消灭了地主从汕头调来残杀农民的整整一个连，带路的反动首要方修彪等五、六人，也同时落网。

人民的斗争虽很英勇，但由于没有经验，下级党不敢抵抗上级机会主义的投降命令，许多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又都是“学生仔”，既不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平时会说会写，此刻手忙脚乱，只死抱着上级命令，“向海陆丰撤退”，有的甚至以“到武汉和蒋

介石打官司去”而怆惶逃跳。“土包子”干部，虽然决心和敌人拼，提出“杀他一个够本，杀他一双倍利”，或“上山当‘土匪’”，但恪于“团体”（以拇指及食指交圈，代表组织）决定，不敢不执行，打一打后，也不得不随着农军撤退。普宁反动头子之一的张凌云，潮安的辛子基与揭阳的陈箇民，这三个孙中山的叛徒，就潮汕反动派“清党”胜利作出总结说：共产党有严密组织，服从上级命令，很难打；但这次给我们打垮，也恰好是把它这一优点变成弱点，他们没有命令，不敢行动，因此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打垮了”。这是多么痛心的教训！

此时地主的策略，照普宁地主阶级的“参谋”方铁屎所说的，是“先爆炒芥兰，后红焖猪脚”。意思是猛火热油的“炒”（剿、杀），把群众热情镇压下去，然后用文火慢慢“焖”、“炖”，慢慢清乡、剥削熬煎，多方折磨农民。

党员一部分跟着农军到海陆丰，一部分逃到南洋，一部分隐蔽起来，也有小部分无耻地自首了，因此农民中的老头子，只好暂时出来和敌人妥协，缴罚款、赔租息、出通缉干部的花红银。而清乡所到地区，放火烧屋，鸣枪杀人，抢掠财物，强奸妇女，更是惨绝人寰，丘塘乡就有一个妇女，被十三人强奸致死。

第一区的八乡、第二区的四十股、第四区的六乡仔，受灾尤为严重。

这一笔血债，牺牲的同志、工农群众，被烧抢的房屋、财产，虽然到现在还没有过计算，但肯定是很大的。这就是蒋介石、地主豪绅所造成的，这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永远也必须记住。

五

石头压不住青草，血腥的屠杀也吓不倒求解放的人们。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走了，群众说："同志呀，你们的炉子是有轮子的，到处能搞饭吃，可是我们的屋子却不能搬啊！"不斗争，听凭烧杀抢掠，如何得了？！群众对统治集团的憎恨，可由下述民歌看出："甫母蒋介石，治民如落药，管着天就旱，勿甫伊就着"。（潮语）

到六、七月的时候，党便有了"恢复组织，秘密活动，联系群众，向敌人反攻"的命令。不久，又提出"发动群众，以赤色恐怖来答复敌人的白色恐怖"。广东区委也派了原任汕头总工会秘书长的地委委员陈振韬同志回潮汕来指导各县工作。

各地工作的恢复，主要在最穷、最苦，受压迫最厉害的"食乡"开始，而宗主乡（大乡，大族），则从小姓孙房开始，另一方面，是靠山偏僻的乡村。虽然不懂得"乡村包围城市"、"搞三不管的地方"的理论，但其发展规律是一样的。在普宁来说，一区的八乡、二区的四十股、三区的白水磔一带，四区的六乡仔、五区的汤坑仔一带，六区的四乡、七区的大径肚一带，八区的大坪山脚、九区的铁山脚一带，都是长期斗争的据点，不仅和地主阶级仇恨极深，且都是靠着山区，便于和敌人进行斗争。

以赤色恐怖去答复白色恐怖，鼓起勇气，制止敌人的凶焰，是对的必要的。但运用的时候欠缺策略，形成大烧、大杀、大抢的盲动主义，不能发动更广大群众，则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敌人采取了疯狂的烧杀抢掠来对付据点，利用了大乡大族被欺骗的群

众组织“布袋队”来协助其抢掠奸淫，据点群众的斗争怒火，又只好遏住，要求武装不要住在他们乡里，以免受累。那句“同志呀，你们的炉子是有车轮的，我们的房子是不能移动的”的老话，又在新的内容下喊出了（意思是敌人来了，你们会撤退，可是我们的房屋要受焚毁）。

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贺叶军进到潮汕的时候（虽然为期只有七天，老百姓叫做七日红），已是秋末了，时间虽然很短就失败了，但整个潮汕城镇都被工农革命军占领，普宁最反动的堡垒——县城和果陇乡都被攻下，群众的兴奋情绪异常高涨。可惜当时党的政策有错误，一、不发给群众以武器，武装群众直接行动，肃杀豪绅地主；二、土地革命纲领不彻底，不符合实际（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三、政治面目不明确，还打着“杀人放火”的国民党党徽的旗帜（海丰百姓说是“白色恐怖的象征”）。当然，军事上的错误，使敌人已集结兵力来对付我们，但在短促七天的占领中未能采取措施来适应群众要求，终于使革命的部队在普宁流沙圩溃散。

普宁党除各方面协助保证负责同志，如周恩来、贺龙、郭沫若等安全撤出战区外，最主要是收集在地方中的伤病员同志。潮汕各县也都是如此。因此，贺叶军虽然失败，但我们却有了军事干部，有了留落武器，而且各地党的组织都恢复了，因此武装斗争蓬勃的发展起来，并且打着土地革命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群众唱出：“甫甫甫，田仔甫田主，田仔耕田耕到死，田主在家吃白米。地是天生个，起来共伊刮，工农兵团结，打倒反动派，有作就有食，人人都爽快。”（潮语）展开对地主反动武装剧烈的斗争，基本上控制了全潮汕的广大乡村。武装当时

命名为工农赤卫团，汕头澄海为第一团，潮阳为第二团，潮安为第三团，普宁为第四团，……各团都有共产党员作党代表（方思琼是第三团党代表）。

海陆丰及广州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革命的政治方向明确了，这给未来斗争指出光明美丽的前途，增加了信心。暴动失败后队伍部分退到东江、潮汕，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师。虽然也刺激农民再度起来斗争，但可惜，当时党还没有斗争经验，一不懂得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二不懂得游击战争，强攻硬打，三不懂得结合群众斗争，解决群众生活上的急迫要求，单纯军事行动，再加以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压迫，一直到是年（一九二七年）冬，斗争始终形成拉锯形势。一九二八年春，又因地委集中各县的县委书记在汕头开会，被敌人包围，结果以省委巡视员叶浩秀为首的，地委书记陈振韬、市委陈国威，以及方临川、吴文兰等二十八人被捕，其中二十一人立即被敌人枪决。党内旋又发生了方维精不服从领导，在潮阳组织三K党与党对抗，部分武装又蜕化变成土匪（如张炳奎），省委巡视员沈青、徐克家二同志，又在揭阳五房山被敌袭击牺牲，各地农会干部被捉杀也很多，据点房屋多被烧光，群众斗争情绪逐渐低落，逃跑到南洋的日多，许多大乡村的工作，被豪绅地主夺去，平原工作，大多形成秘密，武装都撤到山地，每县不过留存百数十人，且因连年苦战，住无定所，不懂得如何建军，以致患疟疾病的占百分之百。是年夏秋之间，斗争可以说几乎完全陷于休止状态，党的工作，只是开开会，教育党员，教育群众，坚持革命气节。

同年夏天，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在南山开惠、潮、梅党的代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讨论革命性质，议论纷纭，有的说是民权

革命，有的说是土地革命，有的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彭湃同志没有做结论，而敌人已来包围，因此会议被冲散，各人都抱着沉重心情回到工作地区去。

秋末，省委书记李源同志，亲到潮梅来指导工作，指出：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次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改变，不能暴动，不能硬拼硬打，必须善于调动群众，因此必须积极领导群众作日常生活斗争，由最低级做起，丑化豪绅地主、反动军官，加他们以符合实际的丑恶绰号，秘密分食他们管辖地区的作物、鱼牧牲畜，搞到他们低头，以壮群众的胆量。然后逐渐引导群众以年情不好，要求减租减息，直到抗租抗息的斗争，结合组织地下武装，待机行动。这个指示对于武装斗争受到挫折以后，地下工作应如何做，解决了很大问题。各地都依这个指示耐心而艰苦的去接近群众，教育群众，领导各种各式的斗争，一点一滴的扩大党的影响，积蓄力量，慢慢地把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可惜英勇而机智的工人阶级的儿子李源同志（海员工人，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去到大埔巡视时，在三河坝与大埔县委书记邓风翔同志同时被捕而牺牲（当时省委有人说，潮梅真是“不毛之地”，去一个牺牲一个）。

断续起伏的小斗争渡过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季。工作是艰苦的，成绩是伟大的。

为着避免敌人对农民的屠杀，工作和武装的行动是昼伏夜出，住的是破房烂屋，荒郊茅阴，任令风吹雨打，半饥半饱，嘴甜舌滑的去接近群众。良善的老太婆，说这些农民阿哥连宫庙都不敢住（怕敌人搜索），真比讨饭的都不如，每每掉泪劝说不要搞了，回家去吧。可是，每个信仰真理的共产党员、武装战士，都有一

颗不能屈服的雄心，斗到底，斗到死，每人不仅有射击敌人的子弹，而且还有决心在被包围不能脱险时准备自杀的最后一粒子弹。

很多同志，成年赤脚睡地下，得疾病死亡不少，如方家悟、方书丹、方思忠等。

由于工作深入，方法对头，整个农村除地主较多较大的乡里外，工作都恢复起来了，尤其武装被迫上山，各地加强了山区工作，成为颠扑不破的据点，如潮普惠之南山，潮澄饶之凤凰山、桑浦山，揭五丰之八乡山，梅埔之铜鼓嶂等，都成为后来东江苏维埃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春，省委为传达全国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在香港开办训练班，调动各县县级干部轮流去学习，课目有六大政治决议、农民问题、职工运动问题、游击战争及巷战问题。游击战争的课是聂荣臻同志负责的。尽管从今天看来，六大政治决议等有其缺点，一些且有错误（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但解决了当时每个党员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等。受过理论武装起来的党，配合着英勇斗争的广大群众的顽强斗争，工作又跳跃式的开展起来了。

到秋冬的时候，我们不仅成立了揭五丰兴梅之赤卫四十六团，潮普惠之赤卫第四十七团，潮澄饶之四十八团，海陆丰之四十九团，兴宁寻邬之五十团，而且每县有驳壳连（或独立连），每区有常备武装一班，各乡也普遍成立秘密的赤卫队，准备和敌人再作一次较量。

是年秋收，山地已完全抗租，有我们队伍活动的地区，敌人也不敢下乡收租了。乡村的政权，都掌握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农民

协会手里，有的县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以与敌人的县政府对抗。普宁在是年秋于南山锡坑、三坑、大窝一带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李崇三、何石为正副主席。到附城及大市镇地区，敌人仍不时出来“扫荡”，我们已和群众打成一片：敌进乡村，我退田野；敌回据点，我继续工作。

一九三〇年清明前后，东江特委在八乡山召集代表会议，讨论暴动问题。

此时地委书记是林道文，潮安县委书记杨少岳，潮阳县委书记李大林，揭阳县委书记张家骥，普宁县委书记方思琼，惠来县委书记林醒光，梅县县委书记黄焕，赤卫团的团长为阙龙（后为李英）、李恩平、田时彦（后为陈开乾）、彭桂、刘光夏。还有特委常委古大存、杜式哲、颜汉章、林国英等。

此次会议，是在立三路线的思想指导下开的，突出的问题是要促成惠潮梅总暴动，尤其可笑的是提出战术上要攻坚，有人说应是攻要，但受了批评。会议通过了暴动的决议，通过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以陈魁亚为主席，通过成立红军十一军，以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治委员，罗欣然为政治部主任，通过在汕头举行暴动等。

本来农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验，已经批评我们过去右倾，又批评了我们的盲动“左”倾，说共产党好是好，忠心、勇敢，可是就是没有“军师”。自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们实事求是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后，天天胜利，群众都说好了，现在共产党有“军师”了，这些话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倾听，而下层干部水准低，只懂服从（服从是好的，盲目服从就不好），结果又栽了一个大筋斗。

政治上树敌太多，打不胜打，群众工作上只号召参加暴动，不做生活斗争，动员的人数不多，军事上强攻硬打，结果损兵折将，又随便处分战争失败的军事干部；城市的暴动领导不起，只能丢炸弹，散发传单。总暴动不成，到秋初的时候，除山地政权尚存在外，平原的工作因群众受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又低落下来了。

中秋前后，普宁虽然消灭县城出击的一个保安中队，杀死了中队长方昌伦，并乘势进攻棉湖镇，但当揭普两地反动武装向我进攻，我又不得不即日退到六乡月窟寨一带休整。

因为军事失利，党虽然到处宣传农民动手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土地，工农政权也颁布了没收分配土地的法令，但因群众害怕敌人进攻，时间又短促，办法不多，因此只有山区地方在谁耕谁种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下，基本是抽多补少，焚毁了一部分田契（地主的田契或藏到汕头县城，或拍相留底，烧得很不彻底）。

秋末，南方局书记李富春同志及邓发同志（化名一叫一秋，一叫广铭）等到南山来，召集闽粤赣边区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因闽西、赣南代表不能赶到，故只有惠、潮、梅各县党的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把三省边界根据地打成一片，有后方的巩固发展。会议突出的提出："暴动是艺术"，这就是说必须发动群众，联系群众，调动更多的群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尤其必须环绕着背向苏区、巩固苏区来向外发展。会议提出："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但这个口号很新，大家不懂，当时也解释不太清楚。会议有人要求从思想解决问题，感到打倒一切不对头，因此提出什么叫做辩证法？中国除共产党，国民党以外还有什么党派，它们的阶级性质、主张是些什么？但都没有讨论开来。因此会议在提

出以闽西为中心时，就发生了争论，大家仍然不愿意“上山”，不愿意将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向闽西靠拢行动。后来虽然一致通过，但思想是不通的，从以后军事行动可以看出：对于靠近闽西、赣南的兴、梅、焦、平、饶、埔边工作没有加强，不能与闽西、赣南打成一片。

会议是在潮阳南山下山溪村开的，中途也逢敌人进攻，可是敌人退后我们又继续开会。

会议选出邓发同志为闽粤赣边特区党委书记，并选出一批委员，留一半以上委员名单到闽西去开会选举。

会议开后，邓发同志即分批率同方方、肖向荣、蔡端、阙潮（李明光、罗欣然已在闽西）等到闽西工作。东江特委以颜汉章为书记（林道文、杜式哲已调省委），下设西南、西北、东南三个分委。

闽西的会议是在上杭北四区苏家坡开的。那时是冬初，会议除照样通过上述决议外，并开除了个别人的党藉。在闽西开会的时候，敌人向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围剿”已经开始，张贞、杨逢年军队向着龙岩、永定进攻，郭凤鸣、卢兴邦向着汀州、连城进攻，钟绍奎结合广东军阀向着上杭进攻，因此，闽西、东江、赣南实际已被敌人隔断，联系异常困难。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边区党委又不得不把东江特委工作，仍交由广东省委领导。是年冬，敌第三次“围剿”被我粉碎，苏区中央局搬到瑞金，直接领导赣南工作，因此边区党委实际只有领导闽西，后来特区党委便正式改名为福建省委。

由于反立三路线不彻底，党中央四中全会后又产生了教条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东江的苏区没有坚决向北发展，取得

与闽西、赣南打成一片，得不到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直接配合。再加以广东军阀力量比较强大，地主的狡猾，我在肃反中犯了逼供信的错误，干部政策的教条宗派，使以后四、五年的斗争虽然持续反复，顽强坚持，但到一九三五年各个根据地，都受敌人占领，地主武装恢复，而特委、县委也基本上受敌破坏，组织涣散了。

过去敌人对我根据地进攻，我们基本上是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其战术的运用是：敌如进攻我南山，我即分兵出动，攻击敌之县城市镇，各县各区武装即在敌据点周围肃杀反动派，破坏交通，积极活动展开工作。如在南山内则坚壁清野，以突击队在敌周围和敌周旋，杀捉其交通兵、哨兵，断绝其供给线，迫使敌人不得不撤兵回去巩固它的老巢。这就必须坚持平原工作，以与山区工作密切配合，敌未动我已知，敌出发前我已部署好，队伍转移好。

后来敌酋张瑞贵得到地主陈益斋的协助，首先利用叛徒破坏我平原组织，采取软化自首方法，威胁干部家属迫使干部投降或过洋，拆散我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秘密捕捉我与省委联系的交通员，洗出特委密写给省委的报告和省委给特委的指示，然后又重新密写好让我交通员带到省委及特委，这样敌人对我情况完全了解，我则蒙在鼓中，照章办事，结果当然着着碰钉，步步失败。再则敌对我底细摸清，叛徒带路，如杨海云、方和平、方光庆、林植梅及以后的李崇三（东委书记），遂放胆将进剿变 成驻 剿，修马路、架电线、建立地主反动政权、反动武装，原有的老干部张家骥、林醒光、杨少岳、彭泽、何石、陈开乾、彭桂、张典光、林甦、陈魁亚等都英勇牺牲，颜汉章等在肃反时自己干掉，古大存受排挤。死的死，走的走，叛变的叛变，接手的人既无斗争经

验，尤其缺乏与群众联系，平原工作受破坏后没有恢复，干部来源就更无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春，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东江特委虽然派了书记徐国声去出席，但后来一点消息也没有，肯定是在归程中牺牲了。

自一九二七年起的百折不挠、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到一九三五年除了古大存同志尚领导一小部分武装在埔丰边活动外，基本上全部工作给敌人打垮了，地下党也陷于解体状态。

六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东征胜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提出，一九三六年“六一”的西南事变，接着“双十二”张杨扣蒋，全国掀起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埋伏着的党员以及从北京、上海、广州读书回来的共青团员，又开始了庄严的革命工作。

以敌人心脏陈益斋所办的兴文中学为据点，有马士纯同志的活动；在汕头、梅县有李碧山、李平、陈光、杜桐、徐杨、曾应之以“潮拉”，海岸线文艺的活动；继之有林美南、罗天、陈阿细等在潮普揭农村小学中的活动，并且与香港南方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七年夏，方方到延安向中央报告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工作。回潮汕时，取得南委的同意，正式恢复潮汕党的工作。建立韩江工作委员会，直接受闽粤边特区党委领导。曾经停顿一个短时期的潮汕的党，普宁的党又逐渐成长起来了。以下情节，知道的人很多，本人所写，到此搁笔。

漳浦事件

卢　胜

〔编者按〕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闽南地区爆发了一次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这次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丑恶表演，也是当时闽南地区红三团负责人何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本文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叙述了“漳浦事件”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红军撤离漳州之前，派出一批干部、骨干，拨给一部分枪支弹药，在闽南游击队原有的基础上，帮助组建了红三团。在中国共产党闽粤边特委（后曾改闽南特委、漳州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团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闽南的平和、漳浦、南靖、龙海、诏安、云霄等县的广大地区，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四十九师、八十师、七十五师、一五七师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先后发动的一千多次军事进

攻，摧毁了敌人堡垒一百五十余座，歼灭了数千敌人，缴获各种枪支一千多支(挺)。在那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里，红三团指战员百折不挠，毫不动摇，使闽南这块红色的土地成为我党领导的南方十四个革命根据地之一。红三团英勇卓绝的斗争，在祖国南方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然而，在红三团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极为沉痛的教训，这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全团近千名指战员在漳浦县城关集中时被国民党军队强行缴械，成为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为复杂的因素，主要是国民党一五七师背信弃义，违反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但当时闽南特委书记兼红三团团长何鸣，忠实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丧失革命警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红三团广大指战员在事件后，面临困境，仍然想方设法，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早在一九三六年秋，广东军一五七师奉命驻防闽南，采用“驻剿”、“搜剿”、“堵剿”等各种方法，配合当地保安团沈东海、张锡九、陈坤等部，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被迫同意合作抗日。这时，闽南的漳州、石码、小溪、漳浦、诏安等地，同全国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到基层。为了停止闽南长期内战，争取国民党一致抗日，中共闽粤边特委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和政策，准备直接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谈判，并向驻漳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可是，敌人对我的进攻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妄图利用谈判来消灭我们。为了击退敌人的猖狂进攻，十二月间，我们组织

两个连队采取灵活的战术，袭击一五七师驻漳浦杜浔、霞美、懂门、白石沿海一带的部队及张锡九保安队反动武装，给敌以沉重打击。加上各地抗日高潮的压力，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平和板仔高坑村，一五七师被迫与我闽南红三团进行首次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敌人继续向我进攻。当时我们提出的条件，原则上是以党中央发表的宣言为基础，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对苏区的诬蔑和封锁；红军停止打土豪，但一切经费由国民党政府负责；红军放土豪，国民党政府放政治犯；红军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但政治上保持独立；要求给予民众抗日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原有苏区根据地仍由我们管理，行政上由国民党政府领导。此外，还有实行民主政治，保持领土完整，优待抗属等条件。

一五七师则提出要把红军改编为保安队，并要撤离山区，开到厦门、海澄或石码集中。双方争执不下，后来他们要我们驻平和县小溪，可是没等我们研究答复，敌人又提出要我们驻漳浦县城。何鸣当即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内部看法很不一致。

在这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同志曾给何鸣来信，要求在谈判中提高警惕，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未得中央指示，不能离开根据地。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特委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南委，一面派何鸣与一五七师继续谈判。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何鸣从一开始就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过高地估计一五七师的抗日情绪，对一五七师的阴谋认识不足。在谈判过程中，

何的错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未得到南委指示、也不经集体讨论的情况下，竟擅自无条件地接受一五七师提出的要我军部队集中在漳浦县城的条件，上了敌人的当。

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六·二六”协定签订以后，特委在高坑召开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围绕部队的集中、对吴金（独立营政委，违犯组织纪律，私自与敌人谈判）错误的批判和统一干部思想等三个问题进行，整整开了十天。在部队集中问题上争论最激烈。何鸣认为我军继续在山沟里游击扩大不了影响，主张把队伍开到城市去；我和朱曼平（漳浦县委书记）、彭德清（漳浦县工委书记）等同志坚决反对把队伍撤离根据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也都不同意何鸣的意见。何则以“破坏统一战线”相威胁，强词夺理，坚持自己的主张。吴金则是大吵大闹，主张按何鸣的意见办。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特委主要负责同志，丧失原则，作了让步，竟然同意将队伍撤离根据地，按国民党一五七师的要求，开到漳浦县城孔庙集中。由于会议没有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而作了错误的决定，这就为“漳浦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部队从高坑到小溪途中，在平和坂仔圩接到南委的重要指示：部队要住在基点内，不能开到平原去。何鸣以种种借口拒不接受南委的指示，南委特派员姚铎竟然不坚持南委的正确意见，就走了，结果部队没有执行南委的指示撤回根据地，失去了一次避免“漳浦事件”发生的时机。过了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了，一五七师又以此为借口，要我们赶紧到漳浦去集中。当时，何鸣根本不与大家商议，就独断专行把队伍开进漳浦县城。

七月十四日，队伍驻进孔庙后，漳浦县委书记朱曼平同志和

在漳浦负责白区工作的彭德清同志，把从各条渠道得到有关敌人准备搞我们的可靠情报，及时通知何鸣等人。何鸣不但不理，反而说，别怕，有本大队长在这里，“不要庸人自扰”，并要他们放心工作。何接此重要情报后，不但不立即通报，而且当我们问有什么情况时，他也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而是说一切正常，没有什么。何将地方同志提供的这个重要情报对我们隐瞒，又一次失去了避免“漳浦事件”发生的时机。

事件的前一天，老彭来到县委所在地——漳浦下布，把敌人机枪连在石榴板准备搞我们部队的情报通知县委。情况十分危急，漳浦县委立即派了一位同志化装进城去报告何鸣，并要何采取有效措施保卫部队，何鸣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对我们封锁消息。七月十六日上午，敌一五七师以集中点名发饷为名，要我军到体育场集中。何鸣叫我集中部队，我不干，出去看地形，回来时看到部队已由值星连长符义山同志集合出来了。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不知所措。在路上，我们的战士发觉有情况，立即报告何鸣，何鸣却说：“不要紧，我们会处理的。”当我军进入场地站好队以后，一五七师的一个旅长走出来蛮横无理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你们要把枪放下。当时指战员一听，感到不对头，谁都不愿把枪放下。国民党旅长指着周围已埋伏好的火力，又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不放下，请看！见此情景，我与王胜同志主张武装反击，坚决冲出敌之包围，即使有些牺牲，也不至于全军覆灭，冲出后还可以重新组织起来。但何鸣以党纪军纪相要挟，要大家服从命令，等我党中央来处理，当场有十几名战士昏倒在地上。就这样，避免“漳浦事件”发生的最后一次时机也失去了！红三团被敌人不发一枪地全

部缴械了。这是闽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惨痛的教训，也是红军史上仅有的一次“记录”，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漳浦事件”主要责任在何鸣身上。但特委在指导思想上失掉警惕性，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漳浦事件”同天，在高坑会议之后接任特委书记的张敏同志在诏安月港开会布置工作，诏安伪保安团沈东海奉命集中数百敌人包围长浦月港。由于张敏思想右倾，认为已经和平合作了，不许同志们抵抗，致使我开会干部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捕。特委书记等十三位同志被敌人押到诏安县城后，全部遭枪杀。他们的牺牲，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漳浦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一，要坚定不移的执行上级指示，特别是党中央的指示。何鸣置南委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劝告于不顾，是其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漳浦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件事告诉我们，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应当坚决执行，个人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按组织程序提出或保留，但行动上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尤其是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能说三道四，符合个人口味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置之不理，自行其事。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二，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何鸣身为特委书记兼红三团团长，集大权于一身，逐步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为什么都只有自己行，听不进其他同志的意见，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样，他就必然会片面性、主观性，不可避免的要犯错

误。按照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在党委内部，书记与其他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书记虽然在工作上负有更多的责任，但表决时都只有一票的权利。党委内部绝不容许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拍板定案。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

第三，要认真开展思想斗争。在高坑会议及其前后，不少同志对何鸣的独断专行有所觉察并且反感，但因为当时何在干部中有较高的威望，大家出于对他的尊重就没有很好地开展原则性的斗争，甚至连特委负责同志也迁就何的错误意见，这就从客观上助长了何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相反地，如果当时真正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及时地、严肃地批评和纠正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就有可能帮助何改正错误（至少可以减少错误），也就有可能避免“漳浦事件”的发生。

“漳浦事件”后，我找参谋长王胜及符义山、陈高顺、欧育超、林少克等同志个别商议，决定组织大家突围，回根据地重整武装，与反动派继续斗争。当天深夜，我与一批骨干首先胜利突围，接着又出来一些同志。以后敌人加强了控制，实行戒严，其他的同志出不来了。这样，全团大约有二百个被抓去编入国民党军队，五、六百人自行散失了。在漳浦县溪南、下楼、下布等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先后有一百多人到漳浦下布清泉岩集中，大部分是班、排干部及老战士。部队在清泉岩进行整训，仍称红三团，组织上指定我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并成立了第一连，连长陈容，指导员欧育超。

“漳浦事件”发生后，整个闽南地区顿时乌云密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各地的地主恶霸疯狂地向人民反攻倒算。面对这种

情况，我们在漳浦下楼村，镇压了进行收租倒帐的反动保长蔡溪海，极大地鼓舞了基点村群众的斗争情绪，接着就分五路到厓仔石山、乌山、平和内山、狮头、南分等地，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筹集枪枝弹药，解决经济给养。林路同志仍在平和一带工作，朱曼平同志在漳浦一带，我到乌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根据南委指示，成立漳浦中心县委，组织上归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年九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同志率领闽西一排武装并带一挺机枪来闽南，支援我们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同志在闽南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谭震林同志的指导、帮助下，闽南的党组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得到了恢复。

云和诏一带，由于月港事件，工作损失很大，领导同志都牺牲了，只保留了伤兵处的二十多个伤兵。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女共产党员、后方伤兵处负责人李梨英同志，鼓励大家要相信党，要坚持斗争。她组织伤好了的伤兵们分散作群众工作，借粮解决困难，整整坚持了两个月，队伍扩大到三十多人。我们去了以后，配合伤兵处的同志和地方党组织，使乌山、月港、坪路、坪水一带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我们广泛开展工作，把地主豪绅反攻复辟的凶焰打下去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敌一五七师调驻厦门后，省保安第三团张闾部，配合云霄、诏安、平和等县的保安队、壮丁常备队共五、六百人，到平和仙石、四近塘一带根据地实行军事"剿共"。闽南红三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这一仗，给闽南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这时红三团已恢复和发展到三百多人。

以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张云逸同志亲自与国民党谈判，并经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驻漳浦的国民党汀漳师管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才不得不交还我们三百多件武器。

一九三八年一月，红三团在平和坂仔整编为三个战斗连。队伍开到龙岩白土集中后，正式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营。这时，组织上命我任四团团长。同年二月，这支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和广泛群众基础的闽南红军，同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各省红军游击队汇合一起，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前线，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

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将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记叙下来，并作为对英烈们的缅怀。

（张造勋整理）

向陈毅同志的一次汇报

温　仰　春

一九三八年春，我受闽西南党组织的派遣，从闽西南革命根据地前赴南昌向新四军军部汇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同志极其热情地接见了我。他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耐心地听取汇报，亲切地作指示，给我留下了很多难以磨灭的印象。四十年过去了，那次会见的情景，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南地区敌人有十个主力师，加上保安团、还乡团、民团以及所谓壮丁队等等，为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敌人以数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对我方进行残酷的“围剿”，形势是极为险恶的。但闽西南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终于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陈毅同志听我汇报到这些情况时，脸上立即浮起了胜利的微笑，以自豪的语调说：这是闽西南的党组织和同志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结果。接着他回顾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情景，无限深情地说：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是毛主席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极力主张武装起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点燃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的烈火，并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岗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陈毅同志谈到这里，打着手势着重指出："这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和我谈话中，当他讲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时，脸上马上露出严厉的表情，愤怒斥责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他提高嗓门说："他们根本不懂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根本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们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和红军的指挥权后，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按照他们那些死教条指挥起来，哪有不失败之理！"他用手敲着桌子说："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接着，陈毅同志向我说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他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显出了十分高兴的心情。他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就是胜利，否则就一定失败！"他的话使我不禁回忆起当时闽西南地区广泛流传的关于陈毅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为排除王明路线的影响，坚持长期艰苦斗争的生动事迹。

当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陈毅同志因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行走不便，党决定把他留在江西苏区。那时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加上地方武装和机关人员，约有二万多人。但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当时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项英同志根本没有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长期游击战争的打算。在敌人完全占领苏区的形势下，还错误地提出"保卫苏区"的口号，主张集中调遣所指挥的红军到瑞金、会昌一线，对敌进行阵地战。他自以

为这样可以拖住敌人后腿，有利于长征途中的红军在湘西打胜仗，而后可转入反攻，收复失地。结果，由于敌强我弱，我军与敌军罗卓英等三个纵队，经过阵地战的硬拼，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旅，仍不能扭转局面，自己却受了较大的伤亡。到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间，形势更趋恶化。到三月份，我军全部（包括随军野战医院的许多伤病员在内）都被围困在江西雩都仁风里大山上。山下有河，到山下农村去必须越过这条河。敌人在河的两岸都筑了堡垒群，完全封锁了去路。

眼看敌众我寡，我军面临非常危急的局面，陈毅同志挺身而出，极力反对再行硬拼。他坚决主张及时突围，然后分兵农村各地，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他认为只有这样，革命才有周旋的天地，才有光明的前途！后来项英同志终于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正确主张。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四方漆黑的晚上，我军分别由陈毅、贺昌、蔡会文等同志指挥，分多批突围。陈毅同志则率领部分红军转战到罗霄山脉油山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就这样，在最关键的严重时刻，陈毅同志使红军摆脱了由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所造成的被动局面。

当我汇报到，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闽西南的革命根据地对外交通被截断，没有电台和毛主席、党中央以及陈毅同志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取得联系，只得独当一面坚持斗争的时候，陈毅同志说，我们江西也是这样，没有电台可以联系。他用宏亮的声音说：敌人可以截断我们的交通，却怎么也不能切断我们广大战士、群众和党中央心连着心！那时候，我们时刻惦念着毛主席，时刻关心着红军的长征啊。没有正面消息，就从敌人报上的新闻中，从反面去判断红军长征的进展情况。长征每前进一步，都使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莫大的鼓舞。陈毅同志又说，我们也关心着闽西南地区的斗争。当从报上看到有关闽西南军民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坚持斗争的消息，同样十分高兴。接着陈毅同志以极其豪迈的语气说，现在长征胜利了，南方八省革命军民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也胜利了。这个光辉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陈毅同志铿锵的话语，直到今天，好象仍在耳边萦回，使人受到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我向陈毅同志汇报说，有一次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转移到永定县大阜村时，遭到陈荣光匪军的突袭，被包围在一个山头上，十分危急。是刘永生同志率领的独立营、谭震林同志率领的支队一起向敌人包围圈冲杀，经过内外配合苦战才脱险的。陈毅同志听后立即说，三年游击战中，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被敌人包围突袭的危险，但是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有无产阶级的气魄，无所畏惧，随时准备为人民而牺牲。因此总能够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前进。这时候，陈毅同志也把自己的回忆追溯到一九三六年梅山战地上去了。他说那年冬天，梅山被围，他伤病在身，潜伏在丛莽之间已有二十多天，心想这次恐怕不能突围脱险了。他决心不惜牺牲战斗到底。在敌人重重的包围中，仍自岿然不动，挥笔写下了诗篇《梅岭三章》，放在口袋里，然后准备拼一死战。谈到这里，陈毅同志兴致勃勃地为我背诵了这三首诗，其中一首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同志为革命不怕牺牲的决心，跃然纸上，它表示出，即使牺牲了，也要在泉台招集旧部，高举革命旗帜，把统治着地狱的一切魔王斩尽杀绝！这种对革命事业赤

胆忠心的光辉形象，不但动人心弦，而且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啊！

那次同陈毅同志的亲切会见，使我十分感动并深受教育的是贯串在他整个谈话中的那种强烈的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他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军从江西雩都仁风里山上突围前的一场紧张战斗。当时形势已是千钧一发，怎样转移非战斗人员、伤员和群众成了最大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临危不乱，他紧密依靠当地组织，让群众把伤病员作为自己的亲属接回家去或转移到安全地带去继续养伤治病。同时，陈毅同志又把当时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邓子恢、何叔衡等同志，通过精心安排，越过敌人防线，转入白区去领导革命斗争。

他以十分关切的心情，问起转入白区的同志沿途的具体情况。我告诉陈毅同志，何叔衡等同志从瑞金到长汀四都后，由福建省委派的武装部队护送。经水口区渡过汀江后，被敌人发觉，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邓子恢同志脱险归来，何叔衡同志不幸牺牲！陈毅同志听后，面孔变得十分严肃沉痛，流露出对何叔衡同志无限的哀思。他连声说，何叔衡的牺牲是党的巨大损失！何叔衡的血不会白流，革命党人一定会战斗到底，完成先烈未竟的事业！当时，我又谈到张亮等人被俘后钻进了狗洞，叛变了。陈毅同志立即拍案而起，高声斥骂道："叛徒可耻！可耻！比狗屎都不如！"陈毅同志站了好一会儿才坐下来，并大声地说，共产党人既要经得起战场的考验，更要经得起刑场的考验。要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贪生怕死，投降变节是极可耻的！接着我又报告说，在三年游击战中，正面的敌人不足畏，而少数内部的坏蛋的叛变往往造成很大的威胁和危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混入革命队伍

并一度窃取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的朱森就是其中一个。他向敌第十师师长李默庵投降，结果他所知道的补给线交通站大部分遭到了破坏，部分党组织也受到损失。陈毅同志听后不抑地又接连大骂："叛徒可耻！可耻！可耻！……"

由于听到何叔衡同志牺牲的消息，引起陈毅同志对许多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的怀念。他提到在仁风里山上突围时不幸牺牲的贺昌、阮啸仙等同志。为了悼念他们，他曾写过一首诗，就是现在已收入《陈毅同志诗词选集》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那天，我向陈毅同志汇报说：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闽西南地区的敌人采取了移民并村，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了疯狂的搜山"围剿"。那时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分散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在群众的掩护支援下继续开展斗争。张鼎丞同志亲自带了一班人深入到福建省永定县溪南古木乡。当时山上是敌人的堡垒，张鼎丞同志就在山下。他们在敌人的堡垒下面构筑地洞，潜伏在地洞中，依靠群众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敌人每天出操，喊什么"活捉张鼎丞！"下面都听得一清二楚。陈毅同志听后十分赞扬地说，共产党人就是善于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因此总是能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战胜敌人，这就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民战争。接着陈毅同志十分高兴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我们毕竟还在山上。现在我们下山抗日了，人烟稠密，龙游大海，我们更可以联系、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了！随后陈毅同志打着手势，满怀豪情地说，今天八路军在华北深入敌后杀敌抗战，我们新四军也要奉命深入到大江南北的敌后去建立抗日根据地。东起海滨，西至南京，北从徐州，南到杭州，都是我们战斗的广阔天地，是我们埋葬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地方。只要

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坚持抗战，我们就是善于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兴风作浪的孙悟空，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后来的事实已经说明，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广大军民终于建立了牢固的苏南、苏北、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山东的八路军联成一片，为解放战争中开辟华东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那天汇报中我谈到，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中，曾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山上，粮食没有了，便要饿肚子。吃野果和竹笋是很平常的事。……陈毅同志听后哈哈大笑了一阵，说，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饿肚皮又算得了什么？他告诉我，他们在赣粤边游击区也是这样。他谈到许多困难，特别是有关物质生活方面的，也就是他在光辉诗篇《赣南游击词》里所写到的："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浸衣被夏犹寒，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陈毅同志侃侃谈到这些战胜困难的事迹，使我深深感动。

陈毅同志那次接见我的地方，是在他所住旅馆的房间里。里面布置极为简朴，除床外，就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木靠椅和几张木方凳。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在桌上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主席著作。当他发现我在注视这些著作的时候，特地从书丛中拣出两本毛主席著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微笑着说，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了，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当前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这两篇光辉著作，对共产党人来说，特别重要！后来，当谈到新四军必须深入敌

后，在大江南北埋葬敌人的时候，他又强调要认真学习。事实证明，正因为他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并很好地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在建立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那天，待谈话快结束时，陈毅同志特别敦促我说，现在党的方针、政策我们都学习过了，需要赶快回去，集中部队开赴苏皖前线进行抗战！要时刻不忘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临别之际，我紧紧握着陈毅同志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我请他注意身体，多多保重。

陈毅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棵耸立在高山之巅的苍松！然而，他的晚年，竟然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百般诬陷迫害。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历史已经证明，这棵青松是谁也推不倒、砍不断的！它永远参天耸立，傲啸长空，万古长青！

黑茶山上觅忠魂

——“四八”烈士遇难纪实

周　怀　瑾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了以国民党为一方同以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为一方的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反复的协商和斗争，最后达成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

政协刚刚闭幕，蒋介石许下的“四项诺言”，余音在耳，参加政协各方代表通过的五项决议，墨汁未干，国民党内一小撮反动派就公开制造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并在三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悍然撕毁政协决议，特别是“宪法草案”。顽固坚持其一党独裁的立场，妄图在中国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王若飞同志作为我党的政协代表之一，与新从延安来渝的秦邦宪（博古）同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王若飞、秦邦宪同志赴延安，就“宪草修改原则”问题向党中央请示，他们与刚从国民党监牢里获释出来的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与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之后由

巴黎回到重庆的邓发同志，以及黄齐生老先生等一行十三人，搭乘驻华美军总部飞机由重庆飞返延安。不幸于当天下午因气候变化，迷失航向，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牺牲。

当时，我在晋绥边区一分区当公安局局长，住在兴县城里。四月十日下午，得到地委组织部紧急通知，令我赶去。踏进办公室大门，地委组织部部长苗逢澍同志十分沉痛的告诉我，当天上午黑茶山区委送来一张名单，上有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十三位同志的姓名。这张名单是当地群众在四月八日下午黑茶山上坠毁的一架飞机中拾得的。根据地委的判断，这是王若飞、博古等同志乘坐的飞机，他们已经遇难。

这份名单写在一张书写纸上，没有毁损，上面计有王、秦、叶、邓同志的名字，还有黄齐生老先生及其孙黄晓庄，十八集团军总部中校参谋李绍华同志，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女扬眉、子阿九、女工高琼，以及副官魏万吉、赵登俊两同志。

苗逢澍同志要我即去黑茶山飞机失事现场，搜集烈士遗体、遗物和在飞机上散失的文件。我马上回到公安局，带领局属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兼程出发。

黑茶山在兴县的东南面，距县城九十多华里。一路山峦起伏。落日的余晖，给群山罩上朦朦的暮障，山脊上偶露出一抹淡绿。入夜，气温骤降，寒意逼人。“得得”的马蹄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伴着寂静的队伍，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以急行军的速度，不断加快步伐。于次日拂晓，到达黑茶山下小村。

早饭后，在当地工作同志引导下，我们去到山脚。只见山势险峻，灌木丛生，枝蔓虬结，人迹罕至。据当地工作同志和群众介绍：四月八日那天，天色阴霾，黑茶山隐没在云雾之中，下午

二时许，从西南面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旋即一架飞机沿黑茶山下一条大沟，低空飞来，几乎紧挨电线杆；然而机头抬起，消失在云雾之中，随即一声巨响，震惊四围。第二天群众上山，发现飞机已经坠毁，拾得一份乘坐飞机人员的名单。

黑茶山拔海二千多公尺，上山无路。因为四月九日群众上山去看飞机，才踩出了一条小路。我们为了查看飞机残骸，沿着群众走过的小路，攀藤附葛而上，于午前到达现场。始见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已被烧光，到处是燃烧过的木炭和黑灰，空气中仍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和糊焦味。飞机是美军运输机。残骸主体斜卧在一块突出的巨石前约二十余米的山坡上。这块巨石高约十余米，质地坚硬，距山顶还有四华里，上面留着明显的强烈撞击痕迹。飞机残骸头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桨已经折断，摔在机头前方，残骸下面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着机体的碎片。

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分头搜寻烈士遗体、遗物和散失的文件。

在飞机残骸四周发现了烈士的遗体，但大都不很完整；只是头部面貌，还可隐约看出，躯干和四肢，则已很难分清。仅在机头右前方四十多公尺处发现一具完整的男孩尸体，全身呈现许多红色斑点，经核对辨识，为叶挺将军幼子阿九。

目睹此情此景，在场的全体同志都自动脱下军帽，含着热泪，肃立默哀。鉴于该处山势陡峭，小路难行。我们和地方工作同志一起斩木为筏，把烈士遗体一个一个的移置筏上，陆续运到山下小村麦场停放。

在搜寻烈士遗体过程中，发现有几只下肢残骸、大脚、黄毛，断定是美军机组人员。后来知道他们为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

迈欧上士和马尔上士。也一同运送。

烈士们随身携带的文件，已经烧毁散失。经过现场搜寻和发动群众，先后找到不少大小不等的拷贝纸片，上面字迹还依稀可辨，有的尚能看出内容。另外，还拾得博古和李秀文的两颗图章，以及被烈火烧坏的两枚圆形、蓝底白字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证章，成为烈士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

十二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锄奸部科长裴周玉同志，传达了上级要求查清飞机失事原因的指示。我同他再次去到山上进行勘察。根据实际了解，结合当地群众提供的飞机出事前的目击情况，经过分析、研究，一致认为：飞机是在飞越黑茶山时，因为气候恶劣，丧失能见度，而撞山爆炸坠毁的。

我因没有去过延安，对遇难烈士都不认识，因而对遗体无法确认。十三日，晋绥总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同志特地赶来，根据他的介绍，王若飞同志体型较胖，面部丰满；博古同志则较为瘦削；叶挺同志身材适中；邓发同志比较魁伟。经过谭政文同志的一一辨认，这个问题，才大体上得到解决。在当地工作同志和群众的参加下，将烈士和美军机组人员的遗体分别清洗干净，然后用白布包裹。

十四日，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李井泉同志来到黑茶山。他听取汇报之后，立即用电台向中央作了报告。遵照中央指示，由区上负责，动员群众，于当天将烈士和美军机组遇难人员遗体，运往邻近六十华里的岚县机场。

十八日下午一时，在谭政文同志护送下，由专机两架运回延安。

“四八”烈士遇难已经三十六年，时光流逝，岁月催人，但

回想黑茶山头寻觅忠骨的悲痛情景，至今还清晰地浮现眼前。王若飞同志生前最喜欢吟诵明代诗人于谦的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这正好是他光辉一生的形象写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一脉相承的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日子里，缅怀先烈的凛然正气，更加使人感奋。书此纪实，以为志念。

在莫斯科

——和陈郁同志的一段经历

何　一　民

陈郁同志逝世七年多了，我对陈郁同志的怀念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淡漠，相反，五十年前，我同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一起学习、斗争的那一段经历，我们亲密相处的情景，不断涌上心头，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在吉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天，接到党组织通知，调我到另一地工作。我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到哈尔滨，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才知道是派我到苏联学习，同行的还有张达同志。当时，莫斯科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到那里去，我们高兴万分。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们经绥芬河越过边境，从海参崴往莫斯科一路，寒风怒号的西伯利亚和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原野，在车窗外迅速闪过，我们仍感到急不可奈，恨不得一步跨到朝思暮想的红场。三月初，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初春的阳光照耀着冰雪覆盖的古老建筑，一切都显得非常晶莹明亮。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于次日到旅馆看望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明。

第二天，我们到离红场不太远的列宁学院报到，这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为各国培养革命战士的干部学校。我在办好了注册手续之后，被引到学生宿舍大楼，分配在一楼一间房里住。我一进屋，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国同志大步朝我走了过来，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他满面春风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李文，去年从上海来的。"接着，他又介绍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外国同志说："他是波兰同志，我们一起住这间房。"他一边帮助我安顿床铺，一边询问国内情况。当我说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不抵抗政策，抗日人民正遭受着残暴镇压的种种情况时，他愤怒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去同他们算账的！"同李文的初次见面，即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和蔼、热情的"李文"同学，就是参加领导广州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郁同志。他就象大哥关照弟弟一样，从学习、工作，到日常生活，处处给我以热情帮助。

那时，在列宁学院中国民族部的有李立三、李维汉、杨秀峰、苏耳、陈郁、林铁、吴克坚以及蒋经国等人，所有的中国师生都编在一个支部，陈郁同志是支部负责人。在国内，我们党处于本国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斗争极其艰险，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们之间都实行单线联系，行动十分隐蔽，处处要加小心。现在，到了莫斯科，正如鱼游大海，感到开阔舒畅。觉得头顶上的天，特别高，脚底下的地，特别宽，一天到晚喜气洋洋，学习和工作特别起劲。我第一次参加全校大会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自已。装饰着革命红旗的大礼堂内，坐满了自己的同志，现在可以纵情欢呼"共产党万岁"而无杀头的危险了！

当学院乐队高奏国际歌的时候，我热血沸腾，禁不住眼泪滚滚，我们合着旋律，用尽全身之力，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陈郁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咱们终究有一天要在自己的祖国高唱国际歌的！

不久，我们参加了莫斯科“五一”大游行。那天清早，列宁学院全体中国师生，穿上整洁的衣服，按照联共中央的安排，到郊区一间重要工厂，参加这个工厂的工人编队，以便从最靠近列宁墓的位置通过。我们举着用中文和俄文写的“中国工人”的横幅，走在这间工厂工人队伍的最前头。当我们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地快要走到列宁墓前的时候，站在检阅台正中的身穿军服的斯大林同志，看见了我们的队伍，他向我们热情地挥手致意，当我们走到检阅台正前方时，斯大林同志用俄语高呼：“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同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激动万分，拼命跳起来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站在斯大林左右的基洛夫、加里宁、莫洛托夫等联共中央领导人同红场上的成千上万的观礼者、游行者一起鼓掌欢呼，口号声象一阵阵春雷，响彻了红场上空。我们这些在国内遭受围剿、追捕、屠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的故乡受到了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欢呼，我们一个个欢欣雀跃，满脸泪痕，我们多么希望这震撼大地的“中国革命万岁！”的口号声，飞过千山万水，传到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传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耳中，传到正在同反动派进行浴血奋战的战友们的耳中！

列宁学院中国民族部党支部的工作，是很出色的。陈郁同志学习积极，工作认真，忠诚正直，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党内气氛

也是很活跃的。在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我记得支部大会开会时，发言最多的是两位，一位是李立三，他一发言，就要大批特批那个“立三路线”；另一位是蒋经国，他一发言，就要痛斥那些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反动派。他们的发言既多且长，往往占去了全部会议时间，但陈郁同志在主持会议时，总是让他们把话说完。

那知，当我沉醉于喜悦的时候，一场风暴却正在酝酿。原来，陈郁同志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同王明唱了反调，王明到莫斯科后，陈郁同志又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王明的看法，王明就想通过改选支部的办法，把陈郁同志打下去。此时我是完全不知情的，认为陈郁同志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就热情地推举他继续担任支部领导，大多数同志也持这种看法。因此，在表决投票时，陈郁同志仍然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党支部书记，我也被选为支部委员，在五个支委中（其中两位是候补支委），只有一个是紧跟王明的。王明的错误主张在这个支部得不到贯彻，他对这个支部很不满意，到处散布说，“这个支部弱，陈郁、何一民做一点工作可以，当领导不行。”他为了煽动一些人反对陈郁同志，孤立、打击陈郁同志，就经常在背后诬蔑陈郁同志。有些同学多次向我讲，说王明对他们说，“陈郁犯过错误，你们不要接近他，不要同他搞在一起，我很怀疑他”等等。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向学院党委作了反映，但是，当党委负责人同王明谈及此事时，他却故作惊讶，大耍两面派，说什么“他们都是好同志，我怎么能说那个话呢？”同时，却进一步加紧了对陈郁同志的打击报复。他用改选支部的办法，没有搞掉陈郁同志，又来拉拢支委会中支持陈郁同志的人。一个星期天，王明的一个追随者约我去王明家里，我不

去，他劝我说："你不要和王明闹僵，和他搞好了关系，将来回国或者留在莫斯科都有好处。"我说："我又不是为他革命的。"不买王明的账。因此，我也成了王明要打击的对象。

之后，王明借着周达文(即丘古诺夫)问题来整陈郁和其他不跟着他跑的人。周达文曾任中国民族部支部书记，后任学院政治教员，工作中有一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同意王明在诸如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等问题上的一些错误看法，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批驳了王明的观点，王明就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明及其同伙硬说周达文是"反党分子"，要狠狠整他。但陈郁等同志根据事实，认为周达文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分子。王明就说陈郁是"右派首领"等等。这个争论由学院党委反映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批回来，同意陈郁等同志的意见，不同意王明等人的意见，王明恼羞成怒，在学院党委宣读共产国际批示时，拒不出席会议，从此，更加仇视陈郁同志了。不久，王明就直接发动对陈郁同志的批判，说他是"右派"、"反对四中全会路线"等等，并公开声称，凡是同情陈郁的，不批判陈郁的也是右派。当时，林铁同志、杨秀峰同志等都不同意王明的做法，并且公开顶了他。他就把他们下放到乌拉尔山区工厂劳动。我是支部委员，又一直站在陈郁同志一边，当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王明为了调虎离山，对我采取了欺诈的手段。他对我说，你很年轻，有前途，先到工厂深造一个时期，接受苏联工人阶级的教育，然后再回来学习。并说，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并交给我一叠已写好了他的地址、姓名的信封，以示"态度诚恳"。但我到乌拉尔嘎利化工厂之后，写给王明的信就如石沉大海，连我的组织关系也不转去。这样，我即被卡断了同陈郁同志的联系。直到我回国后，才知道王明随后把陈郁同志也

送到工厂劳动去了。

在我被撵出列宁学院后，陈郁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不论王明的压力多么大、调门多么高、惩罚多么重，就是在批判时，他还是站起来发言，义正词严地加以反驳，直到被送到工厂劳动之后，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莫斯科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和陈郁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他和蔼的笑容，亲切的语言；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对同志和人民的无比深沉的爱，将永远留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记改造郭宝珊部队

张　秀　山

郭宝珊，河北人，他的部队共三个连队，二百多人，其中多是陕西人，年轻人很多，大部分是破产农民、穷苦老百姓。其中也有少数抽大烟的，但真有嗜好的人没几个。

一九三四年秋，国民党十七路军驻陇东的杨子恒部将黄龙山一带的土匪贾德功、梁占奎部收编为两个团，贾、梁分别任团长，郭宝珊为贾德功团营长。郭是受国民党的压迫才上黄龙山的，因此内心不愿投降国民党，加上他和贾德功、梁占奎的矛盾很大，因此一心想另找出路。待贾、梁二团经苏区太白镇开往庆阳、合水时，郭宝珊便托哥老会给我军捎信，表示愿投红军，接受我军改编。当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志丹同志，同意将这个部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便派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长马锡伍同志前去西华池，与郭宝珊部联系，于是，郭率部来到南梁苏区，接受改编。

郭宝珊为人正直，早先也了解红军的一些情况，知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很拥护；而国民党欺压老百姓，人民反对。所以他参加红军并不是偶然的事。一九三二年时，刘志丹同志率陕甘游击队打韩城，路上俘虏了郭部的三个兵，教育释放回去，让他们捎话郭宝珊，只有参加红军，才是他们的出路。以后刘志

丹同志还派人做了争取工作。

郭宝珊部队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以后，刘志丹同志任命郭为义勇军的司令，并派任浪花同志为政治委员，同时还派了一些政治工作干部到该部队进行工作。志丹同志对他们很关心，经常针对他们的思想情况，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他们初来时，最担心的是红军不信任他们。针对这种心理，志丹同志首先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有一次在二将川的一个村里，志丹同志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志丹说：你们来参加革命，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你们也是穷苦人，只是以前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你们不要以为过去当过土匪，我们就不信任你们。志丹讲话以后，郭宝珊很感动，立即上去讲话，表示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红军的指挥，遵守红军的纪律。

他们初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开了欢迎会，发动群众送猪、羊、瓜、菜，进行慰劳，对他们鼓舞很大。他们亲眼看到苏区人民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有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联会，人民和军队亲如家人。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国家的前途。

任浪花同志和其他政工干部，在改造郭宝珊部队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计划的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如何反动、卖国。这对郭部提高觉悟，坚定立场，起了重要作用。

郭宝珊部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以后，直接归红军四十二师指挥。当时师长是杨森同志，我是政委。为了搞好我军和义勇军的关系，使他们放心，在行军中常叫他们作后卫部队。宿营时，也让他们单位在一个村庄，不把他们拆散。杨森同志和我经常找郭

宝珊等人谈心。记得在围攻庆阳县的王蛟堡时，晚上我和郭宝珊谈话后，就与他睡在一个炕上，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我们回到后方梨园堡休整，正值召开“二·七”纪念大会，原计划在露天会场，后因下大雪临时改在一个大庙的大厅里。我看到有几个人疑虑红军缴他们的械，就站在外面。但是，整个会上都是讲革命道理，红军对他们真诚相待，丝毫也没有缴他们械的表现，慢慢就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这次会上，郭宝珊也讲了话，表明他参加革命的决心。自从这一次挤在一个大厅内开会以后，他们就更放心了。

以后，我们多次共同战斗，互相信任，密切合作。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们参加了我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庆阳黄大原战斗及合水的柳村原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他们打仗很勇敢，牺牲了好几个同志。

一九三五年春天，敌人大规模“围剿”陕北和陕甘苏区。根据刘志丹同志的命令，我带四十二师三团和郭宝珊的义勇军到陕北安定地区和二十七军汇合。这次北上，郭宝珊的部队已归刘志丹同志直接指挥，他们更高兴了。到了陕北还未和二十七军汇合时，志丹同志便指挥我们在寺尔畔消灭了敌人一个连。这次战斗，郭宝珊部队打正面，三团打侧翼，由于他们动作迅速，很快就把敌人消灭了，我军无伤亡。

寺尔畔战斗以后，来到李家岔和二十七军汇合。此后，郭宝珊部队在志丹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粉碎敌人第二、第三次“围剿”。在战斗中，义勇军指战员牺牲较多，但补充了大批新战士，部队得到迅速扩大。在后来成立十五军团时，该部就编为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的二三三团，郭任团长。

义勇军初改编时，部队中没有党的组织，后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吸收了一批党员，各队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郭宝珊也入了党。他的部队在改造过程中，也淘汰了少数几个年纪较大、思想不进步、有抽大烟嗜好的人，走时给他们发了路费和安家费。

当年春，马鸿宾部消灭了贾、梁两团，残部逃到苏区，被郭宝珊缴械，一部分士兵编入义勇军，郭部扩大了几十人。这个部队经过战斗的考验和思想改造，已经成为一支很好的革命队伍了。在战斗过程中还提拔了一批干部。

三五年十月，“左”倾路线肃反时，把郭宝珊也抓了起来，把他们团最能打仗的一个营长于振西也给杀掉了。“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问他是不是右派，郭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派，反正刘志丹是哪一派，我就是哪一派。党中央来到陕北以后，纠正了“左”倾肃反路线，把我们和郭宝珊都同时放出来了。郭宝珊在这次肃反中虽然受了很大委曲，但是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他曾说：共产党是讲道理的，错了就承认错误。我决心要为党工作一辈子。

郭宝珊被释放后，任二十八军的团长。二十八军经神府东征山西，他随后带了两个补充连来到神府找二十八军，但二十八军已东渡黄河，他就在神府参加战斗，任过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不久，回陕北参加红军西征。抗战时期，宝珊同志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任过警四旅旅长，十二师师长。全国解放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很好的指挥员。

（一九八二年三月）

七 天 七 夜

——忆掘港保卫战

张 震 东

掘港保卫战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场激战，我的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怀念陈毅同志，怀念陶勇同志，更怀念在这场战斗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就是这种怀念之情，促使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献给光荣牺牲的先烈。

那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黄桥战役胜利以后，我新四军第三纵队奉命从海安出发，单刀直入，挥戈东进。陶勇同志任纵队司令员，我任参谋长。在陶勇同志率领下，部队直插如皋地区。这里的群众世世代代受着官府、官兵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革命的火种久久埋藏在人民的心底。他们盼望着当年的红军，向往着当年红旗招展梭标林立的威武场面。如今看到我新四军大队人马开来，个个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箪食壶浆，迎接亲人，出现许许多多感人的场面。我们进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北部沿海重镇——掘港。这是通（南通）、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的咽喉，是丰饶富庶的江海平原的枢纽。镇上的士农工商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夹道欢迎我军进驻。

陈毅同志是和我们一起长途行军进驻掘港的。路上看到这些

动人场面，他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对陶勇同志和我说："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我军进驻掘港后，根据陈毅同志指示立刻建立了如皋中心县委，由钟民、陈同生、洪泽等几位同志负责领导工作，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民主主张。为了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决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陈毅同志亲自主持，与各阶层反复协商，达成了"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的协议。在掘港建立了包括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参加的苏北四分区游击指挥部，由季方任指挥，陶勇和顽军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顽军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宗任副指挥，我军陈同生参加指挥部领导工作。陈毅同志将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后，便离开我们到盐城去了。

当时我三纵队只有六千余人，五千多条枪，虽然黄桥战役之后敌我力量对比有了较大变化，但盘踞在通、如、海、启地区顽军的兵力仍是六倍于我。这批顽固派在失利时口头赞同统一战线，其实根本没有共同抗日的诚意，一遇时机，仍坚持反共立场。

一九四〇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疯狂叫嚣要恢复到黄桥战役以前的态势，密令苏中四分区顽固派"精诚团结，全力以赴，赶走共产党"。立时苏北天空乌云密布，各地顽军蠢蠢欲动，磨擦流血事件连续发生。

我华中总指挥部为集中兵力沟通苏北与淮南联系，抽调陶勇同志率领我三纵之七团西进海安、兴化配合曹甸战役。这样，掘港只剩下三纵的五、六两个团，由我负责留守指挥。

鉴于掘港在苏北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加之周围盘踞的国民

党顽固派兵力强大，我深感留守掘港的责任重大。果然，龟缩在北新桥等地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的头目徐承德得知陶勇同志率七团已离掘港，只有两个团留守，认为有机可乘，立即进行阴谋策划，妄图一举消灭我三纵留守部队。十月二十三日，他纠合了保安一、三两个旅的头目薛承宗、张星炳和实业保安团董万祥等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策划由徐承德三个支队担任主攻，其他几个团在外围配合。徐承德在会上狂妄叫喊："兵家相争机不可失，要趁共军七团北调之机，打进掘港，收了这个摊子。"

顽固派的这一阴谋，被我新四军派在保安一旅的军事代表周一峰同志获悉，他急若星火，冒着种种危险派人把情报报告了我。我得知消息，立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顽军要兴风作浪，虽说是意料中事，但此次如此机密，如此迅速，倒是出人意料。担任主攻的顽游击第六纵队徐承德部原系东北军，虽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但其装备精良。由于他反共积极而得到国民党重用。黄桥决战，韩德勤兵败受挫，溃不成军。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逃命时淹死在河中，而徐部却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作壁上观。以后，我军挥戈东进通、如、启、海，他口头与我军合作抗日，但暗地却伺机消灭我军。来犯掘港的另一个顽固分子薛承宗，原系韩德勤亲信，曾为进犯黄桥的左路军，该部在营溪为我一举歼灭，薛承宗仅以身免。以后，我军将该部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释放，枪支发还，薛承宗大为感动，曾一度表示欢迎我军进驻掘港，此番见我掘港防务空虚，兵力薄弱，立刻背信弃义，翻脸不认恩人，与徐承德狼狈为奸。东有董万祥的顽实业保安队，西有薛承宗的保安一旅，徐承德自己正面主攻，加之埋伏在掘港镇的坐探里应外合，掘港自能指日可下，因此，徐承德

踌躇满志，扬言要“到掘港过年”，“拿下掘港放假三天”，以此鼓舞顽军士气。他们准备了三百多辆小推车，准备拿下掘港后大肆抢劫一番。

面对眼前的严峻局面，我深感势孤力单，责任重大，平时作战总是陶勇同志主挑大梁，遇到情况共同商量，而此次只留我一人在掘港指挥，肩上担子重呀！我军留守在掘港的两个团，五团是原来潜伏在国民党保安旅颜秀伍部队中的一支地下军，由姚力、王澄等同志领导，于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郭村战斗时火线暴动，为郭村战斗的辉煌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六团是我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崇明游击队改编的，号称“第三旅”，由茅理、韩念龙同志率领。以五、六两团面对顽军近十个团的兵力，确实悬殊很大。但我五、六团指战员英勇顽强，能守善攻，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又给我增添了无限信心。我一面给陶勇同志拍发急电，汇报情况；一面在西方寺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各团的守备任务，令五团阻击西南方五总埠、马塘方向来犯之敌；令六团阻击东和东北方向来犯之敌，我在会上着重强调：“掘港是军事交通要地，是我苏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枢纽，是党政军建设的中心，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与南通的日军形成犄角之势，这样我苏四区的通、如、海、启的咽喉就无异被掐断。因此，我们必须誓死保卫掘港。有了掘港就有三纵队；有了掘港就有四分区，任何犹疑懦怯都会助长敌人气焰，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最后我站起来说：“我愿与全体干部战士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离开阵地，谁后退就杀谁的头，我张震东后退，你们就杀我的头。”紧急会议之后，各团又层层开会，让战士献计献策，同时通知地方政府，动员百姓作好战斗疏散工作，民工、战士日夜构

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掘港是个狭长的市镇，东西长五华里，从东北到西南横贯串场河。从镇西出口直至马塘、如皋、石港、南通等地。在掘港至马塘的三十华里中，只在环镇架设了一座桥梁，沟通南北。范公堤环抱掘港东南两面，堤高六、七米，是该镇的天然屏障，堤上除行人道外，两坡长满了白杨和杞柳。高高的白杨耸入云端，密密的杞柳稠如帏幕，从东北到西南，蜿蜒数十里，远远望去宛似一条绿色长城。

堤外是一片坟地，坟包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十余里，了无人家。沿堤向东北可抵苴镇。串场河与堤平行，河西是一望无际方圆数十里的莫荡，里面长满了芦苇和杂草，大小沟渠密若蛛网。

市镇西南边是丁家棚，丁家棚范堤北边高墩上筑有一座三层烧香炉，它象一座了望塔似的耸立在掘港的西南方。这是掘港的最高点，我在那里派有了望哨，监视着敌人。

夜幕降下之前，我了望哨战士可以远远看见敌人在掘港外围不断移动。我军亦按部署进入阵地。为防止司令部遭受损失，我命令机关和后勤单位往苴镇方向转移，同时，还派出专人，配合地方政府对掘港镇内进行安全检查，防止接火之后暗探里应外合。

一天夜里，当我巡视五团阵地就要离开时，保卫科干部匆匆赶来，向我汇报重要情况："在洋桥北面姓管的地主住宅内，查出了两百多颗手榴弹和十四支短枪，我们平时怀疑的那个家伙，正在管家密谋。"我问："人呢？"他说："已经抓起来了。"我说："好，先看押起来，不要打草惊蛇，打完仗再处理。"原来，群众早向我们揭发，徐承德以前盘踞掘港时，就安下了一个以卖

高桩馒头为掩护的坐探，专门收集我军情报，此后又让一化装为和尚的家伙，往返掘港与石港之间进行联络。这些早为我们注意。没想到又勾结管姓地主，私藏武器，妄图趁徐承德进攻之际，里应外合，大打出手。保卫科同志及时挖除这颗定时炸弹，使徐承德阴谋破产，确实是一大胜利。利令智昏的徐承德此时还蒙在鼓里哩！

午夜过去，北风掠过枯枝，发出呼啸声响，更增加袭人的寒意。守卫在堤岸上的战士，刀出鞘，弹入膛，聚目凝神，等待来犯之敌。堤岸内，原来都在高高兴兴准备年货的群众，现在也为战争气氛所笼罩，家家关门闭户，显出一片沉寂。而堤岸外边，徐承德的顽军正在加紧窥测，步步紧逼，象饿狼一样准备疯狂扑食！

下半夜，已经有了阵阵枪声，但只是零星的冷枪。次日黎明，顽军开始进攻了，坚守在堤岸上的我军，居高临下，严阵以待，监视着敌人。我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敌军利用坟包掩护，向前移动。

早饭后，敌人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以密集的火力，从正面向我丁家棚一带进攻。其目的先攻下丁家棚的制高点，然后长驱直入境内。战斗越来越激烈，强攻的敌人，弹如雨发，浓烟蔽日，大地抖动。我战士临危不惧，奋勇抵抗。每当敌人发起冲锋逼近堤岸时，我军以密集的火力，配合大批手榴弹，将敌人炸得血肉横飞，向后退去。如此反复两次后，敌人的冲锋停止了，按兵不动。原来他们是想等待内应的枪声响后再发起更大的冲锋，谁知等了好久，镇内安静，徐承德这才恍然大悟其内线已被我军破获，里应外合的阴谋成了泡影。

两面的敌人全线出击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我盘算着守卫掘港的兵力虽然两个团，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两千一百人左右，武器装备很差。还有一个以朱坚同志为首的新编团，是等待扩充的徒手部队，谈不上战斗力。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疯狂扑来，能不能顶住？人民群众在耽心，我也在耽心呵。面对这种严酷的局面，我军必须具备决一死战的决心，随时准备将一腔热血洒在掘港的土地上。同时还要把握时机，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我想陶勇同志如果能够回兵支援造成内外夹击的局面，那么，彻底消灭这三股围敌是易如反掌的。我大步流星走向电报机房，打算急电和陶勇同志商量。然而电报机出了故障，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一面命令赶快修好电报机，尽快与陶勇同志取得联系，一面向各级指挥员贯彻打守备战的战略思想，“不要急躁，以逸待劳，创造条件，待机反攻”，以此来粉碎徐承德“以多胜寡，速战速决，一举歼灭”的阴谋。

保卫掘港的战斗坚持了三天三夜，敌人仍未取得便宜。但我们的战士却十分疲劳，他们得不到轮班休息的机会，日以继夜、不眨眼地盯着敌人，一个个眼睛熬得通红。我走在战壕里，看着一双双血红的眼睛，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五团最小的一个战士，平时调皮捣蛋，大伙叫他“猴头”，我看到他时，他眼睛已经蒙上一层红色的云翳，仍旧调皮地扒在我的肩上嚷道：“参谋长，什么时候你拿着大刀再带我们冲一下，就解决战斗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别急，小伙子，到时候会拼杀个痛快的！”多么可爱的战士！多么坚强的战士呵！看见战士们士气高昂，这是一个指挥员最大的快慰。我回到指挥所，参谋向我汇报电报机修好了，但和陶勇同志仍未联系上，现还在继续呼叫。另一

件事就是徐承德侦探我军情报的来源已经查清：一是潜伏掘港的坐探；另一个最主要的是三个被俘后参军的国民党兵——一个军医和两个炮兵，在关键时叛变投敌，报告了陶勇同志率七团离开后我掘港的军情和部署情况，致使徐承德和众顽对我掘港情况了如指掌，认为有机可乘，横下心来，孤注一掷。无耻的叛徒！这笔账早晚要算的。

徐承德的进攻由于丁家棚没能按计划攻下而受阻，战场上暂时冷了下来。很显然，他在筹划着更毒辣的阴谋。在这个空隙里，我把兵力又作了调整，命令各部加倍提高警惕，密切监视敌人动向。同时组织战士轮休，养精蓄锐，以迎接更残酷的战斗。

掘港镇各界人民在如皋县第八区区长顾尔钥同志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配合战斗。工抗会、青抗会、商抗会冒着枪林弹雨，源源不断地将一担担干粮茶水送上堤岸，给战士们充饥解渴；把一箱箱武器弹药运向前沿阵地，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他们送医送药，组织担架，抢救伤员；全镇所有的点心铺、食品店昼夜不停地忙着做点心、蒸馒头；全镇的青壮劳力在串场河南岸堆沙袋、做掩体，为战斗准备第二条防线。军民合力筑起一道钢铁长城，誓死保卫掘港。人民和人民军队之间的鱼水之情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敌人新的进攻开始了。它先从掘港西侧发起进攻，把我军注意力引向西面。突然，东北方向响起了更激烈的枪声。徐承德果真耍了个声东击西的诡计。守卫在掘港东北一线的是茅瑾同志领导的六团，虽依堤岸进行坚守，毕竟战线过长而兵力不足，加之敌人熟悉地形，以几倍的兵力、密集的炮火，终于强占了范公堤上的余家埠子，切断了我通往苴镇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往苴镇方向遣散的机关后勤人员误入敌人包围圈，五六十名后勤干部被敌人俘去。个别突围同志跑回来向我报告这一消息时，真如晴天霹雳，我惊呆了。许多同志出于阶级友爱要求杀出重围营救被俘战友，从我感情上来说，完全支持，但作为指挥员，必须从整个战局考虑，不能只顾暂时的得失。鉴于掘港当前形势，兵力有限，加之余家埠子失守，情况对我不利，如果分散兵力，恰恰中了徐承德下怀。眼前主要任务是要夺回余家埠子，稳住阵脚，然后才有可能腾出手来，营救被俘同志。当和大家讲清道理，明确形势之后，敌人已经由余家埠子向后天宫方向移动，准备从那里突入镇内。我带着警卫排，赶到六团前沿阵地，怒视着一步步紧逼的敌人，深感形势危急。我一面命令部队准备出击肉搏，一面把袖子卷起，带着警卫排选择了适当地形。当敌人快要逼近时，我提着大刀跳出战壕，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霎时间战士们杀声震天，跃出战壕，个个如同猛虎下山，杀入敌阵。顽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杀吓懵了，还未判明情况，我军已经劈头盖脸压了过去，只得向后拔腿就逃。我一见时机有利，大喊一声："追！"六团全线出击，一鼓作气又把余家埠子夺了回来，稳住了我军阵角。趁敌人正在混乱之际，我指派六团廖昌金同志率两个连，沿范堤向苴镇的方向，营救被俘同志。廖昌金同志在群众的协助下，飞兵奇袭，在十里路外的一个庄子里，用很短时间，歼灭守敌，救出被俘的后勤人员。

夺回余家埠，救出被俘人员，对我军士气是一鼓舞。更令人高兴的是，报务员报告："和陶勇司令员已取得了联系"。从复电上得知，陈毅同志接到掘港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命令陶勇同志所

带七团“急速回师掘港”，此刻七团正在星夜兼程向掘港进发哩！陈毅和粟裕两司令员还电示我：“要用黄桥决战的经验，要用坚守黄桥的决心，要靠黄桥的军民鱼水情，在保卫掘港的战斗中再现胜利！”首长的关怀和指示，是多么大的鼓舞，多么大的力量呵！我身边的同志为这大好消息欢呼起来。我叫政工队把这一回电用油印快报印出，迅速送到战士手里。虽是数九寒天，战壕里冷风刺骨，但见到陈、粟司令员的指示，人人心中好似一团热火，再次掀起了坚决保卫掘港，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高潮。

我立即派人迎接陶勇同志，并磋商战略。陶勇同志决定在回掘港之前，先拿下徐承德的老窝北新桥；又以两个营兵力奔袭马塘东南的曹埠，以切断徐承德的退路。这些决定无比英明，我都一一同意，也一一顺利完成。

陶勇同志回师掘港和打下徐承德老窝的消息一传开，军民欢欣，奔走相告，前线后方，人人喜笑颜开，象是过小年一样。徐承德得知老巢已破，怒火中烧，层层向下施加压力，对掘港进攻越来越猛烈了。他们利用战斗的间隙向我前沿战士喊话：

“小兵来投降，马上提升当班长。”

“来当兵，不用愁，月月都发袁大头。”

愚蠢的敌人以为这样的心理战就能打中我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恰恰相反，战士们报之以耻笑。而我军宣传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却象海潮一样，淹没了敌人的哀哀号叫。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为人民打仗光荣，为顽固派送命可耻！”

这些口号很有作用，因为它是真理。我又进一步要宣传员直

接喊话：

“顽军弟兄们，你们的老巢已被我们拿下了，你们已无退路，只有站到人民方面来，才有出路。我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这种政治攻势，对顽军头头们威协最大，敌人士兵知道北新桥失落，当然人心慌乱，而徐承德此时只有打下掘港，才有巢可居。于是他进行了疯狂反扑。此时我心里踏实了，天时地利人和，三项与我有利，敌人的反扑只是临死前的挣扎。出击！及时出击！一阵冲锋号响，战士们冲出战壕，趁敌人混乱之际，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杀向敌人。蹩了多少天气的我军战士，个个象离弦之箭，锐不可挡。敌军丢盔卸甲，四下逃散，我军杀开一条血路，穿插到敌人侧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再从敌人背后打回掘港。这一突然果断行动，打乱了敌人阵角和指挥部署。果然敌人全线慌乱了，在夜幕降临时，敌人在掘港周围放起火来，这是准备溜走的信号。他们想乘我援军未到之前，就象启东方向逃窜。

“不让敌人逃走！”我立即命令部队全线出击，紧紧咬住敌人不放。在我开始追击时，陶勇同志率领七团已到达马塘以东一线。在包场，我与陶勇同志会面，虽然分别时间不长，然而此时见面却倍觉亲切，我们紧紧握手，没有时间畅叙别情，立即展开地图，分析研究，判断敌人逃窜方向，确定歼敌方案，决定追击到启东县城汇龙镇由五、七两个团围歼之。

当我带着部队直追徐承德到达余东时，徐承德已逃过了河。我军正要渡河追击，对岸突然竖起了“太阳旗”。

“鬼子？”我心头一楞，“鬼子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仔细一

想并不奇怪，原来徐承德早就和日寇勾结，在此危难之际，日寇援之以手，使其能向三阳镇逃命。想到这里不由我怒火中烧。“打！”我一声令下，部队向日寇发起进攻，好在日军不多，见我军威猛善战，锐不可挡，没敢坚持多久就慌忙撤退了。为了争取时间，我军沿着去三阳镇的大路马不停蹄冒雨追去。指战员穿着湿衣，干粮袋里装满冷饭团，肚子饿了抓了一把塞在嘴里充饥，人人同仇敌忾，争分夺秒，因此，我们越追距敌越近。

在三阳镇，徐承德布置一营兵力，企图阻拦我军，自己带着大队人马向汇龙镇逃窜。我军到达三阳镇时，这一营兵力刚一交火，便丧魂落魄地四下逃散了。我军直向启东汇龙镇追去，在汇龙镇我军摆开阵势，发起进攻。徐承德的顽军，此时已成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个冲锋已经把大小喽罗打作鸟兽散了。而徐承德本人已如丧家之犬，丢下部队，溜到公司镇，准备往江南逃命。尽管他现在已成光杆司令，为了除去后患，我军仍以惊人毅力向公司镇追去。战士们虽已急行军两天两夜，但人人精神焕发，忘记疲劳，宣传队的快板唱到：

徐承德，顽固派，
通、如、海、启一大害，
偷偷摸摸打掘港，
不搞抗日搞破坏。
三纵队，行动快，
狠狠追击顽固派，
为了教训徐承德，
日夜行军二百二。
……

徐承德逃到公司镇，前面是波涛滚滚的长江，后面是追兵，走投无路，只得带着他几个亲信仓惶下水，渡江逃命。后来，徐承德逃到江南投入日伪怀抱，又窜回南通当了伪军师长，被我三纵击毙在悦来镇。

我军胜利回师掘港。掘港人民夹道欢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更增加了春节的节日气氛。

这时候，我才能和陶勇同志坐下来畅谈离别后发生的事情。当我向他详细讲述保卫战中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讲述为这次战斗牺牲了生命而换来了胜利的战友时，我们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热泪。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连指导员钱青萍和其他五个同志，为了保卫掘港，从战斗一开始，就滴水未进，粒米未吃，嘴唇干裂，两眼充血。最后子弹打完，敌人冲了上来，他们上上刺刀，冲出工事，拼倒了几个敌人之后，自己也壮烈牺牲。我看到他们的尸体时，他们脸朝着敌人，眼睛直视前方，留下一副壮志未酬，死不瞑目的刚毅遗容。……陶勇同志静静听着我的讲述，他慢慢脱下帽子，走到窗前，长长凝视着窗外的天空，然后低沉地说："通知各团，明天在国清寺举行追悼会。……抓到的那几个叛徒和敌人的坐探，一律枪毙。"

在追悼会前，我们处决了八个凶恶的叛徒和敌特，祭我烈士忠魂，同时宣讲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

红旗在掘港上空迎风飘扬，在朝阳的映照下，它显得格外鲜红、艳丽……

（刘伟鹏　周再生整理）

回忆青岛停战谈判

王　　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不久，便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我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组成了三人小组。从此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一些地区性的三人小组停战谈判活动。一九四六年初，我在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期间，曾经接待过三人小组成员，并代表胶东八路军去青岛与国民党驻军将领举行过谈判。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回忆。

谈判前夕

重庆谈判前后，在胶东的我八路军驻地和解放区军民经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袭击。大打虽然没有，但小打一直没断。当时，胶东的军事态势是：胶济铁路南北两侧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由我军控制；胶济线上的青岛、胶县、高密、潍坊等地驻守着国民党军队。这样，胶济线便成了国民党蓄谋进攻解放区的重点地带。国民党在胶东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实现胶济铁路通车，把它孤守的城镇连接起来，运送兵员和武器装备，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做准备。

一九四六年初，为了贯彻停战协定，军调部三人小组派代表

来到胶东。当时，我方驻济南的三人小组代表是邝任农，副代表为黄远，美方代表为雷克上校，国民党代表是涂叙伍。在济南三人小组之下，还有泰安、高密等地一些地区性的三人小组。为了在胶济线上实行停战，三方决定在高密举行谈判。高密东临胶县，西连潍坊，正处在两军的交叉点上。当时，我作为胶东地区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去高密与国民党举行谈判。出发之前，我们还作了点准备。长期的战争生活，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我穿了一件半旧的布军衣，扎上一条小皮带，就想走。同志们感到太破旧了，便给我做了一件新大衣。虽然是一般的斜纹布，但在当时已经很阔气了。我们信守约言，按时来到高密。参加这次谈判的我方成员还有吴可久、王越等同志，当时他们在高密地区三人小组工作。因为是首次接触，双方在阵地上都布置了机枪，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第一次谈判国民党就搞了一场骗局。在高密车站一等再等，不见他们的人影。结果，他们胡编一个理由，就说不能来了。这样，高密谈判便告吹了。国民党为什么不来高密谈判呢？据分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前一次谈判中，我五师师长聂凤智怒斥国民党派的代表是汉奸师长赵保元，指出他“没有资格”参加和谈，使他们狼狈不堪；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密靠近我解放区，一旦谈判中拍了桌子，他们担心会吃亏、挨打。

青岛受困

不久，国民党方面又提出将谈判地点迁至青岛。当时，青岛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特别市。由于高密谈判我们受了骗，这次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想去青岛再同他们打交道。但是，根据党中央的

指示精神，我们总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计民生为重，希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又经过与邝任农等三人小组的同志们协商，最后还是决定去青岛谈判。当时，美方代表雷克上校一再表白，保证我们的安全，出了问题他负完全责任。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一个早晨，胶济线上从青岛方面开来的一列火车，在高密车站徐徐停了下来。这是国民党方面来接我们去青岛谈判的专车。我作为共产党的军方谈判代表，带随员若干人，应邀赴青岛谈判。当天下午，举行了首次会谈。国民党方面参加会谈的军方代表是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他的八军是胶济线上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战斗力比较强。从济南来青岛视察的三人小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谈判。谈判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胶东停战问题，二是胶济铁路通车问题。因为胶济线上的几个主要城镇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所以不少地段的铁轨被我军民扒掉，造了枪炮。第一天的谈判，仅就第一项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以双方各自占领的地段为基础，大致划分停战线；双方武装部队保持距离，脱离接触，互不侵犯。当夜，绘制了地图，决定第二天先就停战协议签字，接着再谈交通问题。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的捣乱破坏，加之通车也只是对国民党有利，因之交通问题并未谈判。晚上，我和邝任农等同志住在国民党指定的一个旅馆里。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还没起床，住的旅馆就被大约一千人包围了。原来，国民党特务鼓动了一批地主还乡团分子来破坏捣乱。叫他们“还乡团”，不仅因为这些地痞流氓的老家大都在我们解放区，而且往往是因为其父兄充当汉奸、出卖祖国、或是欺压人民的恶霸地主而被我人民政府镇压。这些人由解放区逃到青

岛，自称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妄图依靠国民党反动派，杀回解放区，重新欺压人民。国民党当局也正需要这样一批败类来对付共产党。于是，便把他们收罗起来，专门来破坏和谈。早晨七、八点钟，这帮还乡团分子把我们住的楼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打着“质问共方代表”的旗子，喊着“打回老家去”、“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要我下楼“回答问题”。我真想下楼去驳斥反动派的谣言，但是，身边的同志们劝我不要下去，认为这样可能正中敌人的圈套。这些家伙是有意捣乱破坏，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的。据有关情报说，国民党特务告诉这些家伙：“胶东军区来了一个王司令，你们的亲人就是他杀的，报仇的时机到了。”如果我跟这些亡命之徒见面，他们很可能要下毒手。当时，在青岛的还有我解放区烟台市市长姚仲明同志。他是作国际救济总署的代表住在大和旅馆的。当天上午，国民党当局曾企图把姚仲明也骗到我们住的旅馆，使他和我们一起遭受围攻。但走到半路上，姚仲明发现情况不对头，便返回大和旅馆，并设法通知我们，今天上午，敌人要有计划地闹事。

怎么办呢？我和邝任农、黄远、吴可久等同志商量对策，决定先由黄远同志出面，下楼与他们周旋。黄远同志下楼之后，宣传八路军的主张和党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家伙根本不听，还是吵吵嚷嚷，非要我下楼不可。他们蜂拥而上，已经从楼道里打到二楼。邝任农同志来到二楼，当即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强烈抗议。邝代表指出：你们组织暴徒围困旅馆，围攻中共代表的无理行径，完全是破坏三人小组谈判和视察的阴谋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后来，我们几个同志在三楼关起门来，研究下一步的对策。我们充分估计了事态的严重性。

大家亲眼看到国民党当局纵容和支持这些坏分子捣乱破坏，而警察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当时，有的同志出于关心，曾劝我从楼后面逃走。我说："不行，不能走。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又不是搞地下工作。如果出了问题，国民党应负完全责任，因为这是在你国民党统治区。再说，即使我逃出楼去，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坚守三楼。时隔不久，美方代表来了。我想，拉住美方代表，对付国民党还乡团，就比较容易了。这时一部分同志对付楼下的流氓，我向美方代表表示：停战协议不再签字，也不谈判了。

翻译王越同志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他是我党从北平军调部派来胶东帮助工作的。他见此情景，便以我的名义与美军驻青岛海军陆战队司令豪威尔中将取得了取系。王越在电话中说："王彬将军现在青岛参加国共谈判，结果想见个面的话，请约个时间。"豪威尔说："现在来就欢迎。"王越说："我向王将军报告一下。"王越向我说明情况后，我说："这样也好。我们就可以顺便解围了。"王越马上给豪威尔将军回电话："王将军同意现在去。"这时，时间已是午后一点了。还乡团分子依然围困着我们住处。

其实，对我们遭受围困的情况，豪威尔中将也许是清楚的。因为国民党在谈判中的重大行动往往要经过他美国主子的默许。但是，豪威尔中将为什么又这么爽快地欢迎我去会见他呢？原来，在去青岛之前，豪威尔就曾多次派他的副司令去胶东军区找我谈判遣送日本战俘的问题。还有一次，美国一架飞机在大泽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他也曾派人来找我们联系运送尸体等问题。在这些接触中，我与豪威尔并未见过面。但他曾几次通过

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少将邀请我去青岛，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这次我登门拜访，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何况，在遣返日俘问题上，他还有求于我们。

大约在午后一点半，豪威尔中将派来一辆美造黑色轿车接我去美军司令部。同时开来的还有一辆敞篷警卫吉普车。这辆吉普车上站着几个美国兵，有的端着卡宾枪，挥着刺刀，杀气腾腾地在前边开路。国民党特务和还乡团分子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来接我的。分别代表豪威尔中将和克利门少将的两名副官客气地向我敬礼，并把名片交给我，请我上车。这时，这帮还乡团分子早就躲得老远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坐到轿车里。前边依然是那辆吉普车开路，警笛在空荡的大街上呼啸长鸣，两辆车沿着起伏弯曲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朝着美军司令部开去。

解　围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美军士兵开的汽车，而且是在我们祖国的领土上。一路上警笛刺耳，警车横冲直闯，所到路口，老远就开绿灯。车辆靠左侧行驶，我目视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想，大概人们听到警笛响，早已躲开。这种情景，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民族自尊心。心想，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口口声声所讲的“独立自由”、“和平民主”；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所高喊的“民族利益”、“国家尊严”。说穿了，无非是日本鬼子垮了，换上了美国兵；伪军服脱下来，换上了国民党军的旗子和帽徽。于是沦陷区变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其实还是半殖民地。这一路上，时间虽然很短，但“殖民地”三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我

的脑海里。这时，我更加感到这次来青岛谈判，我党的一片诚意，换回来的很可能又是国民党的一场骗局。

美军驻青岛司令部设在栈桥附近的风景区。幽静的海滨，蔚蓝的海水，苍翠的松柏，蜿蜒崎岖的海边公路。空有盛景留天下。这里既有德国人留下的模式各异的幢幢小楼，又有日本人修建的别墅洋房，唯不见中国人游览，更没有见到中国的渔船和钓翁。

到了美军司令部，豪威尔中将和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少将热情地接待了我。互致问候之后，豪威尔中将说："不久前我会见过陈毅司令员，陈毅将军对我们非常友好，他那潇洒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代我向陈将军问好。"我知道，豪威尔是专拣好听的话讲。紧接着便谈到遣送日俘问题。原来，日本投降之后，还有一些侵华日军被俘后留在我胶东解放区。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把遣返日本战俘的任务交给美国在华的驻军，并由美国与国共双方协商办理遣返手续。八年抗战，蒋介石卖国求荣，采取不抵抗主义，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消灭和俘虏了大批日军。青岛的美国驻军要完成胶东地区的遣送日俘任务，非同我们打交道不可。以前，豪威尔中将派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少将到胶东军区交涉过几次，但没有完全谈妥。现在他们的上级催得很急，所以豪威尔才急切地希望我们迅速解决遣送战俘的问题。

豪威尔中将开门见山地说："王将军来得正好，不然我要去登门拜访了。遣返日俘问题，我们已谈过几次了，现在远东盟军司令部催我们很紧，还请贵军大力协助，以期早日完成任务。"

我说："俘虏散布在胶东各地，有些日军被俘缴械后，已经

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有的不愿回去，因此还要花点时间做工作。”

豪威尔又讲了一些上级给他的指示和期限，表示出非常迫切的样子。于是，我说：“如果豪威尔将军希望尽早落实遣俘工作，可让你的副手同我一起回胶东。”豪威尔听后，立即高兴地说：“那好，那好，我马上派飞机将王将军送回。”他的副司令克利门比较狡猾，马上提醒豪威尔说：“司令，王将军这次来青岛是作为共方代表参加国共停战谈判的。如果我们派飞机把王将军送走了，是否有破坏国共谈判的嫌疑？”豪威尔听了这话，改口说：“既然这样，就等王将军谈判完毕返回贵军之后，我再派克利门少将前去磋商遣俘问题如何？”我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我说：“愿协助你完成遣俘工作，这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任务。”豪威尔表示满意，随后便告辞了。

当我乘车返回旅馆时，时间已是午后两点多了。这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所谓“群众”也早已散去。据当时留在旅馆的同志讲，我被美军的汽车接去后，这些还乡团分子慑于美国主子的压力，也就没敢再闹。

赴　宴

按原来的日程安排，当天中午国民党军方以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盘中将的名义设午宴招待我方和美方代表。由于国民党特务鼓动还乡团分子破坏捣乱，我憋了一肚子气，哪里还有心思赴宴。从美军司令部回到旅馆后，国民党军方一连三次派人来催请，都被我们严辞拒绝了。第一次来请，我说不去，他就回去了。第二次来请，又说好话。我气愤地指出：“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愿望，共产党和八路军一片诚意派我来青岛谈判停战问题，但你

们却虚伪地当作儿戏。本来今天要签订停战协议，你们却纠集这么多地痞流氓破坏捣乱。破坏和谈的责任应该完全由你们承担。”我一方面重申拒绝签字，一方面又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他们不死心，第三次又派国民党代表拉着美方代表雷克上校来请。雷克上校一再说好话，我和邝任农、黄远、吴可久等同志商定了，下决心不去。雷克上校说：“王将军，尽管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还是希望你出席他们的宴会。”当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我们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我说：“雷克上校，上午发生的事情你是清楚的。既然他们毫无诚意，我也决定不再见他们。我们现在身处国民党占领区的青岛，连居住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谈得上什么和谈！要杀、要放、要打随他们的便好了！”雷克一时也无言以对。

这样又僵持了很长时间。国民党方面已经很狼狈，他们一再推卸责任，解释说：今天的意外闹事，军方完全不知道。美国代表虽然对他们也不满意，但雷克上校还是帮腔向我解释：“上午的事情，他们军方不知道。不是军方搞的，是他们地方搞的。”我说：“这里是国民党占领区，无论是军方，或不是军方，反正都是国民党当局指使干的。”为了解除僵局，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面子”留给美方代表，到宴会上走一趟。当然主意并无根本改变，赴宴可以，协议绝不签字。于是，我对雷克上校说：“要不是阁下一再劝解，我是决不赴这个宴的。为了我们中美的友谊，我同意与你一起走一趟。”

说是午宴，已经快成晚宴了。到下午三、四点钟，我在雷克上校陪同下，和邝任农及翻译王越等同志一起去赴宴。国民党讲阔气，宴会的规模很大，场面搞得相当豪华。宴会由国民党青岛

警备司令丁治盘主持。我们到场后，国民党军官站成一排，有不少是少将军衔的，约二、三十人，由警备司令一个一个地向我和雷克上校作介绍。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在介绍时支支吾吾，没有讲姓名，只握握手。后来我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胶东军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冤家对头、顽匪司令——赵保元。宴会将要开始，国民党又搞名堂，专门把我和美方代表分开，安排到不同的地方。陪我就座的是国民党谈判代表、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美国代表很快看不到了。我想，他们有意把美方代表支开，三方形成了两方，发生争执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原来我打算到一下场就走，已和王越同志规定了暗号。王越也见机行事，在祝酒后走到我跟前说："王副司令员，豪威尔中将约你下午会谈，时间快到了。"这样，不等宴会结束，我便中途退场了。

家 访 李 弥

当天夜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派人来看我，请我到他家里作客，并说完全是私人性质。他还说了许多好话，对上午发生的事表示道歉，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我考虑李弥是国民党的滇系军人，为了做工作和了解情况，便决定对他进行家访。于是，我只带了一个助手，随车来到他家。

李弥对我很客气，陪他接待我们的有他的两个师长，估计都是其心腹。这次家访谈得比较深，前后共谈了两个多小时。

首先是李弥诉他的苦衷。他一再申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蒋军内受歧视和排挤。还讲，抗战初期，蒋介石不信任他，派了一个什么中将住在他的司令部，监视他达两年之久。李弥说："我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在军界吃不开。人家的军队夏有

单冬有棉，武器装备供应也好。我们第八军经常是夏天到了，单衣发不下来，还得穿棉衣，冬天来了，往往又没有棉衣穿。”说到这里，我趁机说：“你们那些兄弟部队不是穿得吃得很好嘛！”李弥说：“人家那是嫡系，咱哪能比。”我也不无目的地感慨说：“原来，待遇不一样啊！不过好歹你们还有棉衣单衣之类的供应，每月总有薪饷。抗战八年，我们八路军怎样呢？开头，委员长还给一点，尽管是九牛一毛，总算有个户头；后来，干脆一点不给了。我们靠什么呀，还不是一靠解放区的老百姓，二靠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才达到丰衣足食。饷是没有的，八路军不分官兵，每月每人一些零用钱。”

谈话中，李弥还向我“拉近乎”，尽量说些中听的话。他说：“王将军，你大概并不太了解我李某的为人。当年北伐时，你们朱总司令任团长时，我就是总司令部下的一个排长啊！”既然他这样说，我也就顺水推舟，作了点自我介绍。我说我也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当年在黄埔高级班二期毕业。说到这里，李弥的情绪有点激动，一再说：“好了好了，无论如何我是不打了，我被你们打怕了。不管国共两党怎么样，咱们反正不打了，这可以吧。”

我想，李弥讲这些话，未必出于真心，他毕竟是个狡猾的军人，在战场上取胜不了时便想就地安定，来保存实力。将来打起内战，蒋军也未必能取胜，还是留条后路的好。为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我便借机向李弥等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八年抗战、重庆谈判，我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接着我话题一转说，这次胶东谈判，本来商定在高密车站，结果有人耍了花招，我到高密不见你方来人；后来你们又提出谈判地

点改在青岛，出于诚意，为了避免内战扩大，我又来青岛谈判。结果刚刚达成停战协议，不等签字，你们当局又制造事端，破坏谈判。我发现，在我谈话过程中，他们听得很认真，时而惊讶，时而点头。后来谈到时局，我又说："日本侵略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民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连年战争，人民早已厌倦了。就我们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来讲，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连一天也不想再打了，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以便复兴我们的中华民族；如果有人再挑动内战，那就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哪还谈得上什么三民主义的信徒呢？"接着，李弥谈了一些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过程。在胶东，他开始对我们很轻视，认为我们是八路军的土游击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后来，在即墨以北地区打了一仗，被我们消灭了一个营，他很恼火，扬言要吃掉我们，为他那个营报仇。于是，他带兵向我们即墨以北地区的主力进攻。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在他扑空后，正打算兵分两路寻找我主力作战，没想到一瞬间又被我军干掉一个团。这时，李弥才有点清醒了。

说到这里，我又向他们讲了解放区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一些情况。没想到，我的一席话似乎打动了李弥的两个师长。其中一个说："照你这么讲，你们共产党八路军，还真是了不得啦。"我开始弄不明白他说这话的真意，但我还是接着诚恳地讲："我们根据地的建设，军民一致，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拥军，军爱民，亲密无间，一切都是为着战争，为了民族的生存。根据地内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建立了民主的三三制的政权，不分男女老幼，上下级都一律平等，党政军民团结的象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事大家办，有饭大家吃，有困难，大家承

担。在敌后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日子里，大家都闯出来了。为革命，个人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抗日胜利了，还能再打内战吗？如果谁想再挑动内战，他就是自取灭亡。”另一个师长听了我的这段话，很不严肃地说：“我还以为你们都是半拉脸，头带一根野鸡翎的山大王呢！”他这一说，大家都笑了。我心里想，这些人身为师长，头脑却简单的可怜。我顺口讲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和委员长都不准我们进驻大城市，只好‘占山为王’喽。还有人说我们共产共妻，你们信吗？如果那样，老百姓能拥护我们、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克服那么多困难吗？！”听到这，那些人都好象有些感慨。

天很晚了，我准备辞行，李弥又提出：我们互派一个秘书到对方，作为双方的联络员。他一再重复他的观点：总之我们不打了，各守驻地，和平共处。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对他说：“你派个联络员来，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安全。但是，我们派一个同志到你司令部去，你怎样让他执行任务呢？安全是否能保证呢？”李弥说：“我考虑过，你们的人，可以作为我的副官出现，以免他人发现。”我见他态度还算诚恳，便抓住这个机会，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又即刻向我保证说：我保你的险，明晨，我派警卫部队送你上车站。当时，我们军区司令部设在莱阳，李弥的八军军部设在我西海军分区范围的潍县。两个司令部相距约三百里。设联络员，当然对我们有好处。可惜的是，后来因其它原因未能设成。

归　　来

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方派了一个专列，停在青岛第一站台

待命，还有一个警卫班，准备护送我回解放区。我从旅馆乘车来到青岛火车站，没去候车室便直接来到火车上。

接着，雷克上校来了，李弥中将也来了，寒喧一阵之后，列车启动了。雷克上校陪我到高密车站，又乘原火车返回了青岛。至此，我的青岛之行便宣告结束了。

回到军区之后，我向区党委汇报了青岛谈判的详细情况。

青岛谈判的实践告诉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对和平谈判是毫无诚意的。已经达成的停战协议，他们破坏签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企图在谈判桌上捞取。他们打起和平谈判的幌子，无非是企图欺骗国内外舆论，争取时间，打通胶济铁路，尽快完成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战略部署。至于同李弥的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弥企图保存实力，而又信心不足，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思想情绪。然而，他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在淮海战役中顽抗到底，终于落了个全军覆灭的下场！

（一九八二年五月）

解放一江山岛

李　志　明

一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东方东海海面，舟山群岛的南端，海门的正东，是台州湾内的岛屿。蒋介石军队逃出大陆、盘踞台湾之后，以固守上下大陈岛，在一江山岛设了前哨阵地。

在这个合计仅有一点七平方公里、南北两个相连的姐妹小岛上，蒋军构筑各种碉堡一百五十余座，还有坑道和交通壕连接。四周的防御火力配备，每三百公尺有步枪五十余支，机关枪四挺，火炮两门。岛上的敌官兵共约一千二百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惯匪、逃亡地主和兵痞流氓，约有百分之二十是被国民党抓去的贫苦渔民的子弟。据后来在俘虏兵中发现，还有被台湾当局骗逼来的所谓慰劳守岛长官的妓女。

二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我担负解放一江山岛的海、陆、空三军在宁波地区的穿山港先后集结整训，进行三军联合渡海作战

的战术演习。当时，从中央军委到南京军区以下各级党委都很重视这次作战，深深认识到，它的胜败，将在国内外引起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美蒋条约时已订立，而且三军渡海登陆作战又是我党建军以来的创举。指战员们满怀解放台湾，粉碎美蒋条约的迫切愿望，决心为解放一江山岛而英勇奋战！因而，“演习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响彻了穿山港的山水。

三

当时，三军联合作战的总指挥是张爱萍，登陆作战指挥部司令员黄朝天，政治委员李志明，参谋长王坤，副参谋长陈雪江。登陆作战指挥部直属兵力有：陆军某军两个主力团，头门山陆炮群和高射炮，还有海上支援火炮的炮船队；海军部队参战的有：登陆艇三个大队，登陆舰一个大队，战舰大队，火箭炮船队，三个护卫舰大队，后勤补助船队，合计百余艘舰、艇、船。还有战役掩护护卫舰第六支队，鱼雷快艇一个大队；空军：南京军区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在解放一江山岛和上下大陈岛的战役中，浙江军区部队独立师、海门地区的民兵和群众支前工作，无论是在人力方面，还是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也都是很大的。登陆作战时的后勤基地就设在海门港。

四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早晨，穿山港风平浪静，朝霞晖映，

即将参战的指战员们喜在心头。黄昏过后，月亮从东海升起，海面一片银光，就在这个时候，陆军部队按原定计划登上舰船。航行中，一百多艘舰、艇、船，除了防空灯在暗处里闪射微光，所有的灯光都关闭起来，它们沿着既定的航线，直奔头门山岛集结。

十八日黎明，海雾笼罩着的一江山岛，隐隐约约地在舰船面前展开。黎明过去了，海面飘绕着一朵朵白雾，东海的太阳刚刚露面，晨雾也就慢慢消失在浪涛之中。

七点三十分，飞行员坐在驾驶室内等待起飞号令，对海、对空雷达不停地转动，海岸炮和舰炮昂起了头，陆海两军的指挥员们在观测目标航向，信号兵把信号弹推上了膛，后勤人员静静地等候第一声炮响。战斗部队指挥员们的手表，都以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报时为准，一切行动都以红色信号弹飞上蓝天开始。

上午八时，海雾终于被太阳驱散，一江山岛暴露在阳光之下，我空军轰炸机群已飞临岛子上空，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发出“隆哗！”“隆哗！”的巨响，歼击机跟在轰炸机后面扫射，岸炮、舰炮伴随飞机的轰炸、扫射发出红光闪闪的弹道，陆上、舰上的指战员们拍手叫好，敌人纷纷龟缩进碉堡、坑道、掩体工事里面去了。

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登陆艇靠岸了，大门徐徐放开，英勇的陆军战士跳上了岸，敌我双方的机关枪咆哮起来，步枪、冲锋枪、手榴弹怒吼着。二〇九登陆艇放下大门时刻，水兵们向陆军老大哥鼓动说：“老大哥，战场立功的时刻到了，冲上去，冲上去，我们用火力支援你们，快上去，时间就是胜利！”陆军同志响亮地回答说：“放心，放心，捉活的回来见面！”

上岸的陆军接近了敌人阵地，我军飞机轰炸、扫射和岸炮、舰炮的射击暂时停顿下来。躲在坑道、碉堡、掩体的敌人乘机向我登陆部队猛烈开火。此刻，我陆军部队遭到一些伤亡，海军二一二艇被敌人炮弹击中，艇长负了重伤，舱内哗哗进水，人员伤亡过半，共产党员柏文昌同志挺身而出，“同志们，抢修！抢修！堵漏！堵漏！坚决把陆军送上岸去！”指导员接着宣布：“沉着气，剩下最后一个人、一块铁板也要把陆军送上岸去！”

陆军全上了岸，近战开始了，刺刀的撞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政工人员对敌人的喊话声，司号员的冲锋号声连成一片。见敌人在那里顽抗，陆军火焰喷射器指战员冒火了，他们狠狠扣动板机，喷射出一股股青蓝色的火焰，把躲在碉堡、坑道里的顽抗者烧得焦黄。经过一场肉搏，十八日黄昏，陆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敌人最后制高点——二〇三高地。

五

红旗在二〇三高地飘扬之后，躲在碉堡、坑道里的残余顽抗者，听到我们的欢呼声和“投降不杀，顽抗者枪毙”的宣传之后，纷纷撕下白衬衫当做白旗，在洞口高声叫喊：“我们投降，不要开枪。”他们披着长发，留着长须，面如土色，身瘦如柴，枪枝倒挂，高举双手，一个跟一个走了出来，女俘虏有的下跪磕头求饶。

俘虏中的一个渔民儿子向我们诉告说：“你们抓到的这些人，大都是土匪、流氓、逃亡地主，女的是从台湾送来慰劳的妓女，很少人是从海上抓来的渔家子弟。我是海门的，还有几个洞头

人，请解放军长官把我们放回海门、洞头，和家人团圆。将来你们去打台湾，我们跟你们去开船，送东西。”接着一个女俘虏下跪哭诉说：“我是台湾人，父亲被国民党抓丁抓走了，后来开小差回家，被国民党打死，母亲前年病死，去年初我被抓来做慰劳队，我没办法，解放军先生，我不愿回台湾送死，干这行，活着比死去还要痛苦。可怜，可怜我吧，把我送回大陆，给我一条谋生的路。”指导员耐心地回答她：“台湾贫苦同胞和我们是一家人，你放心，会给你出路的，站起来，不要哭泣，共产党不会杀害你们的。你看，我们今天抓到这么多俘虏，一个也没有杀、没有打吧，你放心好了。”

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胜利了！它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威力，显示了祖国人民的力量。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王 佐 传 略

吴直雄　郭德宏

绿 林 生 涯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生于一八九八年。祖籍江西安福县金田村，清光绪年间他祖父带着全家迁往遂川县下庄。因生活所迫，他母亲曾被典卖，他就是母亲在典卖期间生的。两个父亲相继去世以后，他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十二岁那年，他到一个裁缝家里当学徒，两年以后回家当裁缝。因他从小就饱尝了土豪劣绅的凶狠和残忍，在心中积满了仇和恨，一九二三年，便投奔井冈山一带的绿林好汉朱聋子，开始走上反抗的道路。

朱聋子原名朱孔阳，自称朱司令，经常到宁冈、永新、遂川等县“吊羊”，吓得豪绅们东躲西藏。他见王佐骠悍、灵活，不仅会缝衣，而且熟悉周围一带的情况，便让他当采买和侦探。他利用职业上的便利和情况的熟悉，及时给朱聋子“吊羊”提供情报，并采购朱聋子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样经年月久，他不仅越来越精明强干，而且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和枪法。

一九二四年夏，王佐用六十块银元买了一支九响毛瑟枪，回老家邀集旧时相交的十几名青年，独自组织起绿林队伍，自称营长，四出“吊羊”。这时，恰好遂川税警数人前来催粮收款。他觉

得这是个夺枪的好时机，便与哥哥王云龙等人商量，大摆筵席，灌醉税警，将他们全部缴械。从此，他威名大震，势力不断扩大。不久，他又请来铁匠刁飞林帮他打造武器，请来一个教书先生办理文书和教自己认字，不仅加强了武装力量，还逐渐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能看一般的书信文章。于是，他成了井冈山上文武兼备的绿林首领之一。

绿林队伍的出现，不仅遭到官府的追捕，各个组织之间也有许多矛盾。这年，王佐和井冈山坳背的罗冬生发生了冲突，弟弟斗娇被打死，自己被擒，险些被杀。一九二五年，反动军队牛文田团在永新拿山的大土豪尹道一等人的配合下进剿井冈山，王佐化整为零，避匿深山。当牛文田团准备撤兵的时候，尹道一怕自己吃亏，便以高官厚禄向罗冬生、王佐“招安”。罗、王中计下山，当上了永新、遂川边陲保安团团总和副团总。

尹道一见调虎离山之计已成，即行离间之计，谋杀了罗冬生，让王佐继任团总。然后，又准备剪除王佐。一九二六年春，王佐部下李斋脑欲夺团防大权，纠集几十个人深夜包围了王佐的住宅，王佐钻洞逃出，直奔茅坪找袁文才。二人相见，志同道合，因同年所生，遂结拜为“老庚”。王佐部下杀了李斋脑等人后，他又回去就任团总。

王佐在任团总期间，凭着他的武装，经常为贫苦农民免租免税，而对土豪劣绅和富户则加捐加款，因此富豪们对他恨之入骨。遂川荆竹山的土豪劣绅洪甫田等人曾秘密串连，收买刺客四十多人，发誓要刺死他。王佐得悉他们的阴谋活动后，暗中准备，当洪甫田等一露面，立即指挥团丁追杀，结果刺客死伤大半。洪甫田等财产被没收，便投奔尹道一，怂恿尹道一带兵进剿

王佐，并打死了他的侄儿王申福。王佐看清了尹道一的反动面目，发誓说："不把这个贼牯子灭了，死不甘心。"当即与团防一刀两断，重新举起绿林义旗。

新的生命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浪潮波及井冈山。第二年元月，遂川县农民协会派王文铮到井冈山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革命形势的发展，对王佐影响很大。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毅然将绿林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和各乡的农民协会一道，对尹道一、洪甫田等人进行了斗争，响应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从此，他结束了绿林生涯，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王佐没有退缩，继续坚持斗争。这年七月，永新的土豪劣绅勾结警察局反动头子李益连，突然袭击永新县农民协会，关押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事情发生后，中共吉安地委指示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前往解救。王佐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协同袁文才和安福的王新亚于七月二十七日打开永新城，救出了王怀、刘珍、贺敏学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佐、袁文才、王新亚任副主席。后来在反动军队的追剿下，王佐和袁文才又采用朱聋子与敌人打圈子的战术，各自保存了六十支枪。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准备挺进井冈山。王佐听说后，一度颇为惶惑，后来从袁文才那儿得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情况，才开始消除疑虑。十月下旬当他接到袁文才的来信说工农革命军要过井

冈山时，即选派亲信人到荆竹山迎接，并亲自带队伍到双马石哨口欢迎。

十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协助袁文才在步云山练兵后，王佐对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非常敬佩，对袁文才的进步也很羡慕。十二月上旬，他又得知毛泽东同志公布了尹道一恶意挑拨工农革命军与自卫军关系的来信，还在全体官兵大会上揭露尹道一的阴谋，指出尹道一是工农群众的仇敌，一定要消灭他，并表示愿意派干部帮助自己，便连夜召集刁飞林、李克昌、王云龙等人商议，决定请求毛委员派干部来。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给他写信，派何长工同志到他部队担任党代表。

开始，他仍然怀有疑虑和戒心，怕搞垮他的队伍，因此常背着何长工同志开秘密会议，还派了一个彪形大汉给何长工当警卫，对他进行观察。何长工同志看到这个队伍“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①，便采取了既不急又不缓的教育方法。他先做王佐母亲、哥哥及几个亲信的工作，同时送一些枪枝子弹加强王佐部队的武装，使王佐逐渐消除疑虑。然后，何长工同志提出了消灭尹道一的作战方案，帮王佐将尹道一诱出拿山。旗锣坳一仗，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一百余人，尹道一当场毙命，铲除了王佐的心头之患，为井冈山周围的七县人民也除了一害。这次战斗，使王佐深受教育，他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穷苦人谋利益的，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从此，他对何长工同志特别信任，及时接受他的建议，派刁飞林、李克昌、王云龙带着十几个人到袁文才的部队参观。袁文才部队步云山练兵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使王佐深受感动。于是，他主动要求改编自己的队

伍。

根据王佐、袁文才的要求，二月上旬在宁冈大陇朱家祠举行了升编大会，袁、王部队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何长工，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一营营长陈伯钧。袁、王在大会上带头宣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下，王佐部队逐渐改造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红军队伍。

毛泽东同志对王佐的成长是倾注了心血的。他一有机会，便找王佐谈话，给他讲形势，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有一次毛泽东同志路过茨坪，和王佐谈到半夜，使他深受教育。他常对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不久，他就向何长工同志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三月间，王佐受命出击湖南，接应南昌起义的部队上山。在实际斗争中，他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回山以后，他再次提出入党的要求。后来，经过前委批准，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英勇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井冈山根据地，一方面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一方面又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的物资异常缺乏。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成了红军的两项艰巨的任务。熟悉井冈山情况、具有丰富山地作战经验的王佐，在完成上述任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王佐、袁文才率部队攻入永新里田镇，没收了大土豪龙镜泉等开设的"仁裕和"、"仁和"、"同盖"、"仁

义合”等商号，为根据地的初创筹集了一笔资金，解决了部队经费的不足。

三月间，何长工、王佐等同志率部队去湖南时，从酃县直插资兴，在湖南农军第七师的配合下，于资兴滁口打垮敌人两个团，阻击了一股由广州向郴州进攻的反动军队，缴获了很多军用物资和枪弹，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湖南起义部队上山的任务。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红四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王佐继续担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

五月底，遂川匪首肖家璧乘特区在茨坪开群众大会之机，率四连匪徒到黄坳抢劫，同时切断我军民与遂川方向的往来，大有进犯井冈山之势。为了踢开这块绊脚石，王佐派邹文楷侦察了他的军力部署和行动路线后，立即率部队在下庄凤龙排与之激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了这股匪徒，肖家璧落荒而逃。这一仗的胜利，保障了遂川方向物资的流通，保卫了井冈山的安全。

六月间，国民党军队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由永新会攻宁冈。在龙源口战斗中，王佐、袁文才由老七溪岭袭击白口敌军补给站，他们发动全县的赤卫队、暴动队前往助战，迅速占领白口，使敌军腹背受敌，为龙源口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功劳。

由于反围剿、反封锁任务的不断加重，一九二八年七月成立了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由王佐任主任。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坚决执行了特委和前委关于巩固发展根据地的方针，一面在原有基础上扩充和加强后方机关，一面积极出击，夺取敌人的物

资。当他看到各处零星的修造厂不能适应战备要求时，就召集干部商量成立军械处，集中力量修造武器，并让他的老部下刁飞林连长负责这项工作。军械处不仅修造了大量武器，农忙时还修造了一部分农具。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他们突击修理了一门坏迫击炮，为保卫战的胜利立了大功。为了解决医药奇缺的困难，王佐还利用关系到吉安买药，使部队度过了难关。

七月间，我红军主力在永新、莲花、安福一带活动，湘敌吴尚部乘虚侵入宁冈。王佐、袁文才率部队发动赤卫队、暴动队奋起反击，配合宁冈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严密警戒，四面扰敌，粮食搬运上山，坚壁清野，敌人既无饭吃，又不明白我们的情形，进退局促，率众由宁冈向永新仓皇而走”②，使根据地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八月底在黄洋界保卫战中，王佐率三十二团二营及团部特务连担任硃砂冲、桐木岭、双马石、八面山等哨口的防御，击退了赣敌高功、尹豪民数千之众，有力地进行了配合。

由于王佐在打破封锁、粉碎围剿、守卫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在一九二八年十月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特委委员，他的住址曾被规定作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可靠通讯处。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和湘赣边区人民给予王佐的崇高荣誉和对他的莫大信任。

守卫井冈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主力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王佐奉命率三十二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一起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以牵制敌人。他和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具体部署了临战前的工作，落实了多项战斗任务，便亲自率三十二团

二连和遂川赤卫大队一部共一百二十人守卫硃砂冲哨口，并向山下派出侦察人员，了解茶陵、永新、酃县之敌的动态，盯住遂川方向的来敌。

红四军主力刚离开井冈山三天，湘、粤、赣三省之敌以二十倍于我之兵力，从宁冈、永新、遂川、酃县分别向井冈山猛攻。我军虽人少力寡，但在彭德怀、王佐等同志的率领下，“据险为守”，“十分沉着”③。经过几昼夜的激战，敌人面对险要的五大哨口一筹莫展。二十九日下午，吴尚在黄洋界东侧的斜源村用二百块银元收买破产富农陈开恩带路，当晚从桃寮沿着山溪摸进金狮面和棍子坳，从万箩谷偷袭黄洋界哨口的后方，攻破黄洋界哨口，继而又攻破八面山阵地，直逼大井；赣敌攻破我白泥湖阵地后，也直窜茨坪。王佐的阵地虽然未被攻破，情况也十分严重。

为了避免重大损失，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遵照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关于“五井如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联络”④的决定，率领红五军向南突围，同时命令王佐把三十二团改番号为“黄洋界大队”，和何长工等同志一道留在山上，“埋伏与敌相持”⑤。

当时正值隆冬，一连四十天下着雪，王佐率领黄洋界大队和各县赤卫队、游击队，与何长工、陈正人、李灿等同志一道指挥部队，以班为单位，分散在深山老林中，躲避大股敌人，灵活出击。战士们想出种种办法，如在山上利用敌人见烟火就放枪烧山的特点，到处施放烟火，采取有烟火的地方无人，有人的地方无烟火的办法；在山下搞交通破袭，断敌后路搞得敌人疲于奔命，给养断绝王佐还率领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实行敌驻我扰、夜间出击的战术，使得守山之敌粮食弹药的供应都成问题，在山上不

敢轻举妄动。在一个夜晚，王佐率领红军和地方武装处决了反革命分子陈开恩，敌人更加坐卧不安。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王佐还带领红军和赤卫队尽量地保护群众。他们宿在石岩旁、大树下，把比较暖和的山洞让给群众住。白天不能生火，他们只得在夜晚扒开积雪烤火做饭。有一次他们在老仙崖、韭菜窝一带遭到敌人追击，为保护躲进深山的妇女儿童，王佐亲自断后，使群众安全转移。环境虽然恶劣，由于王佐能以身作则，大家一致表示：就是冻死饿死也决不向敌人屈服！

由于王佐等同志采取“分散力量减少目标”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后来敌人屡次搜山，“结果无大损失”⑥，使得敌人“莫可如何”，不得不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⑦。

重树红旗

在井冈山失守的日子里，为了重树井冈红旗，边界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如何长工、陈正人、王佐等同志，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一九二九年二月中旬，湘赣边临时特委成立。三月上旬，特委正式产生并恢复工作，统一领导湘赣边区革命群众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三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守山之敌被迫撤走，王佐等同志率部截击，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随后，何长工、王佐、李灿等同志把游击队、赤卫队集中起来，与酃县的贾少堤、遂川的肖家壁、永新的尹豪民、宁冈的肖根光等挨户团（湖南）、靖卫团(江西）展开了斗争。他们袭击茨坪之敌时，先埋伏在东面的王洲坳下和西面的柿子坡边，然后乘敌酣睡之机，发起攻击，歼灭了二

百多个敌人。茨坪一打响，驻草坪、白银湖、大小五井一带的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回山了，纷纷逃窜，他们率队追击，又歼敌一百三十余人。不久，特委指示成立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下设两个营。第一营是王佐率领的黄洋界大队三个连，以大小五井为中心，向遂川、宁冈、酃县等地区游击，对付井冈山周围的敌人。王佐率领第一营配合第二营英勇战斗，打垮了宁冈砻市、古城之敌，缴了茶陵和尚庄挨户团的枪支，击败了永新陇田、潞江的保安队，全歼了宁冈的靖卫团，彻底粉碎了茶陵、永新、酃县、宁冈四县地主武装的联防会剿。

四月间，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打回井冈山。何长工、王佐即率一百余人配合红五军先后占领酃县、桂东两城，解救了三省会剿井冈山时被捕去的同志和群众，又接连攻克广东之城口、仁化、南雄诸镇，旋即回师井冈山。这次行动，缴获了约三百支枪和数万发子弹，筹办了数万元现款和大批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边界独立团的节节胜利和红五军的凯旋归来，使边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陈正人、王佐等同志的努力下，新遂边特别区政府首先在茨坪恢复，茨坪区苏维埃政府和大井等各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永、宁、莲、茶、遂、酃等六县也先后恢复了县委和工农兵政府，一场发动群众重新分田废债，扩大红军和赤卫队的革命运动又开展起来。

为了巩固和保卫革命的成果，王佐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部队和反动武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年五月下旬，肖家璧反动民团企图进犯行洲和下庄，王佐率部连夜出击，打垮肖匪，缴获了不少枪支、粮食和耕牛。六月间，特委将五、六纵队合并成

一纵队，统归王佐领导。十一月间，宁县伪县长陈宗经率县靖卫团到睦村催粮收款，王佐、袁文才得知后，埋伏在睦村周围，歼灭了靖卫团，击毙了陈宗经和伪公安局长等人，缴获了不少战利品。由于有王佐、袁文才这支部队威镇井冈，新任的宁冈县长尹志中“视为畏途”，曾一时“不敢到任”⑧。

禾 河 沉 冤

一九二九年四月间，跟随红四军南下的袁文才因一时动摇，由东固潜回井冈山，躲在王佐家里。王佐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及时地报告了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同志，并共同帮助他，让他放下包袱，担任了宁冈县委常委。但是，由于湘赣边界一带封建势力历来比较雄厚，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非常突出，王佐、袁文才和边界特委几个领导人的矛盾越来越大。加上党的“六大”曾有关于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土匪”，而起义之后即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的规定⑨，边界特委领导人便把已经改造过来并担任了党和红军领导职务的王佐、袁文才仍当作“土匪头子”看待，并强调要根据“六大”精神处决他们。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当时发生的几个事件，更促进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其一，是这年十一、二月间在永新小江区茶水冲一带召开特委会议时，特委几个领导人强加罪名杀害了威信很高的特委常委宛希先同志，王、袁对此非常愤慨，引起特委领导的不满。其二，是十二月间王佐、袁文才擒拿了茶陵民团头子罗克绍，因想让他交出兵工厂设施，未向特委汇报，便在新城亲自为其松绑，设宴招待，最后只将他软禁起来。这样，便到处风传着“袁王勾结罗克强”、“袁

王反水”等流言，特委领导人对他们更加不满，带着成见向来边界巡视工作的中央特派员作了汇报，中央特派员即以伪当真，武断地作出了杀掉袁、王的决定。

但是，王佐、袁文才在边区群众中很有威望，而且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特委对他们不敢轻易下手。直到一九三〇年三月间，他们错误的借助五军的力量，找到了一个机会，借整训部队为名把王佐、袁文才调到永新城，当晚便宣布解决袁王部队的命令，结果袁文才被打死在床上，王佐和刁飞林等人越过城墙逃跑，涉水渡过禾水河时中弹负伤，沉溺于禾水河的东瓜潭中。

王佐、袁文才的被错杀，完全是当时的过左政策以及当地的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导致而成的，其直接原因则是特委几个领导人抱有成见和中央特派员不作调查便武断地作出决定及五军领导人未加以详细的分析，轻信了特委意见的结果。他们的被错杀，是井冈山地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损失。当何长工、陈正人等同志先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说“杀错了”，“要平反”。

解放后，王佐和袁文才被追认为烈士，党和政府对其家属给予了抚恤和优待。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接见了王佐的妻子兰走莲和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等老人，并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表示了对革命烈士的深切怀念。

王佐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注解：

① 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载《解放军文艺》一九七八年第八期。

②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④⑤⑥ 《湘赣边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⑦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报》，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⑧ 《宁冈县志》卷一“后记”第十四页。

⑨ 参见“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关于张闻天同志的资料



张闻天同志

〔编者按〕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下面发表的几篇回忆录和印证资料，介绍了他在中央苏区的一些重要活动，供有关史学研究者参考。

广昌战役后的一场争论

伍 修 权

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处于严重的战争环境，洛甫（张闻天同志）对于战争的发展是很重视的。早时，李德到了苏区，洛甫觉得不大对头，但还不十分注意，到广昌战役就不同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李德、博古亲临前线视察，人们希望很大，以为可以打一个胜仗，凯旋而归，结果打了败仗，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支持不住，只好退了下来。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开了一次军委会，争论得很厉害。洛甫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说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就在这次会议休息时，洛甫同我有次个别谈话。他说，这种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并问我怎么看。我也同意他的意见。我深深地体会到洛甫是很注意这个问题的。他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会下也说了意见，态度是很明朗的。

洛甫同博古的争论，自然涉及李德问题。洛甫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他对于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样下去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而博古则认为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还是正确的。

那次争论的会议，李德也在场。李德后来还经过博古向洛甫转达了意见，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要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应该很好的合作。但是据我接触，在这次争论以后，洛甫的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就是说，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采取怀疑的态度。因此应该说，他大体上是在广昌战役之后就转变了的。

洛甫不直接参加军事指挥。但是，他当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军事情况的材料都抄给他，他还参加军委的会议。因此，他是了解反“围剿”的情况的。

那次争论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参加。李德到苏区后的第一次会议，毛主席是参加的，我在场翻译。李德当时非常狂妄，他的口号是，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不能打游击战，应该打正规战。毛主席处于当时的地位不愿起来驳斥，觉得这根本不对头，不可能取得一致。在这以后，毛主席就拒绝参加会议，也就是说同李德没有合作的可能。

当时经常参加军委会会议的是博古、洛甫、稼祥、恩来、朱德。稼祥同志在这一个时期讲话还少，他也有病。长征开始以后，稼祥就积极并且活跃起来。

军委会上的那场争论，显然洛甫是正确的，事实在军事问题上，当时错就错在不应该以堡垒对堡垒，这是第一。第二，不应该分兵把口。那时苏区人民参战是很热烈的，成立了很多部队。但是成立一个部队就在一个口子上把起来，弄成一个圈圈，四面把守。

那时彭德怀对李德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就在广昌战斗期间，李德到三军团司令部去，彭老总就非常不高兴。谈话中他指着李德说："你叫做崽卖爷田心不痛。"当时我跟杨尚昆两人翻译。这是句湖南土话，我还不很清楚。杨尚昆同彭老总接触更多一些，因此他了解，就翻译说，这就是晚辈浪费了祖宗的财产。彭老总并且指着李德的鼻子说："你就是瞎指挥。"

可是林彪却是另外一个样。李德那次到三军团以后又到一军团。林彪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会，请李德作指导。李德大讲了一通短促突击之类。林彪对这一套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却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今天听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散会之后，大家好好学习。根据这个思想，林彪就写了短促突击的论文。

以上可见，自广昌战役之后，洛甫在反"围剿"的军事方面，同博古同志以及李德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意见。这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刻，进一步说，也是遵义会议能够召开的一个基础。

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功，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交往

吴　黎　平

一九三二年秋我在上海出狱以后，中央分配我去中央苏区，我先在红军学校，接着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在我担任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期间，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而张闻天同志则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他们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情，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让张闻天同志担任政府职务，确有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安排来排挤毛泽东同志对政府工作的实际领导。但是，据我了解，由于张闻天同志是正派的人，而毛泽东同志对人又总是循循善诱，从而深切感动了张闻天同志。因此，他们二人在政府工作的一段，并没有按中央一些领导的意图发展，而是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同志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早在张闻天同志正式宣布就职之前，就有过两件事，至今还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一件是与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按照议事日程，大会共有四个报告。毛主席代表中央政府作总的工作报告。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报告分

别由朱德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作。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报告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我去作，得到了张闻天同志的赞成。在我准备报告过程中，既请示了毛泽东同志，也请示了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的新职虽然尚未公布，实际上已经到职）。他们都一致地指示我在报告中要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我遵照他们的指示起草了报告，突出了上述两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这就从一开始给我留下了他们在苏维埃建设问题上看法一致的清楚印象。

第二件是同福建人民政府的谈判有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爆发的福建事变，应该说是红军打破蒋介石五次“围剿”一个有利的时机，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博古同志等采取了实际上有利于蒋介石的错误方针，在政治上不愿同反蒋的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又不与它的行动相配合。对此，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的，说这是最愚蠢的、帮助蒋介石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据我了解，闻天同志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比较接近，而不同意博古他们的错误方针的。

就在“二苏”大会准备期间，军事上受到蒋介石军队重大压力的十九路军，曾经以福建人民政府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我们配合行动。记得同他们谈判的有周恩来同志、刘伯承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参加同他们的谈判。开头一段谈判进行得很好，我把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后来也向张闻天同志报告了，他们都支持这一谈判，主张军事上积极配合。可是当时中央的领导，却不予理会。不久，十九路军宣告失败，此事自然也就作罢。不过从这一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无论在统战和反“围剿”战争战略的问题上，张闻天同志的看法同毛泽东的正确

方针都是比较一致的。

及至张闻天同志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之后，毛泽东同志同他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同志亲口对我说过，闻天同志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毛主席还告诉我，闻天同志对他的病十分关切，还用手抚摸了他的痛处，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在工作中张闻天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是十分尊重的，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同志参加和指导，那时中央一些负责人歧视毛泽东同志，而闻天同志却很注意请教毛泽东同志。本来在张闻天同志来政府工作之前，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那时，我有事都请示毛主席。张闻天来政府工作之后，这一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茏的樟树，张闻天同志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同志时，他经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取他的指示。这样，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文件的制定，都要去请示毛泽东同志，这一点对于我，前后都是没有变化的。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们两人一些观点和主张也都比较接近。比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本人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给了张闻天同志不小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亲自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同志就很受感动，他对有的同志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呵！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一件事是，张闻天同志曾效法毛泽东同

志开调查会。当时战争紧张，群众生活有不少困难，基层苏维埃的建设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坚决反对当时有些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三年秋冬就系统地进行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深入地了解了这个问题。在回到瑞金中央政府之后，他又专门召开了几个乡的调查会，会后，写出《乡苏怎样工作》的有名的指导文件。张闻天同志觉得开调查会的办法很好，于是又在毛泽东同志调查“乡苏”情况的基础上，召集了几个区的同志开调查会，和区的工作同志一起商讨了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文件，这两份在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指导文件，对于中央苏区的政府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民委员会专门出版了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所著的两个文件的合订本。书出版后，我曾经对张闻天同志说，这本书很有用，他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呵！”

毛泽东同志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的排挤打击，张闻天同志也在实际工作中与李德、博古他们发生分歧，这两个方面当时连我也感觉得到。张闻天同志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一句李德的好话。五中全会我列席旁听。据我了解，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会，张闻天同志情绪上也比较消极。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过后，闻天同志就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他的这个反应同博古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他是多少从实践的体会中说出这句话的。还记得就在这一年九月，张闻天同志得知毛泽东同志在

零都生了急病，表现非常关切，立刻通知傅连暲同志赶去零都治病，这样毛泽东同志的病很快就得到了好转。

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张闻天同志由于同博古他们分歧的发展，在组织上也受到博古他们的排挤，这也是很清楚的。这里可以举出一件事情。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会后我又问了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说，他也向他们提出过，但他们就是不同意。

当天晚上，我请秋白同志到我家里吃饭。那晚上，秋白同志万分感慨地说，以后我们不知道能否再见面了。但是请同志们相信我，我永远是革命的人，永远是属于党的。这是我同秋白同志的诀别。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对秋白同志的态度上，毛泽东同志是同张闻天同志一致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当时都是无权参与决定的。

张闻天同志后来告诉我，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和他又有过几次长谈。看来张闻天同志在后来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同志，和这些交谈显然是很有关系的。

解救傅连暲

陈　真　仁

傅连暲同志是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这一伙阴谋家对傅连暲和我们全家的迫害，常常使我联想起傅连暲生前十分敬仰的一位恩人和战友，这就是张闻天同志。早在中央苏区肃反时，张闻天同志就主持正义，解救过他的性命。

我本来是在四方面军的，中央苏区的肃反，我并没有参加。这件事，是我听连暲本人一再对我讲的。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连暲和我都到了左路军，这样我们相识了。到了陕北，一九三六年我们结了婚。婚后不久，他第一次详细地对我讲了他的全部经历，其中就讲了这件事。

连暲同志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为革命工作了。那一年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过汀州城，他利用所在的教会医院——福音医院，接受了大批伤病员的治疗工作。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又一次解放了汀州城，就在那次他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见了面。后来由于红军暂时撤退，在国民党军阀的残害下，他的两个亲人都牺牲了，他自己也差一点死在敌人的刺刀下。直到一九三三年，随着福音医院的全部设备转移到苏区，他的全家也搬到了瑞金。傅连暲不仅自己献身革命，并且连他私人的多年积蓄也都交给了党。这件事当时得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表彰，苏维埃政

府的机关报还为此发表了文章，题目叫《红匾送给傅院长》。

可是连璋同志却万万没有想到，后来苏区开展的肃反，竟有人无根据地搞到他的头上。那时中央苏区正处在五次反“围剿”的时刻，根据地内打击反革命的肃反斗争也开展起来。但是连璋同志感到气氛有些不正常，有人背着他开会，把伤病员召集在一起，诬陷他，说什么他把病治坏了，还弄了一些人在会上喊要打他。他当时虽然也有点想不通，但觉得自己既然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因而也就没有理会这些人。然而事情却发展得愈来愈严重，种种离奇的说法都出现了，甚至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到瑞金来？”污蔑他是AB团、社会民主党。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为大会的保健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有一天有两个人来到他的跟前，抓住他的手，要他跟他们走，说要到司法部去公审他。到那里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连璋立刻甩开了他们的手，说：你们要干什么?!气愤地跑出了大会会场。

连璋同志这时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要处理他的地步，才感到不能不向党申诉自己的情况了。于是他终于找到了张闻天同志，说明了情况。张闻天同志听了之后立刻就拿起电话筒，给当时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张闻天同志在电话上严肃地批评了对方，说：“傅连璋的事你们不能再搞了，马上停止，要是不停止再搞下去的话，就处分你。”就这样，这件事才算压了下去。

其实，连璋的历史是清白的，整他的人抓住他同国民党军阀郭凤鸣的关系大做文章。事实上，他同郭凤鸣表面上的一套应酬，还不是为了党的事业，就拿给郭凤鸣看病来说吧，他可以从中获得敌人许多内情。一次在他给郭凤鸣看病之后，他就从这个军阀

手里看到一张汀州地下党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于是他走出郭凤鸣的病房之后，就立即通知了几个人，这样十多个共产党员就全都得救了。肃反中搞他的人说他是敌人的军医处长，一定是敌人派到红军里来的，其实他只是安了个名。那些人又硬要他承认给敌人做了内奸的事情，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做，承认什么呀！"

正是在那种有口难辩的情况下，是张闻天同志出来主持正义，向人们证明他是好同志，所以傅连暲同志特别感激张闻天同志。他头一回提这件事是眼里流着泪对我说的，因此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这条命完全是张闻天救的，当时如果没有张闻天打那个电话，出来替我说话，我早就死掉了。

那时我虽然年岁还小，听了也还是很有感触。这里有两方面，一方面觉得象他这样一个大夫，既不是为名，又不是为利。要说名誉地位吆，他早就有了，来革命队伍究竟为了啥呀，还要受这么大委屈。另一方面，他所讲的张闻天的这一行动，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个真正的正派的共产党人的印象。我当时就想，张闻天同志同傅连暲一无亲二无故，要说关系吧，他一九三三年才从上海来苏区，时间也不长，为什么却能够出来替傅连暲说话，这正是说明了他为人的品德好呀！我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感受，这里还有我个人的原因，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肃反政策下，有不少人不是死在同敌人战斗的战场上，而是死在革命队伍内部，我的三个哥哥都是知识分子，至今连个下落都不明，我估计他们很有可能是被张国焘"肃反"肃掉的。相比之下，更加引起我对张闻天同志的尊敬。

由于连暲心里一直抱着对张闻天感激的心情，所以平时遇到

张闻天同志有什么病，他总是坐卧不安。就是张闻天同志身体健康，他一年也得去看他好几次。一九五二年我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还把一件人家送给他的象牙雕刻，叫我去时送给张闻天同志，说他招待外宾用得着这个东西。

革命的情谊，使我们永生怀念张闻天同志。

佐 证 几 则

张 培 森

在整理伍修权、吴亮平和陈真仁三位同志谈话记录的过程中，我查考了张闻天同志遵义会议前在中央苏区发表的文章，发现有些可以作为这些回忆史实的佐证。张闻天同志作为当时“左”倾中央的负责人之一，曾经犯有“左”倾错误，但是经过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影响，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逐渐有所觉悟，因而他在遵义会议的转变决非偶然。现将有关文章选择几篇介绍如下，供读者参考。


斗爭

《斗争》第三十六期张闻天同志的文章

（一）《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刊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三十六期，署名洛甫，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正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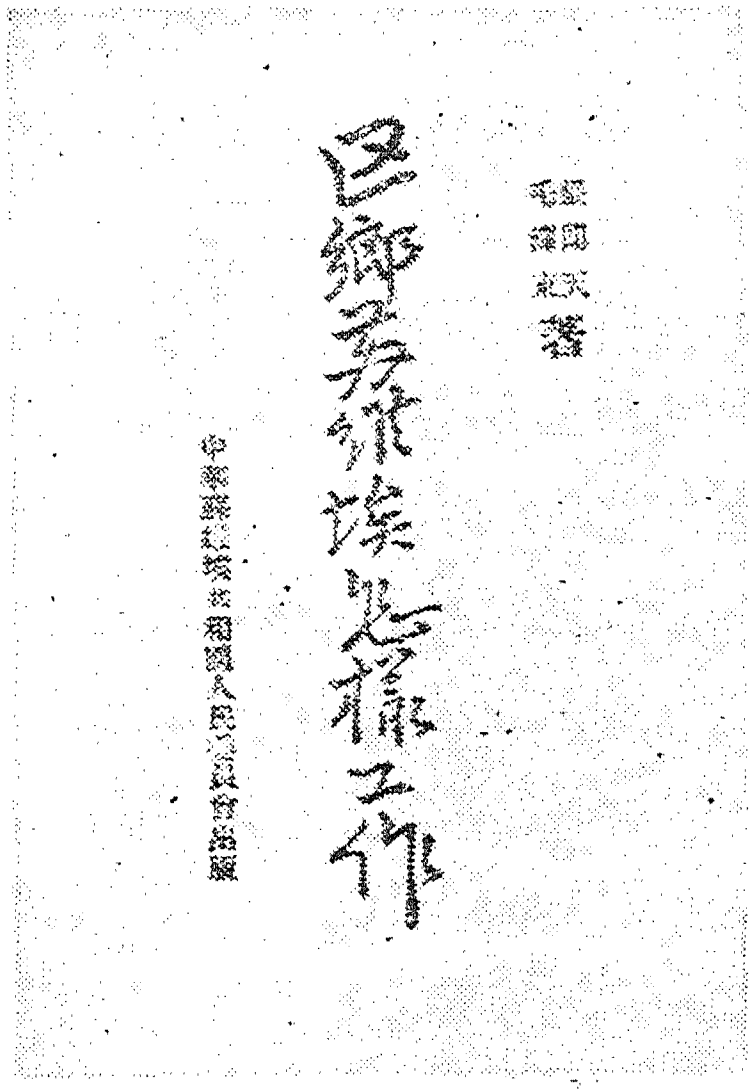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次日，也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的当天。

文章题目所说的苏维埃政府的宣言，是指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文章内容反映了张闻天同志对宣言的理解，即认为宣言不只是口头的宣传，而且应该是建立包括国民党上层军事将领在内的统一战线的行动号召，为此在党内不但要反对右倾，而且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

文章分析了民族危机所引起的国民党内部营垒的分化，指出“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性”，论证了同这种国民党军阀建立“上层的统一战线”的必要。

文章虽然也有当时“左”倾中央共有的“右倾是最危险的”等提法，但是全篇所着重强调的则是反对在同国民党上层订立协定问题上的“左”倾思想。文章批评了否认任何妥协的“左”倾错误观点，尖锐地指出：“自命为清高的，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做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又说：“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在当时，如此尖锐地在党的刊物上批评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署名文章，还是仅见的。

（二）毛泽东、张闻天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该书收入毛泽东所著《乡苏怎样工作》和张闻天所著《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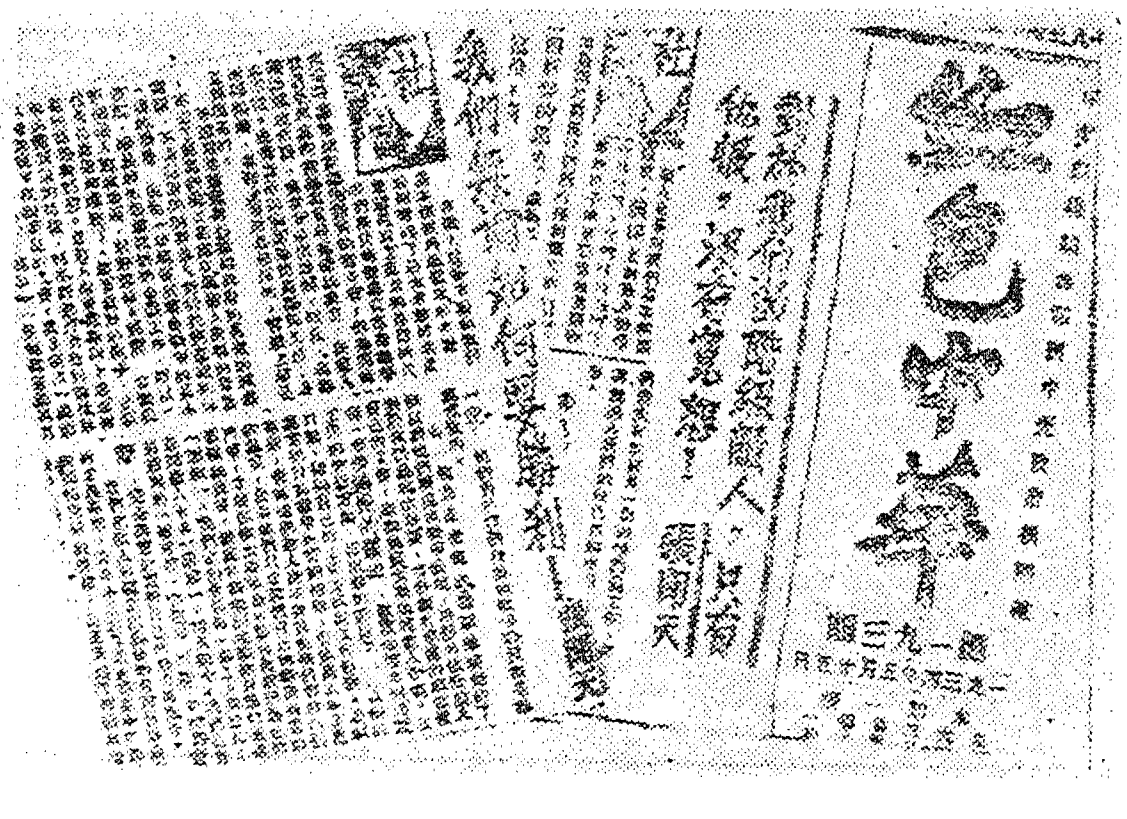
《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封面

文章。版权页上标明：著作者毛泽东张闻天，出版者人民委员会，印刷者中央印刷厂，发行者中央政府发行处。

张闻天同志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认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需要在区苏工作中克服的基本弊病。文中写道："我们工作的基本弱点在于对于各乡的情形缺乏具体的了解与一般(化)的领导，以及包办、代替与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为了克服这些弊病，该文强调，领导要"深刻的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形"，到下面巡视工作的巡视员"不能坐在乡苏机关里，听一听乡苏主席的报告，抄一些数目字，就算完事"，而是要找村干部及群众个别谈话，"倾听每一个同志所发表的意见，仔细的将所得材料加以分析，然后同乡苏同志共同商量，提出具体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同毛泽东同志当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倡导相接近的。

文中还具体介绍了兴国县上社区组织"工作小组"的经验。可以看出，张闻天同志的这篇文章也是在对"下面的实际情形"多少作了一些考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写成的。

（三）《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一八三期社论，署名张闻天，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红色中华》第一八三、一九三期张闻天同志的文章

“围剿”中广昌失陷的前一天。

文章的基本内容是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文章批评了那种把修筑堡垒当做动员群众参战的唯一方式，说这是“单纯的堡垒主义”的表现，同时批评了“分兵把口”，说它“同堡垒主义，是紧密的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文章虽然还有一些观点带有当时的局限，而上面这个对作战方式的批评也主要说的是游击斗争，但是从这段话却可以看出张闻天同志对于当时“以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的军事方针是不同意的，其批评也是十分尖锐的。

（四）《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一九三期社论，署名张闻天。当时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深入到根据地的内部。为了对付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的阴谋，苏区开展了严厉打击反革命的斗争。张闻天同志撰写的这篇社论的中心思想是，号

召广大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同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文章虽然也有一些当时政策界线不清的提法，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乱捉乱杀的“左”的倾向，则是表示坚决反对的。文章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对于那些乱捉乱杀，滥用权力的人，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我们应该知道阶级敌人也会利用我们的权力，来对付工农群众与我们自己的积极同志的。这种‘肃反’或‘赤色恐怖’不但不会发扬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群众的恐怖，使他们消极与逃跑。也许犯这种错误的人本身不是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的这种行动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确做了最好的服务。”

（一九八二年五月）

我所记忆的黄显声将军

王　化　一

一

黄显声将军是辽宁省凤城县人。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时，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九一八”事变时，他率领警察人员退出沈阳，循京奉铁路西上，沿途收集各县逃散的保安队、民团、溃兵、土匪及武装爱国人士，组成抗日队伍，且战且退，步步为营，阻止敌寇西进，途中汉奸凌印清为他诱杀，叛匪张学成（张作霖的侄儿）为他击毙，并除掉一些日本特务和附逆的走狗。可以说，他是“九一八”后首先抵抗日寇的爱国军人和东北义勇军的组织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以后（以下简称救国会）即和黄显声将军发生联系。他在途中组织抗日军队时即电约救国会（附录电文一）派员出关组织“甲警民团”抗日，东北义勇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黄显声将军从这时起就和救国会的负责同志日相接近。

日寇西逼，锦州撤防，榆关吃紧，热河告警。汤玉麟腐朽贪污，不能担当守土抗敌重任，张学良将军早已鉴及，有心撤换，但汤为张作霖患难老友，碍于情面；同时又恐操之过急，促使汤

和日寇勾结，踌躇未决。救国会负责同志劝张下定决心，撤汤救热，并推荐在黄显声、王以哲两人中择一充任，而对黄尤为推重，曾电促黄率领所部向热边靠近，并派出政工人员到辽西各地指示所有义勇军听黄指挥，随同入热。大家推我向张陈述救国会以黄继汤的意见，张表示同意，决定换汤，但事为张作相、王树翰等闻知，恐惹日寇注意，怕汤玉麟背叛投敌，力阻此议。万福麟原希望换汤后，以他接任，及听说黄显声有继任希望，亦附和张、王，说不宜在危急时换人，并说黄显声资历声望太浅。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深夜，张学良亲以电话通知我，说："昨谈热河问题，有人反对，请转告救国会同志们，此议暂时作罢，请不要向外人泄漏。"不久万福麟等不战而走，汤玉麟放弃承德，狼狈溃逃，如果当时张接受救国会意见，以黄代汤，步步低抗，热河情况不致变化那样快。

一九三二年秋，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商得救国会同意改组东北义勇军，在各军团之上设总指挥，适张学良将军委黄为骑兵第二师师长，辽宁总指挥部也就未再成立，仍由救国会军事部负责指导。

二

"九一八"后，东北青年不甘受蹂躏而流亡北平者逾万人，张学良将军拨款救济，并嘱我设法收容。我在救国会同志们的支持下，成立东北学院，一面收容救济，一面补习功课，后正式改组为东北中学，救国会负责同志多数兼任董事，我兼任校长。为了培养义勇军干部及作抗日救亡准备，学校严格军事训练，张学

良将军拨给六百支步枪、若干挺轻重机枪及其他军用器材，军事教官由张从军分会干部中调拨，其中不少人是由黄显声将军推荐的。这个学校引起了蒋介石注意，认为它是为东北系培养干部的“黄埔第二”，遂明查暗访，想尽办法予以破坏，从而使学校更引起日寇方面之注意，汉奸特务跟踪寻衅，在学校附近公寓住有日鲜浪人，长期监视学校行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学校借用骑兵第二师名义要来军用车皮，全体师生荷枪实弹去南口作军事演习。在南口车站下车休息的时候，忽来日本军用卡车一辆，上插太阳旗帜，载有全副武装的日寇数十人，车开到学生面前，突然停止，日寇以枪口向学生队伍做预备射击姿式，便衣特务用照像机拍摄照片。我当即叫学生不要惊慌，和教官们商量对策，决定严加戒备，衅不我发。在一部分学生掩护下，全体退入附近山地，找到掩体，以防袭击，准备抵抗。这时日寇也下车散开，放出几只军鸽，向北平方向飞去。大家认为可能发生严重情况，我便借电话和救国会同志联系，告以情况请转向军分会报告，又找到黄显声将军向他求援，他很坚决地说：即命全师骑兵准备出发，如果开火，只要学生们能支持几小时，骑二师一定赶到支援。他估计这是敌人要的恐吓手段，坚嘱我们镇静，千万不要先动手，并说他即时报告军分会请他们妥善处理。这时张学良将军业已离平，虽由何应钦、黄郛分担北平军政责任，但军分会高级职员仍系张的旧部，他们对东北中学也相当关心，即紧急向何应钦转报。何首先严令黄显声将军不得妄动，说由他负责解决，立即和日方交涉。何派朱某乘汽车疾驰南口，恰好日寇增派的十二辆军用汽车满载军队同时到达。日寇下车后即散开，与学生们对峙，情况严重，一触即发。

朱某先向我传达了何应钦的意见，制止冲突，然后操亟流利的日语向日寇一个队长交涉。交谈中日寇又开来一辆小汽车，一个便衣官员下车后向日寇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日队长即发出集合口令，全体士兵均登上卡车，向十三陵方面开去，于是一场风险以“误会”二字结束。我们空耗费了大半天时间，来不及演习，只好略为游览，整队返校。

何应钦、黄郛在压迫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救国会停止抗日活动而后，又接受日寇要求，强迫东北中学移出北平。我们不得已迁往河南鸡公山，在迁移时仍是以黄显声将军骑二师名义要来军用车皮始能成行的。黄显声将军遭受国民党当局之疑忌，此其开端。

后来黄将军将他的儿子送入东北中学，夏季他时常来鸡公山和学校师生打球欢聚。

三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黄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黄师隶属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驻京汉线石家庄附近。万福麟借口事变前张学良未和他商量，贸然举事，意存观望，国民党派高惜冰等到石家庄拉拢万的部下师长朱鸿勋等反对张、杨行动。而黄显声将军则是同情西安事变者，主张沿京汉线南下直驱郑州，牵制国民党攻陕军队，和万意见相左，为万所抑制。经在北平的东北进步人士劝阻，万虽未反张，亦未积极响应西安举动，事后黄被解除兵柄，到武汉过流亡生活。

这时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东北军师长）受党的影响，来到陕北，党希望他号召东北爱国军人组织抗日队伍，与红军携手

抗日。黄和张廷枢的关系很好，同时共产党员刘澜波在黄左右很久，对黄的影响也很大。因此黄接受党的建议，准备和张廷枢一同北上抗日。他交卸军职时把一批精锐武器秘密移存在虢镇，待机利用。事为万福麟获悉，多次向黄索取，黄不承认，万又利用他儿子万国宾和黄的私人关系，想尽方法谋取这批东西，黄坚持不给(编者注：据黄中同志回忆，这批武器运到了延安)。万在愤怒之下派军队到虢镇强行搜取，又扑了一个空。因此，万家父子和黄表面上虽仍有往来，而骨子里结怨极深。

四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背叛了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瓦解东北军，迫害各地爱国人士，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日寇摸清蒋介石不抵抗的底，更疯狂地向国内进犯，华东沦陷，举国哗然。共产党毛主席号召团结抗日，全国一致响应，于是东北各救亡团体及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活动中心由北平而上海、而南京，京沪沦陷后移来武汉（地址武昌明月桥)。东总的公开活动，以在武汉阶段最为活跃，(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活动中心又移至重庆)，主要工作有：成立干部训练班、读书会、生活检讨会，组织话剧团公开演出爱国戏剧，请八路军将领（李同志）为干部讲游击战术，台儿庄捷讯传来，发起火炬游行，制送慰劳袋等。东总曾如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虽其间遭受特务分子的迫害（如齐世英、韩韬等的诬控，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六期阎宝航同志撰《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CC 派对东总的诬陷 案段)，军、警、

宪对东总的检查，但因为有党的支持和领导，仍然坚持奋斗，而其时CC和黄埔两系统的矛盾、冲突，也给东总存在以有 利条件。东总便开展了更广泛的统战工作，在关外不能立足的东北义勇军将领，在西安、北平各地受压迫的东北军旧部，和不甘受敌伪利用的东北爱国人士相继奔来武汉，和东总发生联系。这时参加东总工作的已不限于东北籍人士，宣传队内几乎各省青年都有，而国内各救亡团体的负责人和东总领导干部也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大都发生了联系。

黄显声将军交卸军职以后，移居武汉，更和东总相接近，他过去受旧军队作风影响，生活有时不检，来武汉以后，严格约束自己，阅读进步书籍，学习党的政策，深居简出，除了和党以及东总负责同志时相晤会外，很少和旧东北军官、官僚往还，其他公共场所更少出面，他一直准备北上抗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约我在他的寓所里和周恩来同志晤谈。我们三个人由晚八点谈至深夜，主要听周总理谈了三个问题：一、分析上海、太原、南京失陷后的抗战形势，批判汉奸、投降派的卖国行为和蒋介石片面抗战的荒谬论调；阐述共产党毛主席的全面抗战主张，强调全国一致，团结所有爱国力量，避免磨擦，共同对敌。二、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说明八路军及游击武装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确信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灭亡。三、关于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及东北爱国人士的情况及出路。也谈到东北救亡总会在这方面应起的作用。

因时间过晚，关于张学良将军的问题约定再谈。分别时已夜静人稀，为防备特务谋害，我同黄前后分开护送周恩来同志走一段路，始各自散回。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午后三点，我们在黄寓再次同周恩来同志晤谈。周对张学良将军极为关切，他分析了西安事变在抗战中所起的影响，希望我们多利用各方面人事关系，了解张的情况和他的安全问题，由各方面着手营救张将军。因为六点东总负责同志们宴送张廷枢北上，五点即结束谈话。

在这两次同周恩来同志的晤谈中使我们两人进一步认识抗战的形势，坚定必胜的信心。

五

东北籍军官张碧天（又名张斗南）是一极坏的投机分子，西安事变后他钻营到康泽门下当特务，做了康泽的机要秘书，招摇于同乡面前，自鸣得意。一九三八年初，张向所有在武汉的东北知名之士发出请帖，在汉口青年会西餐部大宴宾客，出席的大约三十多人，其中军官较多，李杜、刘伟、刘多荃、万国宾等均出席，我也应邀到场。张碧天知道自己的地位、品质不得人望，一定有些人不肯出席，事前他亲自各家拜访。黄显声将军深知他的为人，根本瞧不起他，张特求万国宾前往劝驾，黄对张碧天的邀请，不但表示不去，还当着万国宾说了张碧天不应当如此招摇的话。万和黄本来明和暗不和，便加枝添叶地转告了张碧天，张恼羞成怒，恨之入骨，搜集、编造一些黄的情况，给康泽打了一个报告，主要的是说黄和共产党的关系。康据以呈报蒋介石，于是将黄逮捕，黄被捕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之后一天上午刘多荃、万国宾两人很紧张地来找我，说黄的爱人说黄在夜间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业已失踪。大家推断一定是军统戴笠干的，约

我一同去见戴笠。我们即时一起找到戴笠，向他说明情况，要求释放，戴坚不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黄被捕的消息，可能有别的意外。万国宾说他听张碧天说在有关黄的文件上看到蒋亲批“拘审”二字，确系政府将他逮捕，不会有其他意外发生。戴当时听了表现很不自然，答应问询明白，再为设法。次日刘、万两人又约我一同去找宋子文，除了托他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外，还求他向蒋介石、戴笠为黄说情。后来我又去找戴笠，请保释黄，他说：“这案是康泽办的。因为张碧天泄漏机密，昨天已将张逮捕，现在两人均移押武昌行营，归第三科办理（第三科是军统系统，由戴直接指挥）。因为案是康泽签呈的，又是‘委员长’亲批，案情严重暂时不能保释，稍缓再为设法。”并说宋子文已向他说过，已嘱附第三科科长简朴对黄特别优待。我即日去武昌行营找到简朴，约求见黄，他说戴笠有话，任何人不能接见，但对黄予以优待，可随时送来衣物钱款。他并说他自己在行营有一份科长待遇的伙食，他不常来行营吃饭，可以把这份伙食让给黄吃。在武汉期间，我多次要求见黄，均未得到允许。有一次简朴说黄张两人在院中相遇时，张每次都大骂，已将张加镣，另行拘押，后来听说张碧天发疯，病死狱中。

据各方面情况分析，估计黄被捕的直接原因是张碧天告密，内幕仍是万家父子在搞鬼；张告密的内容也可能是万国宾供给的。万福麟也曾邀同莫德惠、刘哲等向蒋介石、戴笠求情，但均遭拒绝。

至于捕黄的手续，蒋介石报告虽得自康泽，而直接逮捕黄的应当是戴笠，而不是康泽，由于戴笠能随便逮捕张碧天，更可证明此案是由戴笠主办的。起初他说不知道黄被捕消息，是骗我们

的鬼话，如果不是张碧天漏泄机密，可能黄就要一直“失踪”了，戴笠所说“别的意外”的话，便道出了他的这个鬼胎。

六

武汉失陷前，军统将黄移押贵州息烽特务监狱，距张学良将军被押地点很近。关于张的消息还得到一些：一次张有亲笔信给我，说于斌以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名义向他捐款，让我处理，我持函问戴笠怎办？戴拿出三千元以张的名义捐给于斌；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军统大特务周伟龙自息烽来，传达说张的身体精神都好，张让我转告东北旧部，不必惦念他，这时外面正有谣言说张遇害；四〇年四月十八日，张写给东北将领万福麟、于学忠等几封亲笔信让我转交，也是说他情况很好；四一年，张患急性盲肠炎，转腹膜炎，几乎发生意外，到贵阳动手术，住了多日。当时外面传张已逝世，并说是被害而死，我曾要求到贵阳去遭到拒绝。七月，戴笠由贵阳回重庆，和我谈医治经过，让我转达东北各方，以释群疑，以后便无音讯。至于有关黄的消息则只有一次，四三年，息烽县长王宠五来重庆，他是军统特派的县长。王特来找我谈话，述说张、黄两人最近情况，他说：“张副司令为人太好了，我经常和他接谈，受他的感动很深，不但我自己，就是‘保护’他的卫队长刘乙光以及士兵们对他也无不崇敬爱戴。刘和我均向副司令表示过：如果你愿意逃走，我们都可以跟你一起走。”他又说：“张副司令经常提到你，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所以对你无话不说，可是这话不能让戴老板（指戴笠）知道，知道我们就没命了。”接着他便谈到黄显声将军，他说：“黄显声和刘乙光两

人和你都很熟，我们时常晤面，黄是‘大学’（军统叫特务监狱为‘大学’）的参谋长，刘是秘书长，两人一文一武，对‘大学’其他学员帮助很大。黄的外语很好，他很自由，吃住都和其他学员不一样，很受优待。来时张、黄两人均叫我向你告知他们近况，你有什么话让我转达的吗？”王宠五讲了很多话，我无法置答，只有微笑，因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问了些张在手术后的健康情况，知道他腿部又患关节炎，请他转告张黄两人，他们旧友旧部在重庆的都很好，都一致关心他们两人的健康。这是我知道的黄显声将军最后的消息。直到解放，才知道他和杨虎城将军一起被蒋介石惨杀。

附录电文一件（锦州发）

北平副司令部译转奉天会馆抗日救国会鉴：斌密感电谅达。日军西进后，显声所派民团已占领皇姑屯，破坏绕阳桥，令其进退维谷，攻锦之计划第一步失败，扰乱工作异常收效。请贵会速派妥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鼓吹警甲民团，联络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则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前三日辽河东岸，日军被我处新委盘山第十四总队项忠义部击退，并击毙数十名，附闻。黄显声印，俭印。

（一九六五年四月）

黄显声将军被囚禁的前前后后

王　凤　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囚禁。张的部下黄显声将军为了营救张学良，奔走呼号，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但蒋介石均置若罔闻。

若东北军那几位握有实力的军长能携力向蒋介石据理力争，在抗战初期极需兵力之时，蒋介石有可能买他们的帐而释放张学良。但苟全禄位的万福麟、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等却袖手旁观，竟对黄显声将军的奔走呼号不闻不问。蒋介石见张之旧部多系毫无政治头脑有奶即娘之徒，深知他们之间不会再有团结，当然对形同伴食宰相的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的要求毫不感到压力了。

被　捕

一九三七年末，黄显声将军同张学思随着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武汉，进行营救张学良的活动。求告权贵——找宋子文，走内线——找宋美龄，这些事他们都做过了。甚至向蒋介石请求以他俩个人的自由牺牲换得一张先生的自由，这也没有打动蒋介石。于是，黄显声将军不再走这条哀求的道路，而转向斗争，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积极争取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社会青年走革命的道路

（去延安）。在黄的说服下，许多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奔暗投明参加了革命的队伍。

在武汉的活动中，黄将军不吝金钱，大力资助去延安的人们。他的活动招致特务注意。在一次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聚会中，他毫无保留地说道："蒋介石不真心抗日，他说抗日是敷衍舆情，不这样做他会被抗日洪流淹没到海底下。假如有机会，他还会镇压抗日的爱国志士。我们看啊！主张抗日最力的张副司令值此全国共起抗日之时仍在囚禁着。我们已做过一切恳求释放的努力，他理都不理，其用心不很明显吗？一，是他抗日是假，而仇恨抗日者是真的；二，是他想借抗日之机消灭东北军。事实不就是这样吗？他自己的部队打垮了马上重新整编并加强之。张从上海撤退下来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仅由于军长吴克仁下落不明，就立即把该军改编成一个师（一〇八师），把六十七军的番号送给川军。东北籍、东北军和东北讲武堂出身的人，简直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跟着蒋介石还会有出路吗？跟着他抗日能抗到底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们收拾了。大家无不关切张副司令的自由，也都做过各种努力，结果是徒劳和妄想。我干了半辈子军人，这回算是长了见识，从蒋介石处学到一样真理，即是'拳头'。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无论是营救张副司令也好，个人求生也好，除参加革命外，别无它途。也只有在革命力量大过他反革命力量的时候，我们才有说话的权利；那时，蒋介石会向我们低首下心说好听的。从前张副司令在东北时拥有几十万大军，对中国的局势举足轻重，当其出兵拥护中央的时候，蒋介石把他捧得上了天。今天，蒋介石穷凶极恶的狰狞面孔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还不赶快从中吸取教训寻求更生的道路，

还待何时？”这番话极富鼓动性，当场就有许多人报名愿去延安。参加聚会的有一个东北讲武堂七期毕业生，名叫张碧天，这时做康泽的秘书，他是受命来调查黄将军的特务，回去把黄的言论活动就加油添醋地作了汇报。

黄将军在武汉已经接触了许多东北青年和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并也做过多次争取的活动，风声外露，关心他安全的朋友，劝他早些离开武汉回北方去。他也有这种想法，已决定先去香港再转北方。他和张学思同住在汉口太平洋饭店，在他被捕的前一天张学思因事先走一步，这是特务们所未料及者。张学思之未遭囚禁真可称之为幸运已极。

在一个晚上，特务机关派出一组特务逮捕黄将军。一名特务化装成朱德总司令派来的使者，拿着一封假造的朱总司令的信件（一说贺龙信件）敲黄将军的门，进去后与黄周旋一会，当黄发觉有异时已经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这些话以后成了审讯黄的证据。

黄将军初被囚在特务机关牢里边的一间隔离室，意在防止走漏消息。过了些天，牢里的人愈来愈多，不得已，才把一名俄籍犹太商人关在黄的囚屋里。特务机关知此犹太人不懂中国话，但却不知黄将军粗通俄语。因此，黄和这位外国人得以乘隙互道彼此被囚的经过。

特务机关把黄将军逮捕后，企图在他身上多找些材料，对他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审讯。第一次审讯时，黄将军非常气愤，严词指责他们不该随便私下捕人，不按照法律手续办事，并义正词严地申明他营救张汉卿先生的道义性，这并不能构成罪状。至于热衷于抗日而积极为抗日第一线动员人力，值此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也算不得什么犯罪。没有犯罪，为何堂堂政府在此光天化

日下，竟偷偷摸摸把一个无罪之人逮捕囚禁起来?!

特务们对初抓来的政治犯惯用软化的方法，企图套出些什么材料来。故对黄将军的气愤谈话并未回击，说只要黄把共产党怎样利用东北军和他怎样受延安委托的说出来，即予恢复自由。并利诱说，假如他真的洗心革面彻底作了交代，不仅自由没有问题，还会有军长的职位在等着他。黄将军当然都一概拒绝答复。

第二次审讯，情况与前一次大不相同。特务们早已准备好了稿子，一开始就象念起诉书似的朗读一通，给黄将军安的罪名是“私通延安，给共产党做兵运活动”。证据有二：一是张碧天的笔记本，内载黄将军那天聚会中的谈话内容；一是逮捕那天特务假冒朱总司令派来的人从黄将军那里套去的话。特务机关认为黄将军以营救张学良为借口，给共产党作兵运工作。并把他的罪名说得比共产党自身所做所为还要厉害，威胁他说：如果不老老实实交代，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黄将军到了此时，才恍然他组织的聚会上竟有出卖他的特务分子参加，而其人就是张碧天。那么逮捕他的起因也就是那段极端愤怒和倾向革命的谈话了。因此，他不再辩护什么，只声称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员，是他看到共产党真心实意抗日而和他本人仇恨日寇的心情起了共鸣。他认为动员真心实意抗日的人们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抗日前方去，是他对国家对民族的义务，也是他身为国家中将的天职。至于党派之争，他从来是不过问的。他并强调指出，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下，任何积极起来打击日寇的人，都是无罪的。

审讯他的特务害怕黄将军这样讲演般的答辩，斥责说：“照这样固执下去，你是不想活着出牢了。”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审讯。

每次审讯回来后，和他同住一室的外国人都很关心地问他审讯情况的好坏。黄把他的遭遇详细告诉了。这位外国人深为感动，说："假如我能先你而出牢的话，必把你的不幸遭遇转告你的朋友们，设法营救你出牢。"

过了些天，传讯这位外国人。根据审讯的情况，黄将军判断这位难友即将恢复自由。于是黄请他带信给汉口的旧同仁，要他们向特务机关指名要他；并告诉他的朋友，他是被特务机关偷偷逮捕的，逮捕的原因是由于张碧天告密。如果特务机关不承认有这回事，可说是张碧天转告的，特务机关就无词推脱了。

几天后，这位外国人真的获得释放，也真的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出牢后，首先转达了黄将军的委托。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特务机关每当放人的时候，必警告说："不许把牢中的情况向外边人乱讲，否则，随时都可再抓回去。谁若唱了二进宫，再想出去就不那样简单了。"可是这位外国人仍然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去营救难友，黄将军虽没有因此而脱灾，但却因此把那位害人的张碧天抓来同住此暗无天日的监牢，亦可略解心中之忿。

当黄将军的同仁联名向戴笠指名要他的时候，戴笠果然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他还虚伪的答应帮助侦查黄将军的下落。后来他们又指出张碧天作见证，戴仍不承认，但不似先前那样说谎了，答应回去查查。结果，他把张碧天也逮捕起来，罪名是泄漏机密。这个出卖同乡假充好人的张碧天终于自食其果，害人反害了自己。

自张碧天被捕以后，戴笠坚决否认特务机关扣留了黄显声。人们对之亦无可奈何，原因是当时人们对特务机关都存有几分惧意，那几个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又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自此之

后，黄将军恢复自由的希望和他的抗日志愿的实现，都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愈来愈渺茫矣。

在 息 烽

武汉沦陷之前，特务机关先把这批政治犯转移到湖南益阳，不久，又迁往贵州的息烽。此地有一个特务机关的监狱，范围很大，囚禁的人数亦多，凡长期不得释放的人都关在这里。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也分别关在这个地方，他俩各有一个小范围和别的犯人不相接触。黄将军被囚在息烽的大牢内。初期所受的折磨，使他无论在精神方面或身体方面都有不支之势。后来这里的牢头换了周养浩，他看中黄将军的经济之才，把黄由犯人中提拔出来帮助他搞生产，还委黄以生产组组长的名义，和在息烽服务的自由人没有什么两样。

黄将军为了争取释放和在牢里边得到小范围的自由，并也为了难友们生活好一点，确真开动了脑筋，大展经济之才，把息烽监牢变成了生产基地。不仅这座大规模的监牢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每年上缴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抗战时期国民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黄将军虽系军人出身，知识却十分丰富，息烽附近许多产煤的地方是他发现的。组织烧炭队到山里烧炭；在牢里边开办了各种工厂，生产当时市场急需的物品，这些筹划多出之黄将军的建议。周养浩见他每次谋划都很有效，益见信用，应许帮助他向戴笠说情，以求早日恢复自由。黄将军信以为真，绞尽脑汁搞生产，使周由一个光身变成大腹贾了。周养浩为了表示感谢黄将军的劳绩，除了空头诺言之外，在物质方面也将黄将军的衣食住条件大大改善了一番。为了表示对黄的信任，还把手枪

发给他，并时常派他到牢外边办事，贵阳是他常去的地方。

某次，黄将军遇其旧部刘某于贵阳市，刘某是跑汽车生意的，劝他随车逃走。黄将军觉得周养浩对他很好，能帮助他合法地获得自由，无须落个开小差的罪名，万一再度落网那就不堪设想了。刘某提醒他说："干特务的人有什么道义可言，除了相互利用外，其它在他们看来都是用来骗人的东西。即令周养浩真对你好，但释放一事，他也没有权利。依我之见还是一走了之。"黄将军仍存幻想，没有听从其旧部刘某的劝告，仍然回到了息烽。

息烽牢的生产情况，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搞获利越厚，黄将军的信誉也越高，周养浩待他也越客气。此时不仅张碧天之流的犯人看到眼红，牢头以下的那些工作人员（自由人）也觉得很不开心，都在周养浩面前说黄的坏话。但周一直不曾改对黄的态度，仍令他充任生产组长。这也是黄将军没有逃跑的因素之一。黄将军做事魄力很大，执行一种任务总是斩钢折铁完成得非常干脆。周养浩手下那群饭桶特务中当然没有象他这样能力强而有生产经验的人物，而当时的犯人中也没有谁能代替他充任这样大规模的生产组长。因此，尽管妒恨他的人很多，迄未动摇他的职务。

由于黄将军在周处得到信任，关在牢里的红帽子、粉红色帽子的政治犯也因而得到许多方便。共产党员车耀先、罗世文、韩子栋，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刘丕光（李杜的办事处长，与抗联有关，以通共产党的嫌疑被戴笠所囚）、宋绮云（杨虎城的秘书）、黄彤光（女学生）等陆续被周养浩调到生产办公室和图书馆做一些事务工作。凡调出来做这些工作的犯人，活动的范围就大些，

饮食也较好些。这在牢里的犯人看来是件了不起的幸运，难怪张碧天之流看到眼红了。

黄彤光小姐调到生产组搞会计工作，是当时黄组长的部下。他们由于思想上的共鸣，都对国民党极端不满，又都遭同一命运（坐牢），经常在一起搞生产工作，真个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而彼此间产生了爱情，终成为牢狱鸳鸯。黄彤光小姐先获自由，在外面一直为黄将军的自由而奔走，并且也一直在等待着他获释。

刘丕光毕业于北师大，长于文学，宋绮云是北大毕业生，长时期做秘书工作，此二人常给周代笔，甚为周所倚重。车耀先、罗世文、韩子栋是著名的共产党员，都被调出来工作，这样一来，想要干这样工作而没有干上的张碧天之流都纷纷议论起来，说什么周养浩被红帽子包围了，生产组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温床了。当然攻击最厉害的人是张碧天。他本是个在鸡蛋里尚找骨头的人，这回有机可乘，焉能不拼命造谣，俾便就此把黄将军拉下来和他一同受罪呢。

之后，军统局为了此事真的派人来息烽牢调查。但周养浩终以生产搞得好，不仅完成了局里给他的自给自足的任务，且能上缴许多财富，再加上他私给来调查的人许多好处，那末他说啥也就都显得有理。局里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没有更动黄将军的生产组长的职务。

反对把红帽子调出使用的人，不仅没有得着周养浩的理睬，反而惹得他十分不满。有一次，值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牢里出了一期墙报。要求能写文章的犯人都写一份。里面有黄显声、刘丕光、宋绮云、黄彤光、罗世文和车耀先等人的文章。张碧天看了

之后大惊小怪地向周养浩打小报告说："这一期的墙报简直象苏联的《真理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说话，这些红帽子企图把监牢赤化了。"并威胁周养浩说："如不赶快查办，让局里知道，你也跑不了。"这回可真的把周养浩吓了一身冷汗，马上把墙报上的文章都摘了下来，并把写文章的人也都找来，咆哮大骂不该在墙报上宣传共产主义。这些人觉得很奇怪，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周养浩犯了什么病。过了一会，有人问道："谁宣传共产主义了呢？请主任指出名来，不可能全体写文章的人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吧？"周养浩被这一问倒愕然起来，一时说不出哪一篇宣传了共产主义，因令大家先回去，等他查查再说。

周养浩从这些文章中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只好找送小报告的张碧天代他查看。张碧天遂说黄显声、宋绮云、刘丕光等人的文章简直是共产党啦啦队的腔调，文章的含蓄恶毒比共产党自己写的东西尤甚。周把黄、刘、宋三人找来，责问他们：为何写这样的文章自找苦吃。他们一致表示文章无毛病，拿到任何地方对证，都敢说里面没有什么不当的言论，而且还告诉周说："文章的内容几乎全部是引用《中山全书》里面的词句"。周养浩听过之后十分气愤，马上连想起张碧天多次捣鬼，一再攻击他调用黄显声的事，这回可有题目整整张碧天了。

周养浩令黄显声、刘丕光、宋绮云把个人写的文章都逐段找好根据，同时令张碧天把小报告的根据也准备好。从牢里找出几位学过法律的犯人充法官，又找出一部分犯人充旁听，组织了一个临时"法庭"。

张碧天到了庭上胡说一通，根本没有什么依据，他所控告别人使用的某些词句，恰都是《中山全书》上的词句。黄显声、刘丕

光、宋绮云抱着许多参考书，一一指出文章里用的词句全有根据，不是出自《总裁言论集》，就是出自《中山全书》，弄得张碧天张口结舌。旁听席上的人没有一个不痛恨一惯害人的张碧天，此时不约而同地嗤之以鼻。庭上早已准备好处罚，当场宣布："张碧天无理取闹，诬词陷害他人，以泄私愤，屡次违犯牢规，着即重责二十大棍，并罚住重禁闭室一个月"。这位众人痛恨屡遭体罚的张碧天，真是天生的贱骨头，不管牢头怎样不喜欢他的小报告，却一直不改他的作风，始终同黄将军作对，象魔鬼一般的纠缠着他。这个妄想以害人起家的坏蛋，终未因"忠心"而逃脱厄运，反而变成了"烈鬼"。

黄将军未调出来充生产组组长前，所遭受的侮辱和折磨非言可喻。其所以还能活着是因他的心灵中还存在很大的希望。他曾经向许多难友说过："抗战必胜，胜利后必有大赦。彼时我可以和张汉卿先生一同恢复自由。在张先生得势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共过幸福，在张先生失势的时候，能够分担一点他的愁苦，我认为这是我一生无上的光荣。"黄将军居常以孤臣孽子自况，以故对任何横逆之来，他都处之泰然。他很赞扬文天祥，并经常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他本来有许多机会可以逃掉，此种思想也是支配他没有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牢里的难友一批一批地获释，而他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重获自由。据他自己说：当时心情之坏较之胜利前尤甚。烦燥和不安的情绪使他连续失眠，满头乌发全部变成白色。

渣滓洞

抗战胜利后，牢里释放了几批案情较轻的犯人，再加上四六年二月间特务头子戴笠随机焚毙，特务机关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牢里的犯人大为减少，因把息烽剩下的犯人转囚到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里边的渣滓洞、白公馆和杨家山等三处著名囚禁政治犯的地方。

从一九四三年到四七年，我被囚禁在这个地方，对渣滓洞、白公馆很熟习。

渣滓洞有男牢一幢，女牢一幢。男女牢合计能囚二百至三百人左右。但有时亦拥挤到五百人以上。这里关押的犯人大多数是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一小部分是争取民主权利的学生和触犯恶势力的商人及农民，也有些因言语不慎被捕的进步人士，还有国民党军队里边不满现状的少壮派军人，但这里边也有极少数是特务假装犯人，监视和考查其他人的。

白公馆较渣滓洞要小得多，原来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被特务机关用为监牢后，在这所别墅的四周用高大的围墙紧紧的围住。屋后三面紧接岩壁，有一深涧自屋下流过，流水声终日呜咽不息。在右边的院墙上另开了一道小门，要搭一架狭窄的楼梯才能爬得进去。小门外面修有两排平房是特务看守人员的办公、睡觉、审讯、行刑的地方。小门内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共有二十余间牢房及三间阴湿的地牢，被囚禁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百余人。

一九四六年秋我被囚禁在渣滓洞。听说黄显声将军已由息烽解到重庆，并也听说周养浩签请释放他，暂时住在渣滓洞外边听候

指令。据说黄将军和周养浩处得很好。这回周真的给他卖劲活动，出牢的希望很大。我和黄本不相识，只是闻名，但听到这项消息感到高兴，因为我平素对他的为人行事有所知。我在沈阳读中学的时候，黄将军任辽宁省警务处长，曾不避权贵和恶势力斗争，汤玉麟由热河运到辽宁的鸦片烟全部扣留。为此事汤玉麟几乎和张学良闹翻，也没有把鸦片烟弄回。“九一八”后，黄将军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卖国主义，而积极站到抗日的一方面，他以警察部队为基干，组织义勇军转战于辽西一带；长城战役坚守古北口。之后，黄所部编为骑二师，他任师长，我的许多同学都在他的部队里充当排连长，他们对黄将军的爱国热忱和蓬勃进步的思想都深表钦佩。我由关邦杰同学（在骑二师充连长）的信中得知黄将军敢做敢为，魄力非常大。骑二师驻怀来时，他创办的教导队由刘澜波任队长，还请共产党员任教官，别处不敢教的政治课可以讲，别处不许唱的进步歌曲可以唱。他的主张是：要想抗日必须先实现国内大联合，一致对外才有胜利的可能。其次，他看到黄将军里外如一的坚贞操守，不计个人得失而信守诺言和志愿，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的美德。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参加剿共，他不执行此项命令而留居京津。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创办军官训练团，目的是为了唤起东北军的抗日觉悟，令黄将军继王以哲为教育长。总之，黄将军的声名在东北军的青年军人当中，确有很高的威信。

这次，黄将军有释放的希望，我当然为他庆幸。孰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对黄将军以往的作为深为怀恨，并且对他的出牢也真有点恐惧。以故，签呈到蒋介石前就没有下文了。周养浩只得把黄将军移交给渣滓洞的看守所长张少云。

一天下午，我在院子里散步，听到有些先由息烽解来渣滓洞的犯人正在谋划要打黄显声。我从侧面一问，原来是张碧天鼓动那些原在息烽被周养浩处罚过的人迁恶于黄，说黄显声是周养浩的私人参谋长，对周无法报复，拿黄出出气也是好的。

我马上把这事转告看守员王发桂，请他制止。王发桂当即把手枪握在手中站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上观察动静。此时正是放风的时间，黄将军就是这个时候被送到渣滓洞来的。他一进内院，这些闹事的人立刻包围了他，正喊着“打打”的当儿，王发桂立即朝天放了几枪，并喝令所有在院子里散步的犯人通通回到牢房里去，接着把牢门都锁了。所长张少云令看守员们彻底追查为首的人是谁，查来查去又把张碧天弄了出来，关在重禁闭室以警效尤。

黄将军受了一场虚惊，幸未遭辱。牢头把他关在一般牢房内，没有给予优待。同是坐牢的犯人，差别却很大。大体分有住优待间者，有住一般间者。优待间昼夜不锁门，大小便随时可到厕所去，房间也比较宽敞些（住人较少）。一般间除放风时开门外，其它时间全都锁着，住的人数比较多，且无定额限制，白天小便在屋内，大便许可去厕所，夜间大小便一律在屋内。不论天气怎样热，气味怎样难闻，也得屋吃屋拉。一般间还分二等，楼下的房间较好，夏凉冬暖，楼上的房间则相反。以故，新进来的犯人都照例关在楼上。优待间的犯人也有等级，有些人可以到外院逛逛（活动范围大些），有些人不可以到外院去，有些人伙食受优待（吃小灶），有些人伙食和一般犯人的伙食一样。在牢里边即令一点点自由都是好的。凡得到优待的犯人，常为别的犯人羡慕和妒嫉。黄将军在息烽时就是受着特殊优待的犯人，其所以

深遭他的对头张碧天妒嫉者以比。

黄将军在息烽牢中是老资格，解到渣滓洞则是初到，按规章要关在一般间内。在这种间内如果关一个时期，不死也得脱几层皮。以黄将军已年过半百之人，且在牢中已住了将近十年的健康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

为了把黄将军调到优待间，我们同案的六名同学（胡翔、陈蕴山、傅岳、曾泽蘅、梅含章、王凤起）煞费苦心，花了很多钱求看守员向所长张少云提出建议把黄显声调到优待间。理由是黄显声年岁太大，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身体已经很弱；且闻彼在息烽时很守牢规，深得周主任（周养浩）的信任，用为生产组长，为国家创造许多财富，今天解到渣滓洞似应仍给予优待。我们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案情不同于红帽子，虽被特务机关称为 TNT（以炸药喻危险分子），但终归是国民党自家的事。特务机关对我们六人从囚禁那天开始即有令优待，饮食住都比别种犯人要好一些。凭藉这种关系和送给看守员的钱经过了一天多的酝酿，牢头张少云同意把黄显声调到优待间。

在这之前，我们六人除我对黄知道一些外，其他五人与黄将军素无渊源，只是因我的介绍才知有黄显声其人，但都热心为黄帮忙，原因是大家都觉得他舍身为张学良奔走的精神诚有足多者（黄将军的案情是由息烽先解来渣滓洞的难友刘丕光告诉我们的），同时也觉得同是军人，又都是被难的人，谁能够给谁帮点忙，从内心里感到是一种无上的愉快。

黄将军搬到优待间后，初以为是周养浩的关照，他未遭殴打也以为是牢方干保及时，并不知暗中有我们的帮助。黄到优待室的第二天我们六人做了几样菜和饺子请他到我们的囚室（优待

间有二，我们六人单住一间，可以随便买东西自己做，牢方每餐照旧送菜饭来）吃晚饭。当把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和经历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并把我们敬慕他的情况也说了一些。闲谈间，他才恍然没有遭殴和受优待的原因不在周养浩，而是意外逢着我们的暗中维护。

在这之前，我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今天仔细观察一遍，看到黄将军的头发全部变成银白色，和其年岁比起来显然是不相称的。面色十分憔悴，眉宇间呈现无限烦恼的样子，但体魄和气度仍令人望而敬之。

在牢里如果找到一个消磨光阴的题目，常被大家看作是很有兴趣的事。由于黄将军新来，我们六人连日把如何以陆军大学同学为骨干（我们六人同是陆大十七期同学）组织青年将校团，企图用军事政变推翻蒋介石独裁政府，事泄被捕的经过情形，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又把个人被捕审讯的经过也作了介绍。黄将军接着把他被捕和坐牢的经过也告诉了我们，虽是一点细微的地方都说得很详细；如果谁说得偷工减料时，其余的人还要追根到底的。凡在大牢住优待间时间较长的犯人多是案情已定、不再进行审讯者，所以牢头和看守员对于大家在一齐讲什么，吃什么，基本上是不过问的。

黄将军常说：无意中在渣滓洞遇着我们，是他这些年中少有的愉快时间，他除了睡觉之外，天天和我们六人在一起看书报、散步、玩扑克、象棋、围棋、麻将等，打发岁月。

由于多方对看守人员活动，外面的朋友得以源源向牢里送钱送东西给我们。这些小特务对自己的生活同样不满，同样受着监视，稍有差错，就有丧生的可能，他们又都是“终身职业”，不许不干。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一个字“钱”，俗云：“有钱能使鬼

推磨”，何况小特务？时间一久，这群看管我们的小特务分别被钱“征服”，成为我们和外边朋友们的联络人。黄将军善于用钱，给小特务钱，够称挥金如土。目的只有一个，争取他们为他服务。他常和我们说：“钱算不了什么，只要它能为我们服务，花多少都是值得的。”

由于看守人员连得黄将军的好处（钱），黄到渣滓洞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又迁到教诲师（牢里软化犯人工作的负责者）的房间。这是自由人住的房间，里边设备比优待间还要好得多，和自由人来比，只差不能到外边逛逛了。

一九四六年秋，军统局的人拿着两张飞机票，谎言起解罗世文和车耀先去南京结案，并扬言即将释放他们，大家都很庆幸车、罗即将获得自由。而黄显声则不以为然，他说这是消灭而非起解。我们六人初未置信，认为是黄多疑。过了几天，看守员王发桂暗中告诉了车、罗被害的情况（枪毙后用汽油焚尸灭迹）。我们因问黄何以判断这样正确。他说：“论坐牢我是老资格，特务们的一切鬼把戏，我领略得多了。岂有起解犯人还令犯人知道的事？特务机关起解犯人一惯用突如其来的办法，临时通知即刻就走。此次，故意让别人知道，而且容许车、罗和别人辞行，表面上给别人以车、罗的官司已结束的感觉。车、罗临行时曾小声向我说：‘永别矣，来世再见！’说明他俩也早看透了特务的诡计。另外还有一显著的情况，更可以说明特务是在掩耳盗铃。车、罗二位是周恩来于政协开会前点名要求蒋介石释放的人物。彼时，蒋介石尚且不放，岂能在撕毁停战协定大打特打的时候释放他们？通过这些事实故敢肯定不是释放而是消灭。”

车耀先、罗世文和黄显声在息烽时处得很好，他们彼此间经

常相互关照和帮助。车、罗被难后，黄长时期陷于沉默中，并不是怕自己上断头台，而是对车、罗二烈士的哀悼和对特务们的憎恨。

白 公 馆

一九四六年冬，渣滓洞囚禁的犯人越来越多，特务机关把案情较重的犯人全部迁到白公馆。黄显声、刘丕光、宋绮云夫妇、韩子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和我们六人，还有一些不知道姓名的犯人，以及与黄显声同案的张碧天一同迁到白公馆。

我们六人仍关在一个单间内，黄仍和教诲师同住，刘丕光、宋绮云、韩子栋和李英毅关在另一个优待间（夜间锁门，白天完全开放），次于我们六人的优待间（昼夜皆不上锁）。

一九四七年春，外边的朋友代我们六人活动出牢的问题，得到陈诚的默许和帮忙。陈诚准备向蒋介石建议把青年将校团一案提交军法机关公开审讯。实际上，这样的建议就等于要求释放我们，因为特务机关无法把青年将校团一案向外移交。个中情况陈诚、特务机关和我们六人都明白，因此我们出牢的希望也更大了。继之而来的也就要考虑出牢后干什么的问题了。继续组织青年将校举行军事政变已经行不通了；再在旧军队干下去，眼看是死路一条；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去，又由于听了许多歪曲宣传不敢贸然行事；但第三条道路又没有，真是感到徬徨。最后，大家一致想，为了活着还得在旧军队鬼混下去，“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别的，就不管那么许多了。

黄将军经常和我们六人在一起，对我们的思想情况十分了解，认为“鬼混”不是长远的办法，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一

部二十四史，离开报复则无历史。一个人不能给侮辱自己者以痛痛快快的打击，非丈夫也。”又说：“我也是旧军人，在旧军队里，吃尽穿绝，腐化已极，与革命是极不相适应的。但共产党人认为这些毛病是旧社会带来的，不能记在每个人的帐上。只要个人肯抛下屠刀站到革命的一边，便可立地成佛。共产党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决不放弃对任何人的改造机会。初期，我和共产党人相处也是有距离的，及相处越久时，则越感到舒畅和温暖，也真正领略到人和非人的区别。说真的，象我这样的人，的确不配谈什么革命，可是共产党同志始终不放弃对我的鼓励，使我渐渐地有了些微认识。而你们比我纯洁得多，知道的东西也比我多，且在打倒蒋介石的问题上和共产党还有共同的地方。如果你们出牢后到解放区去，或将来在战场举行武装起义，则共产党欢迎之不暇，岂有加害之理。至于那些歪曲的宣传，目的在蒙蔽真理，混淆是非，欺骗那些跟着蒋介石跑的人别为共产党拉过去。你们都念念不忘想要‘报复’，依我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最简捷而又干脆的道路。”

胡翔听了这一段话后，似有所感，因而问道：“您估计共产党能够很快把国民党彻底打垮吗？”黄将军十分自信地说：“共产党一定会很快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事实，无论人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得硬着头皮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低能，注定了它将要垮台，这是大家共同的感觉。继国民党主持中国政柄的不可能是青年党和民主同盟，因为他们没有武力也没有群众，所以即令从实力地位出发也得由共产党取而代之。何况共产党有最科学的共产主义，一举一动又都应乎天而顺乎人。人奴役人的时代过去了，这是历史前进的规律，再反动的人

也不可能把历史前进的车轮挡住使之不前。希特勒固一世之雄也，不是也在此巨浪之前被冲得粉碎吗？从前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目前军队的数量和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并且国民党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又占有广大的地盘和许多大的据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了不起，这群家伙敢发动内战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可惜他们没有好好把孟子所说的那几句话研究研究。天时地利即使为其所有，而把人心失尽，又将如何?! 而共产党不仅有广大人民热烈拥护，连象我这样国民党身份的人尚同情她，国民党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唯一苟延残喘的机会是组织联合政府，但蒋介石不此之图，利令智昏，硬要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岂非天夺其魄，使之加速完结吗？师团数量多、地盘广大和把持中央政府，在战争中能够起着一时的作用，但非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我们在大战学理中得知，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人心的向背。孙子兵法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出师无名，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也不能取胜。以拿破仑之雄，为了要娶俄皇亚力山大的妹子作老婆，遭拒绝后竟恼羞成怒，兴师四十万远征俄国，结果一败涂地，最后被囚于爱尔巴岛。蒋介石今天只为了个人的独裁发动内战，正是继八年抗战之后，民穷财尽之时。人民需要的是安定和喘息，而他偏偏给人民带来灾难和内战，岂非蠢驴而何？我觉得即令共产党不愿加入现政府，蒋介石也应委曲求全把共产党请进来以解民困。因为共产党从前在江西一隅，兵力极微时，蒋介石调动全国兵力和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尚未能把共产党消灭。现在共产党已拥有一百余万的兵力，且深得人心。以日寇那样凶狠尚无可奈何她，瘦驴拉硬屎的蒋介石又能把共产党怎么样？此不

待智者而知。依我看蒋介石想要重温江西剿共的美梦都不可能了。这回该是他上断头台的时候了，而且为期决不会远。顶多不能超过五年，共产党将是中国的执政者，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就将到来。”

听完了黄将军这一大篇高论，我们六人对于他的见解和知识之丰富感到十分惊佩。原来我们总认为他是个老东北军出身的高级将领，是个老粗，谈不出什么道道来。黄将军走后，我们六人私下议论，觉得黄的才具即在国民党嫡系将领中，亦不多见。对于他的高论，我们一致认为合乎逻辑，不过也觉得他过于夸张了。有的同学说，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推断共产党很快就把国民党政权夺过来，这样的论断未免有些危言耸动。

自此次讨论时事问题之后，大家不再夜以继日地打麻将，玩扑克、下棋消磨时间，常讨论一些军事政治和当前的时事问题。黄将军特别健谈，也非常有兴致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学习十分关心，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有关解放区和共产党的事。他的新知识很丰富，尤其对苏联问题知道得更多。在这之前，我们喜欢看些经史子集的老书，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特别感到兴趣。实际上，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牢狱里的小型图书室除了经、史、子、集外，就是《总裁言论集》、《中国之命运》和低级的武侠和色情小说等，还有两份《中央日报》和《新华时报》。这也是使我们不得不看那些史书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无聊的书籍使我们太厌倦了。经过黄将军的热心帮助和诱导，大家对进步的书籍渐渐产生了爱好。但在牢里找到一本进步书籍，的确是件不简单的事。可是黄将军真是神通广大，竟通过看守长

罗欢德弄到几本毛主席的著作，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一本《唯物辩证法》。黄将军偷偷送到我们的房间，并一再嘱咐我们看的时候别让看守员或其他犯人看到。他这种关心别人进步的心情，在旧社会中确是一种超常的举动，当时我们六人十分感动。象他那样大的年纪，还有这样高的学习兴趣和要求进步的迫切意愿，这对于我们向往革命和认识真理，确起着很大鼓舞和推动作用。

一九四六年春，朋友由南京方面传来消息说，陈诚已正式建议蒋介石把青年将校团一案移交军法机关进行公开审讯。我们听到后十分高兴，知道特务机关无法公开本案，因为我们的活动多涉及陈诚，若要公开审讯就得陈诚出场；而此时戴笠已死，特务机关无敢与陈诚抗衡者；因此，判断特务机关一定会代我们美言饰说，上报蒋介石一放了之。在这一段时间内，黄将军几乎天天和我们在一起，鼓励我们走革命的道路，别再醉生梦死跟蒋介石鬼混了。俗云："至诚可以感天。"他那种为朋友进忠告，为革命负责的精神，确使人感动，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出牢后不参加革命而跟着蒋介石鬼混，连黄将军都对不起。

我记得有一次，黄将军又在讲革命道理和痛骂蒋介石时，我们和他开玩笑说："黄先生，共产党给您多少宣传费？您这样替她卖劲。很多共产党员也不象您这样积极，而您却拿讲共产党好当作了营生，怪不得蒋介石不放您出去。"他笑着说："共产党员对你们不太了解，因为你们是少壮派，比起腐朽的蒋介石来更为厉害。尽管你们思想上已有变化，可是心里的事，外人又怎能知道？因此，他们不便向你们说什么。而我对你们十分清楚，知你们绝对不会出卖谁。同时，也凭借我们共患难的友情，如果我知

道了真正光明的道路还不介绍给朋友，那还够称什么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是青年将校，军事学术造诣很高，有了出牢的机会，应当好好地再干一番，不能就此颓靡下去，与彼腐朽者同流合污。不讳言，你们从前的所作所为和我一样，多是反人民的事，别说无所成就，即令有所成就，也卑不足道，甚或留骂名于千载。真正的事业应当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才是永恒的。我在坐牢前，虽也知道一些革命的道理，但只是皮毛，当然现在还是皮毛，不过比从前较有认识。我的这一点认识，有赖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等的指导。在息烽时，我们常在一起，经过他们的热心帮助，才逐渐开点窍。人家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从不动摇，就是因为对真理有了认识，古云：‘朝闻道夕死可也’，就之形容共产党朋友们就义时的精神，再恰当也没有了。我坐了将近十年的牢，真正看到人能站在人的本位上去死，确不是简单的事。这么多的优秀而又聪明的人物，他们非不爱生而恶死，为什么能很泰然地从容就义呢？我曾反复想过，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对真理有足够的认识。不用说别的因素，就凭着共产党的这种精神，也必然能战胜国民党。因为这是科学，这是合理代替不合理，正义代替非正义。你们可能又在说我是在替共产党宣传了。朋友们，即令开玩笑也不应该这样说，这不是宣传而是讲实实在在的情况。我虽非预言家，亦非研究史学者，但对未来的中国形势发展，我深深的服膺共产党朋友们的判断。记住我的话吧，出牢后别走老路了，那是死路一条，即令企图苟延残喘，也没有几天了。”我们随便开开玩笑，黄将军便又发表了一通伟论，大家不约而同的再次为其真诚所感动。从这回开玩笑后，我们六人改称他为黄老师，也真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再考虑如何在

蒋军中混下去的问题，而换上一个新的课题，讨论出牢后如何拆蒋介石的台了。

我和傅岳主张直接去解放区，陈蕴山、曾泽蘅、梅含章、胡翔主张争取带兵，将来在战场上举行武装起义（因他们四人家都在大江以南，对北方生活有顾虑）。对于我们的初步想法，黄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从看到他那天起直到现在，他才显现出十分畅快的心情，眉宇间呈现出与往常不同的欣悦之色，连看守长罗欢德也凑趣说："黄先生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这是出牢的预兆。"

黄先生喜欢面食，尤其对面条更为爱好，有面食向不吃别的。我们六人每次做面食，他总是座上客，一次都没有空过。这回，由于他心情畅快，黄先生特地要求罗欢德派人从磁器口大餐馆买来几样著名的南菜和好酒，请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一餐，庆祝我们六人的更生。大家看到他这样兴奋和愉快，也都激动起来，于是又把刘丕光、宋绮云找来一起痛饮。饭后大家又在一起玩扑克，下象棋围棋，一直闹到夜里二、三点钟才睡觉。

由渣滓洞迁到白公馆后的这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六人和黄先生把看守长罗欢德搞通了，牢里的小天地的确较前是开阔得多，非但外边的报章杂志可以看到，里外可以互通信件，外边的亲戚朋友也可以来牢里看我们，而更令我们方便的是可以到磁器口街上逛逛。罗欢德对我们很放心，他知道我们六人案情已定，出牢有望，且戴笠已死，特务机关已不想再在我们身上打什么坏主意了，因之对我们的看守也大为放松。可是对黄先生罗欢德也那样放心，我们不知他究竟是根据什么。

在我们六人出牢的前一个多月（大约是四七年二月间），罗欢德邀我们六人和黄先生到他家玩玩。我私下建议黄先生溜之大

吉，他不肯，说："我如开小差，马上会影响你们小范围的自由，罗欢德也要受严重的处罚。后果是牢里的难友们今后再想争取小特务给难友们行点方便就不那样容易了。况且我这样大的年纪是否能开得成小差还成问题。"黄先生的为人，从其过去的行事上看来，好象是一位狂放不羁不拘小节者，及在一起相处后，原来是一位非常重然诺讲义气，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譬如散步，如步调不一致时，他总是马上换过来；牢里有什么禁令，他都严格遵守；难友们有困难和闹病时，他总是竭力帮助。除了少数坏蛋外，大家都喜欢接近他，觉得能在他的身上得到温暖，而温暖又是牢中难友们所渴望者。他对张碧天之流专以出卖朋友为生的人，则深恶痛绝，其憎恶的心情又非常激烈。他的爱憎非常分明，每逢提到蒋介石总是咬牙切齿骂不绝口，提到进步人士或反对蒋介石者均予以赞扬。

一九四七年三月末的一个下午，释放我们六人的命令到达白公馆。黄先生听到后十分高兴，但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出牢后，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黄先生的脸色很苍白，以极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装作含笑的样子，实际上比哭还要难过。

我们六人被囚禁三年有半，置备许多生活用品；在出牢的当儿，除了个人随身穿着的衣服外，其余的一切衣物都分给难友了。释放命令中还说要发给我们六人去南京的旅费，这部分钱我们也一致同意交由黄先生酌情分给难友。因为在牢里得到点钱是很不容易的。

一般说，牢里放人都在上午，这次命令一到就发表了，可称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心情迫切，早出去一分也是好的，可真是"闻命当即就遵，毫不迟疑"。黄先生送我们到牢狱的大门，还在

暗示着说："祝你们更生，前途无量！"我们此时很有感触，连黄先生的脸也没敢看，只摆摆手说："放心吧！黄先生，希您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我们出牢后，重庆方面的同学连日为我们获得自由举宴祝贺，一周后才安闲些。梅含章、曾泽蘅预备先去南京国防部报到。我们六人买了许多广柑、肉类罐头、奶粉和糖果等食品，由傅岳开一部四分之三的小卡车到白公馆看黄先生、宋绮云和刘丕光。牢头丁义质对我们还很客气，车子一到白公馆就让我们进去了。丁把我们让到他个人的会客室，在这里我们看到黄、宋、刘，丁义质和罗欢德也陪在这里闲聊，当然，实际上是监视。我们只把这些天在外边受到朋友们的欢迎情况讲讲，别的什么也没说。临出来的时候把车上的食品搬下来送给他们三人。丁义质还开玩笑似地说："这些东西如果给一个人吃，够吃几个月了。"

梅含章和曾泽蘅飞南京后一个多月，傅岳、胡翔，陈蕴山和我又到磁器口罗欢德家，通过罗又把黄先生找了出来，在罗欢德家玩了一天一夜，黄先生的爱人黄彤光小姐也在这里。此次玩的可真痛快极了，大家都是无拘无束的。在这中间我曾问过黄先生（值罗欢德不在）："谁能代您在瘪三（难友们给蒋介石送的绰号）面前说话而且比较有效，我到南京后一定代你跑跑门路，说不定能由此而得到自由。"他说："中央嫡系，我谁也没有搞好，东北军系统的人又都是老瘪三的眼中钉，只有莫柳老还算个社会贤达，他如肯说话，老瘪三可能给他点面子。不过他一向小手小脚，是否肯代我说话，还是问题，我之没有求他者亦在此。"我说："这就不去管他，开口三分利，不给也够本。我也想到莫柳老了，您不提出，我也准备到南京后求他代您说话。我问您的意

思是想知道您是否还和别的人有过过从？何应钦在北平军分会时不是曾指挥过您吗，您和他相处的感情怎样？如他能代您说话就更有效力些。”他笑着说：“不找何应钦犹可，找到何恐怕更糟。在北平军分会时，宪兵第三团把我的秘书刘澜波逮捕了去。我给何应钦下了最后通牒，如不把刘澜波立即释放出来，我将令骑二师把刘抢出来。何不得已才命令宪三团团长蒋孝先立即释放刘澜波。从那时起，中央嫡系部队都认为骑二师掩护共产党。但因华北的情况特殊，东北军还占优势，中央军只好得过且过，莫奈何我。现在我已成阶下囚，落在他们的手里，岂能再去求他?! 我原来想望的大赦，随内战之大打，已成泡影。今后，我出牢的希望的确不多了。”我说：“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俗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只是尽力而为，成败利钝则非所计，听之任之总不是办法；况事情也不尽象您想象的那样悲观。”这是我最后一次和黄先生面谈，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孰知这次欢聚竟成永诀！

我到南京后，即去造访莫德惠，我把我的来历和黄显声在狱中的苦难情况以及黄如何渴望他在蒋前保释的问题，很恳切地叙述了一遍。黄显声对莫德惠的估计果然不错，莫听完我的叙述后，真的显出十分迟疑的神气，并一再强调他说话一点效力也没有，希望我再去求求别人。我发觉对付这种人说恳求的话无用，只有来硬的，否则以后再想见到他也不容易了。于是我把已准备好的保释书拿在手中说：“有否效力姑不去论，只求您站在老前辈的份上尽心而已，现在就请您在这份保释书上签字。至于送出的问题，我已取得侍从室少将参谋张国疆同学的帮忙，他答应俟‘委座’高兴时呈上。”我说完了这段话把保释书交给莫德惠。保

释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黄显声在狱中已十年于兹，身体衰弱已极，且年已过半百，朝不保夕。又闻黄显声在息烽时表现颇好，充生产组长为国家创造财富极丰。天以好生为德，钧座以宽仁为怀，敬恳恢复其自由以终余年，德惠愿以身家保其无他。"莫看完后，一再摇头，表示不能在这份保释书上签字，他说："我不能以身家保释别人的行动。果然，我早就不存在了。你们青年人热情是可嘉的，但世事又岂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单纯?!"我说："黄显声将军之为人，非常重然诺讲信义，到任何时候决不会把保证他的人陷于不利的，这是我和他共患难所得到的信赖。"莫于是大笑说："这是你的信赖不等于我的信赖。"我当时现出不悦的神气说："那末，人和人之间，真的没有真诚可言吗？古往今来那些舍己救人的仁人义士，大概都是神话吧！今天我来求您抱着很大的希望，这也是很大一部分关心黄显声将军的东北同乡的希望。在您来说只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就有可能拯人于水火之中。望您量力而处之，咱俩间是不需要说服的。"我说完了以上那一段话，立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做出要走的样子。莫听完了这段生硬顶撞的言语还未来及说什么，看见我站起来要走，立刻也站了起来拦阻我说："我并没有肯定说不帮忙，只是你写的保释书上的词句，有些话不甚妥当。"我见他已有答应之意，恐拖延下去又生变故，便说："就请您现在修改，然后重缮一份。"莫把保释书看了又看，把末尾两句去掉，改为"德惠不揣冒昧愿以身家保其出狱就医以终余年。"这样一改意思就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只能如此而已。

当我拿着保释书向莫告辞时，他笑着说："你这个小伙子，不愧是少壮派军人，真是咄咄逼人，连考虑问题的时间都不给人家

留点。”我说：“谢谢您的热心帮助，受惠处感同身受。适才冒犯还请多多原谅！”

当天，我把该书送到张国疆家。我离开南京时，张国疆告诉我已把该书呈给蒋介石了，怎样批示的他没见着。以后我到天津时，由黄彤光的信中得知，蒋介石令特务机关调查黄显声将军的健康情况。特务机关的调查当然和保释书有很大的出入，因而又白费了一回事。

原来的计划，我与傅岳一同去解放区，及到南京，傅岳因家庭的拖累和彼时交通不便，不能和我同行，只得走曾泽蘅、梅含章、陈蕴山、胡翔四同学的道路，到国防部报到，争取带兵以备尔后战场上起义。他们五人在解放战争中，有的是在战场上带兵起义的，有的未带兵随着别人起了义。总之，没有一个逃往台湾，也没有一个再跟蒋介石作反人民的事，此差堪告慰于黄将军者。

我以家在东北，以省亲为名，因到哈尔滨。经组织反复研究，令我仍回蒋区从事解放沈阳的活动。四八年四月初回到沈阳后，我把回来的消息暗示给黄彤光小姐，请她转告黄先生。黄将军还从狱中给我带出一封信，对于我的回来很表赞同，勉励我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注意细微的地方。并暗示我争取带兵，勿为虚名所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洋溢乎纸上，令我十分感动和振奋。

当我已经确实能够掌握一师兵力的时候，我给黄彤光写过一封信说明我一定按照计划来实现个人的志愿；并暗示黄小姐在外边准备越狱的计划，时机成熟时，不管黄显声先生同意与否，必须强迫他逃掉。与此同时还汇给黄先生一笔钱。后来，黄彤光

回我一封信，内称黄先生已收到我的信和钱，并嘱我愈到接近成功时愈得加倍小心。这是我和黄先生最后一次通信，接着沈阳就和平解放了。我所指挥的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是起主导作用的起义部队。我想黄先生是能知道的。

大 屠 杀

一九四九年春，刘丕光（在四七年五月间出的牢）由重庆到达上海，由他的信中知黄显声先生仍在重庆的白公馆。我曾去信问过刘丕光，黄将军为什么还不“走”呢？刘回信有云：“时机还不成熟。”重庆解放后，黄彤光才有信来，方知所谓“时机”是等待解放军接近重庆时，再行越狱便很快的可以逃到解放区了。殊不知蒋介石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警戒特别森严起来，而且还调换了大批的看守人员。原先已打通的关节，现在又不通了，不用说是越狱，即令再想看看也做不到了。这是黄彤光始料所不及者。

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蒋介石见末日已到，决定屠杀政治犯。据说这次被屠杀的政治犯黑名单，是由特务头子毛人凤呈给蒋介石，蒋批了一个很大的“死”字，之后才执行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钟，李子坝毛人凤的公馆门外，开出一辆摩托车，一直开到“中美合作所”大门口登记室边停下，从车上跳下来的是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他跑进登记室打电话给杨进兴，令杨执行枪毙黄显声和李英毅的任务。

杨进兴放下耳机，带着看守员杨钦典走进黄显声将军的囚室说：“周主任（即周养浩）请你谈话，马上去，李副官也一道去。”

黄将军和追随张学良多年的李英毅副官一齐被押解了出去。走出牢门没有多远的旷野里，枪声响了。黄和李的身体躺在血泊中痉挛着，杨进兴象恶狼似的立刻冲上前去，从鲜血中提起死者的手，扯下带血的手表。这时，躲在竹林里监视执行屠杀的陆景清露面了。他检查了黄、李的尸体之后，马上回到白公馆把黄将军遗留下的东西分掉。

就在黄、李死后的当天晚上，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同时进行着大批的集体屠杀。据黄彤光信上说，虎口余生逃出来的人仅十余人。这一美蒋联合屠杀中国爱国志士的暴行，是蒋介石自一九二七年以来最残暴的反动统治的集中表现。黄显声将军虽没有呼吸到解放后新中国的幸福空气，但他却预见到全国的解放和蒋介石匪帮在大陆上的彻底被消灭。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黄显声将军在敌特集中营的斗争

黄　彤　光

我与黄显声将军是在狱中认识的。黄将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汉口被蒋介石用特务手段逮捕后，冠以“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等罪名，先监禁在湖南益阳，三九年转押贵州息峰阳朗坝集中营。四六年该集中营结束，又被转押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幽囚达十二年之久。特务用尽各种威胁利诱和折磨迫害手段，都未能动摇黄将军抗日爱国之志，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残害。一代英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内步云桥畔。

我在集中营内与黄将军共患难数年，常受教诲。每每忆及将军当年言行，忠烈坚贞，栩栩如生。最使人景仰的是他向往进步、追求真理、勤奋学习和乐观奋发的精神。他多次正气凛然地对我说：“咱们坐牢，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决不能灰心丧志。咱们是不怕他们的，只有他们才怕咱们。”他常以这种精神鼓励难友们增强斗志。他说话声音洪亮，走路步履矫健。铁窗和铁链都锁不住他旺盛的斗志和崇高的气质。追记黄将军在集中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断，可见将军一生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之一斑。

拒绝学习《中国之命运》

一九四三年初，黄将军被幽囚在息烽阳朗坝的“忠斋”（敌特称集中营叫“大学”，监房叫“斋房”，被囚的人叫“修养人”）。这个斋内被囚的人，多为当时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当时集中营布置全体“修养人”学习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因忠斋皆为有文化的人士，所以列为重点学习，强制每人每天写学习笔记和心得。学习开始，除每人发给一本《中国之命运》外，又发给两本笔记本，并派专人逐日收取笔记本，审查内容。黄将军对此布置极为反感，他说：“丧权误国之人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他拒不学习，并把发给的两本笔记本逐日轮换撕下一页做大便纸用了。忠斋的人原多不愿学习，在黄将军的影响下，全忠斋的人团结起来，抵制学习，谁都不写笔记。监禁在其他各斋房的人，风闻忠斋抗拒学习，也都消极对待，使敌人的打算失败了。

无言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初，集中营开始成立生产组，组长为郑星槎。此人系军统分子，原在国民党海军里任舰长，因违犯军统纪律被关押。集中营主任特务头子周养浩很倚重他，他就仗势欺凌难友。有一次，郑又欺凌难友共产党员尚承文，适黄将军在旁。黄将军目睹此况，气愤不平，难以容忍，就举拳痛打郑星槎。郑慑于黄将军的正气侠骨，狼狈逃去。

此事发生后，特务头子周养浩十分恼怒，在下个星期一的周会上，集合全监几百人，宣布黄显声出手打人，违犯监规，要他

上讲台当众认错赔罪，以警效尤。宣布以后，难友们都认为黄将军无错可认，无罪可赔，认错赔罪的应该是屡次欺凌难友的郑星槎。大家对周养浩都异常愤慨，但敢怒不敢言，只注视着黄将军。将军怀着满腔怒火，昂首阔步，向讲台走去。一声声响亮而坚定的皮鞋声，紧扣着难友们愤怒的心弦。他走上讲台，挺胸而立，炯炯的目光，怒视着特务头子周养浩，一语不发。此时，全场寂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难友们情绪都很紧张，不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几百双愤怒的眼睛与黄将军不屈的怒火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激流。相持数分钟，气焰嚣张的周养浩不得不低下头来。黄将军环视全场一周，即转身迈开豪壮而均匀的步伐走下台来。这时，大家都报以胜利的微笑。黄将军这种不屈的无言的抵抗，使得周养浩手足无措，仓惶宣布散会。事后不久，周养浩即将郑星槎关进斋房，撤其生产组长职务，以图缓和众愤。

不屈的精神，崇高的气节

一九四四年夏天，集中营来了一个“国际友人”。此人先到息烽训练班，再由周养浩陪同到集中营来。周设宴招待，黄将军和孙履平等在座。孙履平原在伪外交部工作，会说英语。孙利用这个机会，向“友人”诉说：“我们这里是一个极大的集中营，里面关着很多人。我和黄将军都是失去自由的人。你们的国家是主张民主自由的，希望你回到重庆，向有关方面提出释放我们。”黄将军是谙熟英语的，他在席间一语未发。席后，黄对孙说：“你这个人真糊涂，怎么能和他说这些话？你把他当做什么人？他能是好人吗？”孙很不以为然，还与黄将军争执了几句。但自“友人”走后，孙履平痴等佳音，却毫无消息。孙就托人打听此

“友人”是否已返重庆，才听说这个“国际友人”是由重庆“中美合作所”派到息训班教指纹学的美帝特务。

就在当年冬季，息训班送来大批表格，是指纹表和五人连环保的表格。这些表格除分别发到各斋房强迫“修养人”填盖外，做行政工作的“修养人”则通知到第一组去填保盖指纹。大家对此，非常反感，谁也不愿去，但第一组一再催促，不去又不行。当时，在第四组生产股的宋绮云同志就和黄将军商量，看如何对付。黄将军考虑之后说：“不要紧，我去！”说完就直奔周养浩办公室，要求把他关进斋房。周不解其意，很感奇怪。黄将军说：“第一组通知我们，要找五个人互相连环保，还要盖上指纹。我一天到晚各处走，又常出外，没有人肯和我联保，因为他们对我的行动不敢担保。我找不到人，只有把我关锁到监房里才最为保险。”又说：“还要盖指印？是怕偷？还是怕盗？我是不盖的。”周经他这一诉斥，当即解释说，此表格并非狱中所制，而是息训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黄将军就将此情况告诉大家，于是“工作修养人”就相继到第一组去说，“尚未找到五个人，等找到后再来填”。日推一日，就这么拖延下去。结果，这填五人连环保和盖指纹的事就不了了之。

仗义执言

杨虎城将军被囚后，他过去的随从副官阎继民和勤务员张醒民，由西安别妻离子，自愿与杨将军共患难，前来照顾杨将军的生活，并带一件皮大衣给杨夫人。但是，他们到达南昌即被监禁，不准他们去杨将军那里，并严加保密，不使杨将军知道。以后，他二人被囚到集中营，才听说杨将军全家都被囚于集中营附

近的玄天洞中，但又无法通消息，阎继明就将他们为什么来、如何被囚等情况告诉黄将军。

一九四四年，黄将军在周养浩监视之下去玄天洞探视杨将军。黄将军看到杨将军长期幽囚于洞中，凄惨孤寂；夫人已病，神志不清；幼女又小，确实需要人照顾。黄将军在吃饭时，不顾自身的安危，当面将阎继明和张醒民二人的情况，详尽地告诉杨将军。周养浩处此窘况下，知道瞒不过去，为了讨好杨将军，回营后就派人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以后，经杨将军一再要求，于四七年七月，阎、张二人才得以到杨将军处，照顾杨将军和夫人的起居生活，使杨将军在后期的幽锢生活中得到不少安慰。

不为利诱

黄将军被囚期间，敌人曾用种种利诱手段，企图收买他，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一九四四年间，特务头子周养浩曾亲笔写了一个条子给会计室，命令在“修养人津贴”项下，为黄将军单立一户，并说黄将军可随意取用款项，不受限制，凭领款条报销。当时，集中营对受优待或有严重病症的“修养人”给予的特别津贴，一般只发给一、二十元，最多的要算自称是蒋介石胞兄的郑老头一家人，每月发给特别津贴五十元。而对黄将军的特别津贴不限数目，可谓“优待”之至。但自立户以来，黄将军从未取用过分文。后来，周养浩只好撤销立户。

一九四三年冬季，集中营由重庆运来一些破烂的旧棉军服，发给“修养人”御寒；而营中职员，则每人发给一套新棉衣。周养浩特地交待第三组事务股给黄将军发一套新的，以示“优待”。黄将军拿到新棉衣后，就交给保管被服的阎继明，要求换一套旧

的给他。阎认为旧的太脏，又不能御寒，劝他不要换。但他坚持要换，阎只好给他换了套旧的。黄将军把领来的旧棉衣拆洗干净，又拿到缝纫部把破烂的地方补好。周养浩看到他穿的是一套旧棉衣，就问他："我叫他们发一套新棉衣给你，怎么没有发？"黄将军回答说："新棉衣不合我的身份，我穿不惯。我坐牢就应当穿这个。虽然破旧，但我已经把它洗干净补好了，穿在身上，从心里觉得干净。"周听后，无以作答，苦笑而去。

集中营内生产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的香烟销售外，特制一种优质的"四一牌"香烟（四月一日是军统特务组织成立的日子），专供特务头子或其他反动军政要员享用。集中营里只有周养浩可以吸这种香烟。黄将军吸的香烟，都是用自己的钱在狱中的四一合作社买的一般香烟。有一天，周看到黄将军在吸烟，对黄将军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四一牌香烟吸，不要再到合作社去买了。"黄将军当即拒绝说："那种香烟，我不习惯吸。"此后，为免去周再来麻烦，黄将军就托人在贵阳买烟丝和卷烟带、香料等，用自制的木板卷烟机，自己卷烟。这个卷烟机，一直带到白公馆还在使用。他对我说："吸烟原是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一九四三年冬季，黄将军的友人康乙清辗转托人由重庆军统局转到集中营一万元，送给黄将军使用。当时集中营办有农场，喂有猪仔多条。周养浩叫会计室将黄将军的存款拨一部分交给生产组的采购人员，在外替黄将军代买架子猪一只，放在农场代为饲养，长肥后交给黄将军食用。会计室即将此意征询黄将军的意见，他当即拒绝说："朋友送给我钱，我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要吃肉，我可以花钱买，不占这种便宜。"

勤 奋 好 学

黄将军对时事是十分关心的，当时集中营不准阅读报纸，唯黄将军经过特许可以阅读报刊。他订阅报刊达十余种，阅读后，就利用散步的机会向难友传述当前的时事，揭露蒋家王朝的腐败没落，分析革命发展的光明前途；并利用各种可能机会，将报刊等借给难友阅读，为《挺进报》在白公馆出版提供了许多新闻资料。

黄将军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怀着坚定的信念。在长期幽囚生活中，他始终坚持锻炼身体，勤奋学习，每天必读书、看报、练字（临摹魏碑帖），特别致力学习俄文。他说：学好俄文，可以多学些革命道理和革命经验。他每日清晨朗读俄文，随身带着钢笔和小本子，随时默写俄文单字。当时狱中有几个苏联人，黄将军经常找他们讲话，练习俄语。后来，黄将军不但能流利地说俄语，而且还编著了一本《俄文简易文法》。他不仅自己学俄语，还要教别人学习俄语。其时狱中很多人受黄将军影响，形成了学俄语的风气，清晨见面，大家均以俄语问安。

一九四六年，黄将军由息烽集中营移至重庆白公馆。当时在白公馆的后山上松林坡戴公祠内，囚着一位被反动派国民党从绥远逮捕来的苏联军官辛格夫大尉。辛格夫大尉曾愤而绝食。特务不懂俄语，语言不通，就请黄将军作翻译。黄将军趁此机会向大尉讲述国际时事，并尽力帮助大尉获得绝食的胜利。二人互通肺腑之言，友情深厚，但平日不能见面。因此，辛格夫大尉每隔相当时日就绝食一次，借以取得与黄将军见面畅谈的机会。这种崇高的国际友谊，可以说是一段千秋佳话。

营救难友

黄将军自己身陷囹圄，但却时刻不忘对难友的帮助和照顾°只要能为难友尽一分力量，他都是勇于相助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顾建平被反动派以“通共”罪名逮捕，囚在白公馆。顾与黄将军相识后，了解到黄将军的为人，就悄悄地把真实姓名和职业告诉黄将军，并说刚被捕时，是关在重庆稽查处的，现在转到白公馆来，外面的人不知道，很希望能有人替他通个消息。本来在集中营里，是绝对不准向外泄露修养人的真实姓名和被囚地点的，如发觉有向外传递书信的，轻则处刑十年八年，重则处死，但黄将军为了营救顾建平同志，慨然答应为顾传递消息。顾建平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他，他就把顾的信装在给我的信中，叫看守员宋惠宽带给我。他要我设法把信送到收件人手里，并叮嘱必需谨慎从事，千万不能疏忽大意，否则将要同遭于难。我即托我的同学夏在汶（他当时是重庆《国民公报》的记者，和报界人士往还，不易为人注意）将顾建平同志的亲笔信送到李子坝《大公报》段经理家中。段得到此信后，多方设法营救，并揭露顾建平被囚于白公馆的消息。反动派一方面没有抓住顾建平同志的“罪证”，一方面又迫于舆论，不得已于四九年十月八日将顾建平释放。顾建平同志至今仍念念不忘黄将军的帮助，每每提及身入死囚之牢能得以生还，均言仰仗黄将军之义举。

苏文玉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从三台徒步到重庆就学，在中美合作所附近被逮捕，又遭毒刑吊打，囚禁多年，体弱不堪。至四九年十月间，苏文玉因病情严重，奄

奄一息。当时白公馆仅有一个医官，束手无策。黄将军见此情况，一再要求特务周养浩把苏文玉送到外面就医，并叫我找原在集中营已恢复自由的周纯给苏文玉做保人。得到准许后，黄将军又资助苏文玉医药和生活费用。苏文玉在外就医期间，重庆即获解放，苏文玉幸免于难。解放后，苏文玉在党的关怀和照顾下，体质逐渐恢复健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

光明磊落，置生死于度外

黄将军被囚期间，他的老部下和我曾三次策划，要他逃出集中营，他均未同意。他认为："我爱国无罪，如果我逃走了，他们就会颠倒黑白，同时，还要罪及无辜，连累其他的难友们遭受灾难，我不能这么自私，不忍心这么做。"四九年十一月，重庆面临解放，我又作了一次越狱的安排，由集中营的看守员宋惠宽在夜间从小路把黄将军带出来，由我的同学夏在汶在外面接应。当时夏在汶已从城内搬到磁器口附近来住，借好了汽车，等待行动。可是，黄将军还是不肯这么办。他叫宋惠宽带信出来说："要走，我就和大伙儿一齐走。如果我一个人走，特务借口杀害留下的难友，怎么办？要我一个人得救，大家遭殃，坚决不能这么做。"他在牺牲之前，曾给我一封最后的信，信中说："……你千万珍重，不可过分慌乱，悲伤难过。我就是万一不测，是为张学良先生牺牲。他是为要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寥寥数语，充分表现出将军光明磊落，忠于国家人民的崇高精神。

（一九六三年二月于重庆）

革 命 史 资 料

责任编辑：石肖岩　郭丽卿　黄国平

封面题字：肖　克

封面设计：范贻光

限 国 内 发

统一书号：11224

定　价：　0.76